

目 录

不可忘却的记忆

——怀念陈枫同志……………胡习恒（1）

我和陈枫同志一次难忘的会见……………叶生发（11）

鹅山柳水仰高风

——回忆柳州市第一任市长魏伯同志……………严祖锐（15）

思念永不断

——忆父亲锐伯……………穆 紫（23）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忆黎达愚同志……………罗杰林（29）

秋枫向红日

——忆解放战争时期的高天骥同志……………刘明文（36）

龙城革命烈士……………刘明文（43）

记著名国画家邓俊群……………方贵益（48）

回忆父亲肖甘牛……………肖丁三（52）

父亲谢康的治学与著作……………谢庆云（58）

壮族诗人黄勇刹……………庞绍元（64）

壮族剧作家韦壮凡和他的戏剧创作……………庞绍元（69）

琐忆地方书画家李漫涛……………朱光华（74）

艰苦创业 执着追求

——记制药业老行尊黄斗才先生……………刘郁卿（77）

刘古香革命事略……市政协文史委 市地方志办	(80)
卢涛在柳州二三事……	蒙智扉 (86)
怀念我们的父亲翟念劬……	翟瞻崑 翟瞻葵 (92)
廖磊生平……	廖 锋 (97)
柳州历史人物轶闻摭遗	
——记高成忠……	谢贤修 (105)
高成忠首创柳州业余桂剧社……	韦建章 (112)
张先春生平简介……	张汉华 区农乐 (114)
黄梦年小传……	叶梦涛 (118)
刘克初……	陈显达 (120)
张朝玺小传……	张宏德 (124)
郑兰生……	张正明 (126)
柯积丞建功滇边……	柯岗 蒋霖 (129)
曾胜……	陈铁生 (136)
杨廷理……	陈铁生 (141)
王拯和《龙壁山房诗草》……	肖泽昌 (145)
徐养正……	兰 阳 (152)
张冲……	兰 阳 (157)
裴文中教授与白莲洞的开拓……	易光远 (161)
旅柳名人摭拾……	陈铁生 (167)
胡志明被关押在柳州始末……	温其洲 (171)
附 录	
有关人物资料部份目录……	(175)

不可忘却的记忆

——怀念陈枫同志

胡 习 恒

(一)

1986年9月初的一天，我从北戴河返回柳州路过北京时，惊悉陈枫同志于8月26日在北京因病不幸逝世，噩耗传来，我感到十分悲痛。他的去世，使我失去一位敬爱的老领导、老战友。他离开我们五年了，但他的音容笑貌仍常常在我的脑际中浮现。他那广阔的胸怀，高尚的品德，严谨的作风，诚挚的情谊使我难以忘怀。

陈枫同志系广东省阳山县人。1935年他在广雅中学读书时就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教育，并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和抗日民主运动。1936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青年抗日同盟，领导广州市学生声援北平“一二·九”运动。1937年11月，被学校当局勒令退学。在中共地下党组织的帮助下，他与几位进步同学一道奔赴延安，进入抗日军政大学学习马列主义理论和军事知识。不久，参加了民族解放先锋队。经过革命斗争的锻炼和考验，1938年2月，他在延安光荣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同年5月，党组织派他回广东参加地下工作和敌后游击战争。他工作深入，联系群众，实事求是，工作取

得较好成绩，很快就被选拔为党的领导干部，曾任中共广东省从化琶江工委书记、中共广东江北路东地委常委兼组织部长、中共广东江北地委委员。

1946年8月，陈枫同志受党的委派，来到广西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49年10月，他去香港开会，后经广东随军回广西，先后在中共梧州、柳州、南宁市委和市人民政府任领导职务。

1950年任柳州市委书记，后调任广西人民政府民政厅副厅长、中共南宁市委书记、市长。1965年1月，调国家外交部任亚洲司副司长，在阿富汗、布隆迪、冰岛和毛里求斯等国任大使职。他离休后，应邀担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特别咨询员、南宁市委和市人民政府高级顾问。他不辞辛苦，不取报酬，努力为广西的四化建设贡献力量。

(二)

1942年7月9日和1943年1月15日，广西先后发生骇人听闻的“七·九”事件和“一·一五”事件。广西反动当局顽固坚持反共立场，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进步分子。中共广西省工委的一些领导被捕牺牲，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中共广西省工委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省工委书记钱兴同志，在极其恶劣的环境下，带领广西地下党人坚持斗争。

当时，党中央考虑到广西是边境，地理位置重要，应该加强这个地区党的领导工作。特别是“七·九”事件后，广西城市中党的领导干部缺乏，一部份干部又转入农村，组织力量受到削弱，而广西反动当局统治残酷，控制严密。为此，中共香港分局根据中央的指示精神，决定派出力量，分三条线进入广西加强工作，把被破坏的党组织重新恢复起

来，为迎接全国革命高潮的到来做好准备。陈枫同志受派担任其中一条线的领导职务，进入广西。

陈枫同志于1946年8月到达桂林，先后担任桂柳区特派员、书记、中共广西省城工委书记，直接领导桂、柳、邕、梧四个城市党的工作。他到广西不久，就打开了工作局面，党的活动很快活跃起来，特别是在柳州，几个重要据点如龙城中学、柳州高中、柳庆师范、柳州高工、柳铁、水厂、电厂和郊区等党组织迅速恢复和发展，党领导的中国爱国民主青年解放联合会等10个外围组织，也在柳州建立和发展，使之成为党的有力助手。党员的积极性也随着高涨起来，各项工作都有很大起色。

陈枫同志一进入广西就着手于调查研究，了解广西政治、军事、经济的情况。接着便与广东因“南委事件”转移到广西来的党组织接上关系，统一组织活动，共同开展工作。1947年8月初，陈枫来到柳州，与柳州党组织接上关系。当时熊元清和我是柳州党组织的负责人。陈枫到我们的机关驻地古香东路18号楼上与我们开了三天会，他首先向我们详细了解柳州党组织和党员的情况，特别是了解我们对当前形势的看法。还问我们工作有什么经验教训，有什么困难，今后有何打算等等。接着传达桂柳区工委召开的“七月会议”的精神，说明他到广西来的任务。他分析形势，要我们充分认识反动阶级的本质及反动派两面派手法，不能对他们抱有任何幻想。他实事求是地肯定了柳州党组织的成绩，鼓励我们树立信心，克服当前遇到的困难，努力把党的工作做好。最后，他布置工作，着重提醒我们，要抓住工作重点，要大胆放手在柳铁、工厂、学校和其他重要的机关中建立和发展党

的组织，特别是要有计划的培养、发展工人积极分子入党。要注意斗争策略和工作方法。他强调，在白色恐怖的环境中工作，一定要重视加强对党员的教育、严格执行“秘工条例”。从这次会议开始，陈枫同志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位具有丰富的地下革命斗争经验的领导者，对形势的分析是那样的透彻，对工作的布置又如此精心。从此，我向他学习，提高了领导思想和艺术，把工作搞得更好。

（三）

由于陈枫同志在白区工作具有丰富经验，他调来广西领导桂柳区和后来的桂、柳、邕、梧四个城市的地下工作，自始至终都处在主动地位，直到广西解放，不但柳州党组织和近200名党员未受损害，就是党的外围秘密组织300多名成员，也未发生过意外事故。

陈枫同志领导的党组织之所以能够顺利地开展工作，是和他工作严谨，有胆有识，善于掌握斗争的规律，善于分析判断情况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桂柳区工委机关的转移一事就可以说明这个问题。开始桂柳区工委设在桂林，他经过短短时间的工作实践就敏锐地察觉到工委机关设在此地不适宜。他认为桂林是广西省府的所在地，是广西反动统治的中心，军警特务机关林立、反动当局控制严密，过去省工委设在这里曾遭到严重的破坏。相比之下，柳州是桂中腹地，交通四通八达，地下工作基础较好，党组织从未遭到破坏，在柳州开展党的活动比桂林有利。桂柳区工委根据陈枫同志的意见作出决定，将机关搬到柳州。后直到解放，党组织未遭到任何破坏。

陈枫同志处理事情，胆大心细，非常谨慎，又善于征求和倾听同志们的意见。根据党组织规定，他的住地，不能收藏党的文件。于是他问我，什么地方可以收藏？我说，柳州市立医院的手术室是收藏文件较安全的地方。因为医院不带政治色彩，不为敌人所注意，手术室也不是任何人都可以进去的，环境不复杂；而且医院里有党员和“爱青会”员在活动。工农解放联合会成员黄瑞琪就在手术室里工作，他办事稳妥，钥匙由他掌握，可将文件锁在不用的医疗设备的木箱里，由黄亲自保管，我送取文件找黄也很方便。陈枫听后思考一下，当即表示同意。此后，陈枫送取收藏的文件，都由我经手。一直没有发生过意外。

(四)

陈枫同志十分重视对党员的教育，使党员在政治上紧跟中央的步调。他要求我们认真学习中央文件，领会精神实质，结合实际，贯彻执行，做好工作。他特别强调，我们地下党员，没有受过革命斗争严格的考验，需要经常进行革命气节教育，严格执行“秘工条例”。他提醒我们，搞地下工作，随时有被捕的可能，要随时准备好应付敌人审问的口供。一旦被捕，自己的政治面目为敌人掌握，要勇于斗争，宁死不屈。经得起革命的考验，才是坚定的无产阶级战士、真正的共产党人。他还说，只要我们认真执行“秘工条例”，是不容易遭到敌人破坏的。

当时，陈枫同志每隔三、四个月就要乘飞机去香港分局开会或汇报工作。买飞机票要证明，过海关也要检查证明。陈枫同志和我们共同想个办法，通过在柳州市立医院掌握公

章的爱青会员唐志光的关系，取得该院的信封和盖上公章的空白信箋，这样问题就解决了。但后来又遇到了另一个难题，按组织规定，领导干部是不准随身携带文件和资料的，而有时又需要带出差。有一次，陈枫去香港开会，只好带上党员熊柳生一同去。他又想出了个办法，买了十盒柳州特产云片糕和一些物品，将带去的材料藏到云片糕最底层的盒子里，由熊柳生自带。他们先商量好，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要沉着应付，大大方方，随机应变。不出所料，在出境时，海关人员果然检查，把云片糕一盒盒打开，当开到了第五盒时，看到熊柳生同志沉着镇定如常，就不继续检查了。他们就这样安全的出境。

陈枫同志在解放后1950年担任中共柳州市委书记，他继续保持和发扬过去的优良工作作风。在工作中从不满足于一般号召和光靠开会解决问题的做法，而是扎扎实实地深入到重点单位去检查工作，认真调查研究，以点带面，帮助基层。当时，新的人民政府刚刚建立，情况复杂，问题很多，即使工作再忙，也抽时间到基层去。陈枫同志对重要的工作问题，从不轻易表态，先听取大家的意见，后经研究才作出决定。他还经常亲自动手写工作报告和总结，修改文件。有时工作太忙，就给秘书提出要点，写出初稿，然后反复修改。他的优良作风，给各级领导干部作出了榜样。

陈枫同志对待干部既从严要求又宽厚以待，他平易近人，和蔼可亲，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而是以革命同志平等相处，就是对有缺点的同志，也不是横加指责，而是耐心做思想工作。1948年秋的一天，陈枫同志带了两份重要文件给我和熊元清同志，要我们认真阅读。两天后，陈枫同志便按时来取

回。由于文件收藏在房内要经常更换地方，我一时想不起来，找了又找，还是找不见。这不是一件小事。我想这一下定被陈枫同志狠狠批评了，因此心里很紧张，急得满头大汗。但出我所预料之外，见面时他不但没有生气，反而再三安慰我，要我好好想一想，还说细心找找，总会找到的。接着他提示，要我回忆，如带过文件外出没有？是否给元清同志带回去看？有什么人来过家里？对这些询问我都作了肯定的回答。他听了反复思考后严肃地说，如果真的找不着，为了党组织和你个人的安全，必须严格执行“秘工条例”的规定，你应该尽早地撤离柳州，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并做好梁次芳（我爱人）同志的思想工作，家里有什么困难，组织会照顾的。我当即表示，接受党组织的决定。他接着说，明天再来作具体安排。我把这件事如实地告诉梁次芳，她也很焦急，我们俩立即翻箱倒柜地再找了一遍，终于在架床板的长凳子上找到了。第二天陈枫到来时，我就向他报告情况，把文件交给他，并向他作了检讨。他看了文件，露出了微笑，没有责怪我。和蔼地说，文件找到就好了，没有暴露，你就不必转移了，以后要吸取教训。他的言行使我深受教育。是的，一个同志有了缺点和错误，当他懂得错在哪里了，这时关心帮助他，和他一起总结教训，总比再加指责的效果要好得多。

（五）

1949年上半年，解放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对我们开展地下斗争越来越有利。越是在这种形势下，斗争也就越激烈，越残酷。5月14日，我党在柳州散发了《警告特务书》

的传单后，敌人惊恐万分，进行疯狂反扑，于是准备对龙城中学的方宏誉、罗杰林、毛恣观、唐美贞四名党员教师下毒手。眼见特务出入龙中频繁，敌人很快就要行动了。5月19日上午，陈枫、梁山、熊元清和我开个紧急会议，研究对策。陈枫明确指出，这是特务机关对我们散发传单的报复，一定要千方百计保护好我们同志的安全，这情报是从党员丘行那里得来的，为了丘行的安全，也要同时设法尽快转移。根据陈枫同志的意见，我们将计就计，在党组织的精心安排下，当晚八时前，将这五名党员安全转移了。接着在社会上放出空气，说五位老师已“失踪”。由龙中党员和进步学生组成“寻师委员会”。还在《广西日报》（柳州版）上刊登“寻师广告”大造舆论，给敌人施加压力。特务机关被搞得昏头转向，互相猜疑埋怨。这一事件引起广大群众对柳州反动当局的愤恨。这就是当时震动柳州的龙城中学“寻师运动”。经过10天的斗争，陈枫同志对我们分析了当前局势，他明确指出，运动已达到我们预计的目的，通知龙中党组织和有关党员，不必继续与敌人纠缠。

由于龙中党组织的活动引起了敌人的仇视，1949年9月中旬，国民党当局以历年底纵“匪党”为由，下令强行解放了龙中，并企图逮捕龙中校长高天骥。高校长是与我党合作多年的老朋友，向我们多次提供敌人的情报。我们介绍到龙中工作的老师，多数是党员和进步分子，政治面目虽然没有告诉他，但他心照不宣，也从不拒绝。后来，根据他的表现和要求，党组织批准他参加党领导的爱国民主人士解放联合会为会员。他为革命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当陈枫同志得知高天骥的处境时，即指示我们，千方百计把他救出虎口。

经过我们精心安排，终于及时把高天骥转移出来，暂时安排在厚生农场森林中的龙壁山沟里居住。陈枫很关心高天骥同志，当时他到这里召开城市工作会议，亲自去草棚看望他，亲切的安慰他，肯定他对革命事业作出的贡献，并问他有什么困难和要求。当高天骥得知来看望他的就是省城工委书记陈枫时，便紧紧握住陈枫的手，激动地说：“我没有什么困难，同志们对我的生活和安全都很关心，我只有一个要求，要做个和你们同生共死的革命同志，不要把我留在党外当朋友，请审查批准我加入党组织，为党的事业奋斗终身”。陈枫同志说：“我们不会忘记你对党所作的贡献，你的要求很好，党组织会尽快研究，你要多多保重身体，我们将转移你到农村比较安全的地方去，安排好你的生活，请你放心。”陈枫同志离开草棚后，一再嘱咐我们，一定要采取有力的措施，保证高天骥同志的安全，还要求我们常和他谈心，在政治上多关心帮助，在生活上要特别照顾好，要抓紧时间研究他入党的要求等等。不久，高天骥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高天骥对陈枫的诚挚信任，十分感激和钦佩。

解放后，陈枫同志因工作需要调离柳州。多年来，他对柳州的建设、改革开放十分关心，对曾在柳州一起工作过的同志也很关怀。他路过柳州多次，看到柳州现状时，激动地说：“柳州的建设和改革工作，取得较好的成绩，我感到十分高兴”。他每次回到柳州，都有不少同志来看望，他都热情接待和亲切地交谈，关心地问大家的身体健康和工作生活情况，特别是问到还有哪些同志因“文革”受冤屈应落实政策现在还未落实。他还亲自到身体状况不太好的黎达愚、徐锡文等老同志家里探望。老领导的到来，大家非常感动。有一次他到南

宁参加区党史办召开的党史座谈会时，得知高天骥同志病重住院，就约我陪他去看望。高天骥见到陈枫同志时非常感动，阶级的友爱，同志的情谊，领导的关怀，使他激动得老泪纵横，好久说不出一句话来，只是紧紧地握着陈枫同志的手。陈枫同志离开时，高天骥再三感谢老领导的关心。1986年元月，陈枫和爱人吴素梅同志路过柳州时，得知我住院治病，他俩特意到医院看望我，问我的病情，生活有什么困难等等，离开时安慰我安心治病，还送了一瓶他自己随身备用防治心脏病的心宝药品给我。他们回北京不久，又给我来信，问我的病情和身体康复情况，并鼓励我把病治好。使我无比的感动，这不是一瓶普通的药和简单的信，即是一颗凝聚同志情谊的心啊！

陈枫同志为党工作50个春秋，终年70岁。他的一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他光辉的形象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我和陈枫同志一次难忘的会见

叶 生 发

在抗日战争时期，民盟主张坚持抗日，争取民主，加强团结；抗战胜利后，民盟拥护中共提出成立联合政府的主张，反对独裁，要求民主，反对内战。由于政治主张与中共有不少相同之处，在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各地民盟得到中共的指导和支持，与共产党亲密合作。1946年，国民党反动派撕毁旧政协协议，单独召开“国大”，镇压民主运动，遭到中共和民盟的坚决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穷凶极恶，暗杀民盟中央委员李公朴、闻一多。1949年7月桂系当局也在同一天，在南宁逮捕了民盟省支部领导人杨荣国、张毕来，在桂林逮捕了丘林、方亢等九名盟员，在八步逮捕了刘彦忠。民盟省支部的其他领导人徐寅初、欧阳予倩、林砺儒、张锡昌、石兆棠、周匡人、宋云彬等也在此之前先后离桂到上海和香港等地，广西民盟组织遭到严重的破坏。

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悍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强迫解散民盟中央总部，民盟部分领导人沈钧儒等，由上海、南京赴香港，于1948年1月在香港召开民盟三中全会，重建民盟中央，公开宣布与中共密切合作，“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民盟与中共的斗争目的更为一致。广西民盟

在桂林的谢之雄、王兆南，在南宁的梁成业、叶生发先后到香港与民盟中央汇报工作，听取民盟中央的指示，并重新组成了民盟广西支部领导小组，由在广西内地的杨荣国、叶生发、梁成业、驻香港的周匡人、宋云彬等五人负责。

1949年上半年，在南宁师院的民盟组织与中共地下党合作，积极投入全院师生的反对学校反动当局的运动。同年四月，桂林省府主席黄旭初藉视察名义，到南宁攻击师院盟员教授和进步教授，煽动学生闹学潮，逼迫他们离开广西。为了防止意外，民盟省支部决定，领导人先后撤离南宁。四月杨荣国、张毕来随同一些进步教授去湖南，梁成业于六月底毕业，暂去柳州，我也于七月离开南宁准备去桂林找工作，在南宁的民盟组织由刘润贤负责。7月初，我与梁成业在柳州相会。当时广西已是解放前夕。对今后如何工作，是民盟面临的新情况和新问题。梁成业的工作当时也还没有着落。过去民盟组织是由他负责与地下党联系。我和地下党没有直接的联系。以后，我和他不在一个城市工作，我与地下党如何联系也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问题。所以我提出想直接与地下党的负责同志谈谈，梁成业也同意。但是，我又感到是否要求过高。因为在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一律逮捕，格杀勿论”的白色恐怖中，一个地下党的负责人难与党外人士约会，而且地下党负责同志在什么地方，更是秘密的事。

过了两天，梁成业通知我：明天上午十时，在柳侯公园的柳宗元墓碑前有一个人与你相见，称号是“大张”。我很高兴，按时到指定的地点。当时旁无他人，我与已在那里等候的“大张”对上符号，互相招呼之后，便一同从公园的后门朝湾塘路走去，到路旁的草地坐谈（地点即现在的湾塘小

学，当时是旁无住房的荒地）。“大张”同志首先给我的印象是和藹可亲，待人诚恳，平易近人，一见面便感觉他是一个亲密的战友，彼此之间可以无拘束的交换意见。我先扼要地介绍南宁的政治形势，南宁师院的“赴黄”斗争情况，接着介绍了民盟的工作和我离开南宁后准备到桂林工作的想法，并征求他对广西民盟今后工作的意见。大张的谈话很诚恳，他认为广西当时和以后的形势，主要是受掌握军权的白崇禧控制，白崇禧准备顽抗到底，正在湖南的衡阳，宝庆一带布防与我军决战，广西的和平解放希望不大。他说，柳州最近一个时期，没有逮捕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桂林的情况，过几天我们有人来才清楚。他赞成我去桂林找工作，如可能最好到国民党省府去，那里我们还缺乏联系的人。他请我留下我在桂林的通讯地址。等我在桂林找到工作，有个落脚的地方，他再派人去与我联系。谈到民盟今后的工作，他说，根据民盟组织和成员的情况，可进行搜集情报、统战策反，做好迎接解放军的准备二作。最后，他告诉我，他准备过几天扮作商人，乘飞机去香港，如果有需要转告民盟中央的事，他可以代为转达。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便分手离别。

我离开柳州，先回到荔浦老家，后曾数次到桂林与民盟组织联系。当时桂林的形势已相当紧张，我在桂林找不到工作，也没有直接与地下党联系，但已知桂林的民盟小组已与中共地下组织取得了联系，在地下组织的指导下做迎接解放军进城的工作。桂林市解放的前一天，我从荔浦到了桂林。桂林解放不久便到桂林军管会文教接管部工作。1950年1月又转到南宁。以后在省文教厅和南宁师范学校工作。1951年寒假，由南宁去桂林，受民盟广西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委托，路

过柳州，与中共柳州市委负责统战工作的同志接洽，研究筹备成立民盟柳州小组的事。一天下午，我得到通知：中共柳州市委书记约我晚上相见。见面时，我大为惊讶，原来市委书记陈枫同志就是1949年7月与我会见的地下党负责人“大张”同志。这时我才意识到当时他那热诚、亲切的谈话，已把我当着与地下党合作的民盟负责人和亲密战友。对我的政治信任和诚恳热情，使我终生难忘。

鹅山柳水仰高风

——回忆柳州市第一任市长魏伯同志

严祖锐

魏伯同志是河南省蒙阳县人，他在30年代就参加了革命工作。1949年随军南下。柳州解放后为柳州市人民政府第一任市长，后任中共柳州市委书记。1951年调离柳州，1984年8月于北京逝世，终年70岁。魏伯同志调离柳州已有37个年头，离开人世也有7年了，然而时至今日，凡是与他熟悉的干部和群众，谈起当年的魏市长，对他高尚的思想情操和优良的领导作风，普遍称赞和敬仰。这里我回忆二三事。

一

1950年9月，我在武汉大学财经学院（即现在的中南财经大学）毕业后分配来柳州，安排在市府政策研究室工作。当时政研室是由魏伯同志直接抓的。他住在哪里，政研室就设在那里，他搬到哪里，政研室也就搬到那里。我一直在他身边工作。魏伯同志留给我第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他高度重视调查研究工作，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魏伯同志是抗日战争前的大学生，抗战爆发后到安延，在延安时期是知名的党员作家，具有较高的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政策水平和工作水平，又有丰富的领导工作经验，但他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孜孜不倦地加强自身的学习，不断深入调查研究，深入实

际，联系群众，求得真知灼见，掌握科学决策和领导工作的主动权。他下厂检查工作常带我们下去。在工作方法上，一般不是先听厂领导干部的泛泛汇报，而是同我们一起先分头深入到职工群众中去，掌握第一手材料，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在这基础上才找领导班子来汇报。他边听汇报边提出问题。从所回答问题中看出厂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和政策水平以及工作作风和方法，边谈边商量。这样有针对性地提出改进工作意见，有效地帮助基层领导提高水平。魏伯同志在柳州的干部和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我想这是同他坚持认真深入基层，联系群众，认真作调查研究工作分不开的。这里我想起了一件事。

1951年柳州解放不久，国民党溃逃留下一些残兵败将，他们勾结地方反动势力，不断进行破坏和捣乱，敌我斗争尖锐复杂。柳州市驻街道工作队为了掌握敌情，先在湾塘路搞试点。开展了一场坦白登记运动，要求有问题的人都要到街委会和工作队那里去坦白登记。在试点工作告一段落之后，工作队给魏市长写了报告，要求在全市范围内推广湾塘路的作法 and 经验。湾塘路的作法是否妥当，能否在全市推广，魏市长感到还没有把握，要我再去作个调查。接受任务后，我去找工作队的领导、街道干部、积极分子了解情况。他们一致认为试点做法很好。于是我写了一篇调查报告，肯定了湾塘路的作法。

魏伯同志看了报告后，把我找去，提了几个问题：你这次调查找了哪些人了解情况？坦白登记的人交待了哪些问题？坦白登记后的思想情绪怎样？当魏市长得知我只是找了工作队领导、街道干部、积极分子了解情况时，当即指出，

“仅仅找这些人远远不够的，必须直接找哪些坦白交待问题的人作调查，才能了解这些人在坦白登记后的真实思想和工作的实际效果。”

我按照魏市长的指示，再次去湾塘路作调查，果然就发现了问题。湾塘路的作法由于政策界限不清，扩大了坦白登记的范围（中央规定，敌特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反动会道门头子才必须向人民政府坦白登记）。当时连一些菜农捡到国民党军队丢弃的手榴弹用去河里炸鱼的事也坦白登记了。坦白登记以后不是放下了包袱，而是增加了顾虑和恐惧心理，有的夜晚听到狗叫，就以为人民政府派人来捉自己，急忙起身穿衣，准备去坐牢。这种作法实际上混淆了敌我界限，使一些不属于敌我矛盾的基本群众，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问题而增加了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疑虑。实践证明这种作法的效果是不好的。我第二次写的调查报告便对这种作法作了否定的结论。魏市长看了这个调查报告后作出决定，不在全市推广湾塘路的作法。也不再在湾塘路继续搞群众性的坦白登记运动，而是要认真做好干部、积极分子和群众的思想工作。后来这样做，更好地推动了工作的开展。

二

魏伯同志留给我的另一深刻印象是他以身作则，对工作极端负责，在干部中起了很好的榜样作用。

解放初期，城市工作千头万绪，工作繁忙，魏伯同志很关心大家劳逸结合。可是他却废寝忘食地学习和工作。每天中午一般只休息一二十分钟就起床看文件和处理工作了。为

了带动大家做好对群众的宣传发动工作，他常利用晚上休息时间，亲自动手为《柳州日报》撰写不少高质量的社论和文章。他曾以“金川”笔名撰写系列文章，这些社论、文章紧密结合实际、中心突出、短小精干、深入浅出、说服力强，对解决群众的重大认识问题和推动党的中心工作起到了很大推动作用。

魏伯同志作重要报告，经常是自己亲自动手写，而不要秘书代劳。有时他采取口授的方式，由政研室派一位同志作记录。他在办公室内来回踱步、全神贯注、思路敏捷、语言流畅地把准备作报告的内容口述，然后把记录稿加以修饰加工，就成了一篇好讲稿、好文章。魏伯同志能够这样做，不仅是因为他有较深厚的理论、政策、文字功底、有较强的分析概括能力，而且也由于他经常深入群众，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胸中有全局，手中有典型，该批评什么，倡导什么，心中都有数，因而他的报告讲得生动深刻，听者很有启发。有的干部反映，少听魏伯同志的一次报告是一种损失。

魏伯同志从培养、提高干部的需要出发，从50年代初即着手抓干部的理论教育，在全市建立起比较正规的学习制度、组织和考核办法，并亲自抓由市委、市政府领导同志组成的高级组的学习。在广西，他率先设置了专职理论教员。我和扬相同志就是由魏伯同志提名调去市委宣传部担任专职理论教员的。为了培养提高我们这些年轻的理论教员，魏伯同志叫我们旁听高级组的学习讨论，从中受到启发和教育。从旁听过程中，我发现魏伯同志在每一次学习讨论前都带头认真作好发言准备，并善于提出问题，引导大家围绕中心内容深入开展学习讨论。他自己带头并要求高级组的每一个

成员都要在认真钻研经典著作，在领会精神实质的基础上联系实际，而不要漫无边际地东扯西拉。一次，高级组学习讨论斯大林的著作《严重的问题在于教育农民》时，一位副市长因为没有认真准备，发言不着要领，魏伯同志听了当即尖锐地指出：“我认为，要搞好我们的学习，严重的问题在于开动脑筋。”批评那位副市长在学习中没有认真开动脑筋。那位副市长以后对学习可认真多了，发言水平明显提高。

三

魏伯同志留给我又一个深刻的印象是他尊重知识、爱护人才，对干部和知识份子有非常深厚诚挚的感情，从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和生活上关心他们的进步与成长，就拿我们政研室的同志来说，当时大都是20岁左右的青年人，虽然锐气可嘉，但毕竟是初出茅庐。魏伯同志经常耐心细致地给我们传授马列主义知识，帮助我们确立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具体指导我们如何观察、分析问题，帮助我们树立深入实际和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他还经常给我们讲革命传统，勉励我们；不论是在工作顺利情况还是在艰苦曲折的环境中都要经得起考验。他对我们的点滴进步和微小成绩都给予热情的鼓励，对在我们当中出现的值得注意的倾向，及时诚恳地给予指出。解放初期，物质条件很差，文娱体育设施缺乏。市政府行政科为了使魏市长能够在繁忙的工作中松弛一下头脑，活动一下筋骨，给他配了一副康乐棋。魏市长工作忙，很少使用，倒成了我们这帮年轻人的“专利品”。初学康乐棋，劲头大得很，有时到了深夜还“康唧！康唧”打个不停。住在政研

室楼上的魏市长下楼来恳切地对我们说：“文娱活动要适度，不可玩物丧志啊！”听了魏市长的批评，我们再也没有深夜鏖战了。

最使我深受感动和终身难忘的是魏市长对我入党问题的关心。1952年市府政研室已随魏市长从柳新街迁至景行路文巷天主教堂（今龙城路杂粮店位置）内办公，同市委政研室合并。市委书记陈枫调离柳州，由魏伯同志任市委书记兼市长。韦竞新同志由团市委书记调任市委副秘书长兼市委政研室主任，韦又是机关党支部的委员。一天魏伯同志在楼上问韦竞新同志：“严祖锐的入党问题还没有讨论吗？”韦回答说：“最近准备讨论了。”因为魏伯同志的声音宏亮，我在楼下都听见了，不久，党支部召开大会讨论我的入党申请，以7票对6票通过。但组织部没有批准。我就暗下决心，一定要按照魏伯同志经常教导我们的那样去做，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人生观，经得起党组织的考验，不辜负魏伯同志的关怀和期望。经过长期坚持不懈的努力，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当时魏伯同志已调全国文联任党组副书记。我以无比兴奋和喜悦的心情给第一个关心我政治生命的好首长写了一封报喜信。没想到他那么快地就给我回信，信中充满诚挚感情和恳切的勉励。回信是这样写的：

祖锐同志：

经过长期的学习和锻炼，您终于成了伟大、光荣的中国共产党的一名党员，应为您祝贺，为党祝贺，在新时期长征途中增加了一名共产主义战士。您过去已为党作了不少工作，入党后又有了新的条件，相信您会更好地为党工作的。不过这也只

是新的起点，以后路更长，担子更重，要有这种思想准备，更加勤奋地学习、更加严格地在实践中要求自己，永不满足，永不停步，相信您也会这样做的。

何时来京，一定打电话给我，在一起好好谈谈。

耀东同志和小孩前请代致意。

匆匆，祝好。

魏 伯

1. 19

这些年来我一直把魏伯同志的这封信作为座右铭，不断激励我前进。我知道，魏伯同志关心干部、关心知识分子的事迹实在多得很。30多年后的今天，柳州市的一些老艺人、医务界、教育界、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谈到魏市长是怎样关心他们的政治生命时，不少同志热泪盈眶。魏伯同志在广州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以及后来在北京任职期间，出差去广州、北京的同志去看望他时，他一个一个地询问所记得的在柳工作的每一个同志的工作、身体、思想近况，如××同志平反了吗？干什么工作？××同志入党问题解决了吗？等等，在柳工作的同志得知魏市长的关心都深受感动。魏伯同志与柳州市干部、知识分子的关系，不仅仅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是革命同志亲密无间的知心挚友关系啊！

1979年某月，魏伯同志因公路过柳州，住在柳州饭店。我去看望他时谈到，柳州市的干部和知识分子都很想念他，是不是通知一些同志来见见面。魏伯同志说：“好，就通知10多位同志在会客室里叙谈叙谈。”我按照魏伯同志的意见

用电话通知了十多位同志。没料到，魏伯同志回柳州的消息一传十、十传百，许多虽然没有接到电话通知的同志也来了，会见时竟来了200多个同志，不得不把会见地点改在大会议室。我环顾一下会场，不仅柳州市50年代的各级领导干部来了，医务界、文艺界、教育界、科技界的知名人士差不多都到齐了。50年代初曾任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的蒙长兴和曾任市委宣传部科长的张慧文夫妻俩当时在鹿寨县柳江造纸厂任职，听到魏伯同志来柳的消息，顾不上吃饭，急忙到饭堂要了几个馒头去搭火车赶来柳州，不错过这次难得见面机会。此情此景，不禁使人想到，一个具有崇高威望的党的领导干部，确像一块巨大的磁石一样地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凝聚力啊！

魏伯同志在柳主持工作期间曾经为可爱的柳州勾划出一幅又一幅美丽的蓝图，其中包括把柳州市建设成为广西重要的中心工业城市的设想和布局，以及市人民广场的建设，柳侯公园的扩建，柳堤和沿江大道和城市居民区的管道煤气建设等，限于时间和财力，这些蓝图在当时无法实现。经过近40年来历届领导带领全市人民坚持不懈的努力，这些蓝图正在一步一步地变为现实。当我看到龙城今日的崭新面貌，又不禁回忆起第一任市长——敬爱的魏伯同志。

思念永不断

——追忆父亲魏伯

穆 紫

父亲魏伯（王经川），于1984年7月18日，因病在北京走完了他的人生旅途。这一年，他七十岁整。

在他近半个世纪的革命生涯中，他始终以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党组织对他革命一生的评价是：

“对党忠诚，顾全大局”；

“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工作极端负责，处理问题积极果断，作风深入扎实”；

“他严于律己，生活俭朴，不搞特殊化。他谦虚谨慎，虚心向下级请教，从不摆架子”；

“他待人诚恳，平易近人，总是替被领导的同志着想，无微不至地关心、体谅他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因而受到同志们的尊敬”。

这些评语是他为人一生的真实写照，毫无夸张之词。

他是我的父亲，更重要的是我作人的榜样、楷模。

自从投身革命以来，因工作的需要，父亲在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因党的需要，从事过学生抗日救亡运动，办过文学刊物，组织过抗日游击队、宣传队，从事过专业文艺创作、当过杂志的编辑、报纸的记者、地方行政领导、重工业

的领导、经济部门、党的宣传部门、文学艺术部门的领导……。党政军文他都干过。他生前的战友、同事都说他“文武双全”。

他每从事一个专业都是努力学习，兢兢业业、钻研业务，力求充当内行。

记得1955年，他作为武汉钢铁公司的生产经理，在鞍钢边实习生产业务，边作去苏联学习的准备。这段时间，他每天清晨学习朗读俄语，上班之余，还努力学习冶金建设生产的全过程知识，那时，他还买了计算尺、兰眼镜（看铁水钢水用的）等学习工具。

1971年，他从广东干校到北京，有关方面及领导曾有意请他出任北京钢铁学院的领导，谈话后，他立即找来毛主席关于教育理论的论述和英语读物，积极学习，以作赴任的准备。他每从事一样工作都特别认真，即使是在五七干校养猪，他也一样钻研，注意猪的生活规律、营养，调节饲料，所以他养的猪比别人的生长速度都快。

不但如此，只要能为党工作，他从不计较职位的高低。

1973年，他闲住在广州，曾托人转话给当时的广州市长梁湘，希望能给他安排点事情做做，不计较职位高低，哪怕市里一个局长也可以。当时梁湘同志考虑到他在中南局已是副部长级地位，安排太低了未免不合适，所以没答应。

他生前最恨那些以权谋私、搞特殊化、搞不正之风的人。每当谈起这些人的行为，他总是痛心疾首。他一生俭朴，从衣、食、住、行到工作作风、接人待物，毫无铺张浮华。正像他生前的一些友好说的“象黄土高原似的粗犷、纯朴、厚实”。

家中的摆设，用物，依普通人的标准来衡量，也是极为普通又普通。沙发、床、衣柜在他在世时看来，就算是“过时”货。他去世后，我们清理衣物时，竟找不出几件高级的。稍好点的几件衣服，还是他五十年代去苏联时做的。可是对待困难的亲戚和同志，他却慷慨大方。他自己的舅妈，孤寡一人，解放后一直由他按月邮寄生活费，直到她去世，而我们的大舅妈及她的老母亲也一直由父母负担生活费用。现在父母已去世，大舅妈的母亲也早在1979年去世，而我们姐弟三人及小舅一家又承担起大舅妈的生活费用。

就是对一些陌生人，只要见人有困难也伸出友爱的双手，记得我们小时，在东北及广西时，遇见一些子女多的生人，总是把我们穿小了的衣服送给他们，有时还送一些食物。

父亲一生性格开朗、乐观、对人豁达，忠诚党的事业。数十年革命经历，风风雨雨，他屡遭坎坷。在延安抢救运动中，他被冤关押审查三年；在1959年反右倾时，又被错划为武钢“反党集团头子”；文革中又一次遭批斗、绑架、关押、劳动改造，长达八年之久。用他的话讲，又一个“抗日战争”的时间。尽管如此，也未动摇过对党的信念。而每次冤屈，他都相信迟早会被党理解的，迟早会弄明白的。

父亲为人最大优点是谦虚谨慎，平易近人，待人接物不以职位高低、权势大小而论。在人面前，他从不以领导者自居。他像一粒种籽，撒到哪在那发芽、生根、开花，他像柳树，插在什么样的土地上，都能适应。从家中的警卫员、保姆到高级领导，他都一视同仁，凡别人有困难求到他，事无大小，他都尽力帮人解决。对待普通干部群众，他也经常主动关心，从工作、学习、乃至个人生活问题。

记得五十年代，那时在我家工作过的保姆，几年后，父亲总是设法为他们找一个立足的职业，以保证他们终身生活。1962年，父亲原在武钢的秘书，随他调到广州中南局，没多久，父亲就帮他向组织上提出按政策解决他妻子及三个孩子由广西北海迁出的问题。问题解决后，全家由北海来到广州，一时，机关安排不了房子，父母即将他们一家五口安排住在我家楼下，并随我们一起吃饭。两个多月后，他们要搬到新分配的房子时，给母亲伙食费，父母坚决不要，只留了点粮票。事后，逢年过节，母亲还总是卖了香烟及糕点，让我们送到他家。

父亲有个同乡同学，是武汉作家协会负责人，1958年被划为右派，来到武汉东西湖农场劳动改造。1959年的一天，他给在武钢工作的父亲来信，说农场围湖造田，他整天在寒冷的泥水里排泥，没有雨靴很不方便。当时正值三年困难时期，市场物资匮乏，父亲收信后，即将他的一双劳保用的高筒雨靴让我寄给了这位同学。父亲去世后，这位长辈多次对我讲，那时，父亲不但不疏远他，还总是开导他，让他相信党，想开点，总有一天问题会得到解决的。另一位在广州造纸厂工作的同志也对我讲，文革中，类似的话，父亲也经常对他讲过。

1983年秋天，原广西壮族自治区一位负责同志，因工作调整，夫妻二人到北京中央组织部来谈工作，父亲知道后，让我和大弟弟买了东西去他们所住的招待所看望，并说，不要因为人家的职务变了就冷淡疏远。

文革时，从干校回到广州的几年中，他闲住在家，还不断帮人解决工作调动问题、房子问题、解决冤假错案问题。

家中整天人来人往，尤其到了晚上。这些人当中多数是一般干部，也有工人、司机。其中有那么几个人，几乎每天来，似乎上父亲这来，已成为他们每天生活中的一件事。因为有时，他们来了并无什么事，甚至人多时，连话都说不上，仅仅坐坐而已。父亲去世后，人家告诉我，竟有几十人自发地到车站为他送行。

1984年他临去世前不久，还对柳州来看望他的同志讲，希望有关部门及领导关怀一下李方同志的入党问题，胡习恒同志的工作问题。他逝世前，住解放军三〇五医院。一年多的时间里，他跟病房里的大夫、护士相处地极为融洽。人们都很尊敬他，称他“魏老”。医务人员跟我们讲，他们医院住了不少领导干部，他们当中有些人，架子很大，治疗上的事、生活上的事都支使护士干。可是魏老很能体谅我们，生活上的事不到万不得已从不叫我们，生怕增加麻烦。因此，他与这些医务人员建立了深厚的感情。1983年夏天，他几乎病逝。机关及家中已为他准备了后事。这时，医院的院长、内科主任、医生、护士请家人到医院，一再表示不惜一切力量延长父亲的生命，哪怕延长一分钟，也不放弃机会，并谈了他们的抢救措施。父亲在他们的精心治疗和护理下，终于又从死亡的边缘赢得了一年的生命。而他临去世前也再三表示，一定要感谢病房里的医务人员及院领导。

他是一个毅力坚强的人，很能克制自己。比如抽烟，一天能抽两包多，当医生劝他戒烟时，他能立即断掉，而不“藕断丝连”。1977年，他去广东韶关出差时，因雨天路滑，不慎摔了一跤，把右手腕折断了。当时在一个部队医院接上，回到广州一检查，接错了位。大夫对他讲，要么就这

样，要么打断了重接，但这样很痛，一般人受不了。父亲听后，决定采用后一种治疗方法。于是，把即将长好的手腕又打断重接，痛疼是可想而知的，可是家里人从来没听他哼过一声。他在逝世前，在病床上曾几次对我和我爱人要求提前结束生命，我想，他一定是被病痛折磨得无法忍受了才这样说的，我听后，如万箭穿心。尽管如此，可我们也没听到过他哼过一声，总是见他平静地、安祥地闭目卧床，直到他告别人世而去。

父亲离我们而去七年了。七年中，我时时记住他的音容笑貌。平时吃到他喜欢吃的东西时想起他，甚至见到他的一些战友，我也总想他们跟父亲长得很像。看到、听到一些丑恶现象，就会想，父亲若在世，他肯定对这些会痛骂的，会生气的；想到这几年随着改革开放政策的贯彻，祖国建设事业飞跃发展，这些不正是他为之奋斗了一生所欲见到的吗？他真是去得太早了，太匆忙了！

肝胆相照 荣辱与共

——忆黎达愚同志

罗杰林

黎达愚同志逝世已经两年多了，他的音容笑貌一直留在我的心中，我们之间的交往情景，也一直记忆犹新。

我与黎老的相识，得追溯到解放前1948年。当时我刚从大学毕业出来，由党组织安排，在柳州龙城中学当教师。黎老是龙中的教师，由于年龄上的悬殊，他比我长二十多岁。我们接触不多，见面点点头而已，可是他那朴实厚道的外貌，亲切和善的仪态，给了我很好的印象。后来听到同事们谈起他与船民的关系，加深了一层好感。黎老的家在对河窑埠，并在那里办了个小农场，每天他得坐渡船往返两岸。渡钱不多，可他常常是付给一张整钱而不要找补，而当他偶尔身上忘了带钱，或是过了摆渡时间，船民们也不向他索取，甚至单独为他一个人开船。

我与黎老结为生死之交，是在1949年5月间。黎老以他全家生命财产，掩护了我和妻子（地下党员、龙中教师唐美真）的安全。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5月19日上午，地下党省城工委紧急通知，根据确切情报，桂系特务到校从旁调查我的情况，为了以防万一，有必要抢在敌人动手之前，将我

以及我有关联的四个同志——毛恣观、丘行、方宏普、唐美真撤离龙中，暂时隐蔽起来。一切按照上级的安排，当天晚上我们5人分头离开学校，消失在夜幕之中。

我与妻子唐美真同志为一路，到指定的地点——萝卜洲对面的沙滩上，与带路的同志会合。带路的梁山同志已经先到片刻了。他领着我们登上一只小艇，向对河窑埠划去。上岸后，我们走过一片菜地，进入一幢平房，这就是黎老的家。

黎老见到我们，会意地点了一下头，显然组织上事前已经跟他联系好了，他已等候多时了。黎老告诉我们说，这里只住着他的老伴和最小的女儿。旁边屋子住的几个农场工人，多是家乡的子侄，全都老实可靠，还说刚才划船的两个青年，就是他派去的，安慰我们尽管放心住下。

第二天一早，黎老主张，要在他的住房里挖个地窖，以防万一发生情况时，好让我们隐蔽起来。锄头泥箕都准备好了，只等我们一齐动手。真是何等大胆的主意啊！要知道在当年，通“匪”、或窝“匪”是与“匪”同罪的，为了完成党的委托，为了保护革命力量，黎老置自己乃至妻子幼女的生命财产于不顾。

我们当然不能接受黎老的这片好心。不管怎样，决不能连累他的一家。几经争辩、说服，最后议定白天我到柳江边上以游水为掩护，伺机而行，与城里的同志继续保持联系，继续坚持斗争，晚上到郊外睡觉。妻则认作黎老的远房侄女，留在他老伴身边。

深夜我悄悄地走出大门，不想黎老竟然跟了上来，坚持着非要陪同一块出去不可，怎样劝阻都没有用，这次轮到我让步了。他还叫两个工人，各人扛着一支七九步枪，装着打猎

的样子，随后护送。就这样每天夜里，我们一行四人散开着走，在羊角山一带辗转，实在困了，就倒在草丛中睡上一觉。山上蚊子极多，直往耳朵鼻孔里钻，说是睡觉，实际只能眯上一眼。可是为了不打扰对方，大家都装成安然熟睡的样子。后来黎老进城特意用高价买回一瓶美制防蚊油，基本上解决了睡觉问题。

一个晚上，四周漆黑，黎老在前面带路，走着走着，只听扑通一声，掉进坑里了，这时我什么也来不及想，跟着飞身跳下去扶他。原来这是抗战时期日机留下的炸弹坑，一米多深，坑里长满了野草和荆棘，不留意是不容易发觉的。我们的脸部手臂和脚裸被划破多处，幸亏没有伤到筋骨。这一摔，睡意全没了，两人索性挨着坐在坑里，细声叙谈，直到东方发白。

白天，黎老照常到学校授课，晚上陪同我一道上山隐蔽，紧张的生活连续了一个多星期。我年轻能睡挺得住，黎老明显地瘦了下来，可是在我们面前，他从没表现出半点困倦的样子。而这时伪街长的身影频繁出现在窑埠的街头巷尾，因为此刻柳州城里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寻师运动，地下党利用我们5人的被迫出走，变被动为主动，发动群众，向伪政府要人。龙城中学成立了寻师委员会，登报呼吁“还我老师”，博得社会人士广泛同情，一时间搞得敌人昏头转向。反动当局是不会就此罢休的，伪街长的活动就是个讯号，他们在四处搜捕我们哩。这时组织上再次决定，要我们立即第二次转移。临别时，黎老一家依依不舍，他的老伴抱歉地说没有招待好我们的吃和住，过意不去。抱歉的应该是我们，看着黎老憔悴的面孔，我无言以对，有什么语言能够表达对这

一家如此深情厚义的谢意呢！

8月中旬，我们奉命离开柳州，前往梧州，担负解放城市的准备工作。解放后才知道，就在我们离开窑埠的当天中午，伪街长直闯黎老的家，东瞧瞧，西看看，查遍了每个角落，农场的四周也散布着许多陌生人，结果一无所获，悻悻地走了。此人镇反时被镇压。

解放后的五十年代，黎老出任柳州市副市长，柳州市民革主委，我在区党委统战部工作。旧的友谊加上新的业务关系，我们经常在一起开会，经常促膝谈心。我知道他迫切要求入党，从感情上说，我高兴他能遂了自己的心愿，可是由于工作的需要，组织上认为他留在党外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经过说明，黎老愉快地服从了组织，参加民革，并担任主委职务。在任职期间，他代表民主党派，与柳州市党委共同议政，互相监督，做到很好的合作。

五十年代后期，我调离统战部，接着下乡搞“四清”运动，再接着是到十年浩劫——文化大革命，一晃十多年，我们没有见面，也中断了通讯联系。

1970年我获得“解放”，挈妻携子全家一锅端，下放柳州地区。安顿好了吃和住，第一件事便是打听黎老的消息。谢天谢地黎老人健在，但是尚未获得“解放”。人在就好，我深深地舒了一口气。

星期天一早，准备了一点微薄的礼物，带领着5个儿子，浩浩荡荡地去看望他老人家。一路上我指指点点，将当年龙中出走，窑埠避难的实情实景讲给儿子们听。重温往事，我怎么也想不通一位与党有着血肉联系的老人，如今竟被当成敌人，等待着第二次“解放”。

大队人马的突然到来，出乎黎老意料之外。一见面，他欣喜得简直有点手足无措。过了一阵，面带难色地说：“你们敢来看我，我还没有解放呢！”原来黎老在为我们耽忧，怕政治上连累我们。确实，在那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月里，无限上纲，株连一大片的事例是屡见不鲜的。黎老一如既往，在自己身处逆境的情况下，仍然顾及着他人的安危。我正色对他说：“二十年前你连丢脑袋都不怕，今天我会怕受连累吗？”经过一再表态，他才安下心来。这一天我们谈了许多、许多。谈到彼此被批斗的受辱的情况，谈到对文革的看法……。特别令人既气愤又喷饭的是，黎老解放前多次掩护地下党的同志，竟然也成了他的罪状之一。造反派的原话是：为什么这么多走资派、叛徒、特务、假党员都跑在你那里隐蔽，你与他们是什么关系？黎老说他始终相信我们这些人是好人，毫不后悔当时做过的一切。正因为他坚持了正义，不肯在同志们脸上抹黑，而激怒了造反派，遭到一次又一次的批斗。

黎老说他相信党，相信同志，相信自己，尽管处境恶劣，可思想没有负担，心中坦然踏实。他的神情一直是乐哈哈的，甚至说到受辱的时候，也是长者对后辈的宽厚口吻。他带我们参观他的菜园，看他养的鸡群，样样东西打理得整整齐齐，有条不紊。确实，没有无私的情操和坦荡胸怀的人，是不能做到这点的。那一天，他宰杀自己养的肥鸡招待我们。

黎老毕竟是上了年纪的人，每天步行到市里参加学习班，无休止的检查交待，过度劳累病倒了。我知道后，设法从单位要了辆车，接他进城看病。车开到沿江马路时，远远

看到他正由大女儿黎鲁非搀扶着，缓缓向前行进，我让他上车，他推辞不肯，原因仍然是自己还没有“解放”，怕在公开场合出现，对我影响不好。我心里一阵酸楚，鲁非忍不住掉下泪来。人都病倒了，还一味为他人着想。我不管这许多，硬将他拉上车。我告诉他，市革委再次派人外调，我和唐都写了实事求是的证明材料，估计我们这些“走资派”陆续“解放”了，材料是能起作用的，他的“解放”是有希望的，况且真金不怕火炼。我还半开玩笑地说，解放前你与共产党员有过生死相连的关系，文革中又经受共同受辱的考验，看来光荣同享的日子不会远了。黎老点头称是。我们四只手紧握在一起，很久不松开。

1971年黎老果然“解放”了，但还没有恢复原来的职务。可是只要一有工作，他就积极去完成，全然不顾老之已至。为了上班的方便，他搬到市区里住。当年在“先治坡、后治窝”的思想支配下，干部的住房条件相当艰苦，黎老分在一幢六层楼上一个套间，楼梯狭窄阴暗，白天也要摸着上下，他没有强调困难，要求更换。他老伴患了重病，黎老精心照顾料理，尽最大力量请医生抢救。一天，当请来的医务人员爬上楼去时，老伴已经停止了呼吸，静静地离开了人世。那是一位和善淳朴，与人无争的劳动妇女。

黎老晚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是一位光荣的正式共产党员，逝世前，预嘱家人将抚恤费全部交作党费，不留骨灰，丧事从简。

1987年11月24日黎达愚同志逝世的噩耗传来，当时我在医院留医，不顾医生的劝阻，和美真同志立即赶赴柳州，沉痛悼念挚诚的战友。用今天的话来说，从组织与组织的关系

讲，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从个人的关系讲，我与黎老也称上是“肝胆相照、荣辱与共”。这样深厚的情谊是永恒的、不灭的。

（原载《柳州党史资料》第17期）

秋 枫 向 日 红

——记解放战争时期的高天骥

刘 明 文

1946年至1949年，我在柳州私立龙城中学求学，1948年1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当时高天骥是龙中校长，兼任过我班的英语教师。1982年我调到中共柳州市委党史办工作后，曾多次访问高天骥并帮他整理了回忆录《争取秦镇等人投诚情况》和《保卫城市，支援前线》。本办干部刘彦云和黄耀荣访问了熟知高天骥情况的马伟、方宏誉、胡习恒、曾少庆、丘行、沈章平、李立民等同志，还查阅了有关的档案资料。在纪念广西解放40周年的时候，特整理这份史料，以寄托对老校长的哀思。

（一）

1946年，国民党广西省政府为广西的4所私立中学颁发的教学成绩优良奖状名单中，首榜就是高天骥创办的柳州龙城中学。龙城中学和高天骥的声誉，传遍全省。可是到了1949年下半年，高天骥和龙中却遭到厄运。8月，省政府撤了高天骥的校长职务。接着，又在9月14日下令解散龙中。

“罪名”均是高天骥与龙中“历年底纵匪党，策动不法活动，败坏校风，淆惑人心，破坏戡乱建国事业”。反动派下

一步的目标，将是置高天骥于死地而后快，高天骥已置于特务严密监视之中。9月18日傍晚，中共柳州城工委派党员曾少庆、黄维光、明乐将高天骥从虎口救出，先后转移到鹧鸪江和雒容县丹竹乡岩面屯隐蔽活动。

高天骥被撤职和龙中被解散，亲者痛，仇者快。柳州城的特务报纸，连续抛出《树倒猢猻散》、《擒贼先擒王》、《龙中恶贯满盈》等社论和杂文，对高天骥和龙中进行围剿。反动派给高天骥和龙中罗织的“罪行”，恰恰是高天骥和龙中党组织光荣的、正义的革命行动。

解放战争时期，高天骥先后聘任了马伟、陈光、侯信、梁华新、曾少庆、姚冕光、罗杰林、毛恣观、丘行、方宏誉、王少白、沈章平等30多名共产党员和黎达愚、王明初等10多位进步人士为龙中教职员。原属广东粤桂边特委领导的柳州特支机关设在龙中，属中共广西省工委领导的柳州县委也在龙中建立了党组织，前后共发展了学生党员26名，爱青会员和学联会员数十名。敌特要逮捕的王明初、姚冕光、马伟、方宏誉等人，都因高天骥“泄露机密”而“漏网”，甚至连后来远在忻城工作的地下党员梁华新，也因得到高天骥的报警而幸免于难。1946年3月29日，高天骥接受王明初（30年代的共青团员，1949年在广东打游击时牺牲）的意见，拒绝带领全校师生参加国民党和三青团联合举行的全市青年反共大会，接着，又坚决拒绝国民党、三青团在龙中搞党、团员总登记。全面内战爆发后，柳州全城到处是“剿灭共匪”、“戡乱建国”的标语，而龙中却没有。有的是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壁报。城里到处传唱“今朝有酒今朝醉”之类靡靡之音，而龙中学生唱的却是《茶馆小调》、《古怪歌》、《山

那边哟好地方》、《团结就是力量》等反美反蒋的歌曲；演出的是解放区歌剧《兄妹开荒》和活报剧《你这个坏东西》。1949年5月，当龙中的地下党组织散发传单被敌特侦悉的时候，身为“柳州市学生运动分组”（国民党镇压学生运动的组织，各中学校长被指定为该组组员）成员的高天骧，不仅没有“引咎自责”，反而在学运分组召开的紧急会议上“狡辩”：“过去本校有一学生因无意中用共党之传单包物，至实用会计校遗落下地，被人发觉，遂误传为龙中有大量的反动宣传印刷品，主持人为高天骧，闹得满城风雨……本人在柳的行动为多数人所深悉，不须详细辩明，自有公论。”（摘录自敌伪档案《柳州市学运分组会报记录》）军统、中统、桂系多次向龙中推荐“老师”，以便安“钉子”，高天骧在马伟、方宏誉、曾少庆等地下党员“参谋”下，有的让其进来后而孤立之，有的只给他做个把学期便“礼送”出校。高天骧是柳州头面人物之一，社交很广，他的亲戚“朋友”中，富商、豪绅、军统各色人物都有。他就利用这一有利条件，打听敌人的情报，转告马伟和方宏誉等人。为了防备反动派对龙中的突袭，高天骧买了13条枪，组织武装护校，他将枪支发给地下党员曾少庆、沈章平、胡敬之和民主人士李立民、赖德昭等可靠的教职工，万一发生事变，实行武装拒捕，潜渡柳江，奔赴柳北游击区。1949年4月，方宏誉受党指示，介绍高天骧参加党的外围群众组织——广西民主人士联合会，同年9月，高天骧在农村隐蔽活动期间，会见了地下党省城工委书记陈枫和柳州城工委委员胡习恒。高天骧激动而恳切地说：“反动派把我逼上‘梁山’，我要和你们做同生共死的同志和战友，不能留在党外当朋友了，请党组织

批准我加入党的行列！”在陈枫的同意下，胡习恒代表城工委表示欢迎，而且愿意做他的入党介绍人，答应回城后办理入党手续（柳州解放后城工委于12月14日为高天骥举行了入党宣誓仪式）。当时高天骥见地下党缺少活动经费和武器，立即写信派人回家要了800元银毫交给党，还把身上的两支手枪交出来作为保卫党领导机关之用。

（二）

高天骥从一个党外民主人士成为共产党员，经历了一段痛苦而曲折的过程。他是柳州市人，1910年出生于一个官僚地主家庭，在旧桂系时期，其父曾任广州少将城防司令。高天骥青少年时代在香港、上海、南京等大城市求学。在上海读书期间，他参加了党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秋，他从上海大夏大学毕业后，抱着教育救国的思想，放弃了出国留学的机会，说服母亲捐资献产，与地方人士合作创办了龙城中学。他是一个爱国者，亲自带领龙中师生到农村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还担任过柳州文化界抗敌救亡协会理事长和救亡剧团团长，为抗日救亡运动奔走呼号。年轻气盛、闯劲十足的高天骥还跻身政界，一度当上了三青团柳江分团部筹备主任和柳州日报社长。他踌躇满志，以为龙中的前途和个人的名誉地位可以“青云直上”。事实恰恰相反，在国民党各派系权力斗争的激烈角逐中，高天骥不仅丢官弃职，连龙中的校舍也被国民党军队强占为伤兵医院。他为龙中寻找财源而苦心经营的珠江木业公司的2万多棵树木，也被国民党军第四战区长官部封存征用。在日本侵略军占领柳州期间，他目睹了国民党军队的溃败，达官贵人趁战乱大发国难财，人民生活

处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一心效忠的“党国”如此腐败，对他如此冷酷无情，他迷惘了，他愤怒了。可是没有找到明确的出路，他对蒋介石集团失望了，但仍对国民党的某一个派系抱有幻想。正当高天骥在政治上感到痛苦和徬徨的时候，全国解放战争的革命形势教育了他，学校里工作起来象一团火一样的进步教师们的献身精神鼓舞了他，使他振作起来。他要寻求真理，他要奔向光明。为了听到共产党的声音，他买了一台收音机交给党员教师胡敬之保管。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和方宏誉、胡敬之在一起收听新华社的广播，《将革命进行到底》、《在中国共产党第七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报告》、《论人民民主专政》等毛主席的文章，犹如甘露滋润了他的心田，似火炬照亮了他前进的道路。高天骥终于明白了：光搞教育救不了国，只有跟共产党闹革命才能救中国。他向方宏誉表示了倾向革命的心愿。方宏誉因势利导，介绍他参加了党的外围组织。过去他仅凭正义感和一种复仇的心理（因为他饱受国民党的排挤和打击）去办学和同情支持党领导的爱国民主运动。现在，他以一个革命战士的身份自觉地参加革命斗争。高天骥参加革命后，毅然地抛弃了富有和温暖的家庭生活，冒着杀头的危险，到深山野岭吃苦受累，开展迎接解放的斗争。他为此感到无比光荣，兴奋得到岩面屯的桐林中吟起诗来：

山城泉窠恶，我夜走无踪；寄迹岩面下，长吟桐林中。
落叶迎风舞，秋枫向日红；柳洛隔咫尺，山川竟千重。倒悬指日解，何为患蹇穷；欲知大军讯，勤听北山风。

解放后，高天骥在《我的简历》、《关于我与地下党的关系》两份材料中对自己由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的

过程，作了记述：从1945年7月至1949年9月，“我一直不断与进步教师包括地下党员接近，并由一般共同办学的感情逐步达到趋向进步政治感情，与他们团结无间，相共安危，共同维护龙中的安全和发展。在他们的影响下，使自己对当时的革命形势逐步有所认识，个人思想有所提高。同情他们反对蒋介石匪帮所执行的独裁和打内战的反革命政策的观点，同意他们在学校墙报上、讲课中所反映的革命主张，支持他们在学生中进行革命知识的灌输和培养，接受他们的建议在校内实行民主教育，在学校行政管理上采取一些民主措施……”“1949年3、4月间，在方宏誉与我的一次谈话中，初步转入和地下党发生组织上的关系。在这次谈话中，我表明了要参加组织干革命的要求……”高天骥还在《诉衷情》的这首诗中，表露了他和反动统治阶级彻底决裂和革命到底的信念：“朱门酒肉震庖厨，饿殍暴通途。凛然怒目以对，宣教聚生徒。传马列，警顽夫，斗城孤。持枪举义，为拯烝民，何惜头颅！”

（三）

高天骥在深山老林中盼望“落叶迎风舞，私枫向日红”的日子终于来到了。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了。高天骥以无比喜悦的心情和热忱，投入了维护社会治安和接管城市建立人民政权的工作。解放初期，他先后担任柳州市人民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和市人民政府副市长等职务。龙城中学在解放后的第6天复校上课。党在龙中多年培育的革命种子开了花结了果，成百名的共产党员、青年团员、爱青会员、学联会员输送到党政机关和部队去工作。高天骥积极协助党和

政府去团结与教育原国民党的中、上层人士和地方士绅，争取了国民党柳州警备司令秦镇、雒容县县长王公吾向人民投诚。1953年以后，高天骥调到自治区从事文化教育和体育运动工作。由于他成绩卓著，荣获新中国体育开拓者金质奖章。1985年10月24日，他走完了生命的旅程，终年75岁。10月29日，在柳州市殡仪馆举行的向高天骥遗体告别仪式上，自治区体委负责人介绍了高天骥的生平，他说：“高天骥同志的一生，是追求光明、追求进步的一生；他在实践中认识真理，抛弃旧我，由一个民主主义者转变为共产主义者……不愧是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龙中校友会给高天骥送了挽联：“缅君兴校勋劳，创业维艰，袍泽情深柳水；痛我明师殒谢，哲人其萎，生徒哀思满龙城。”

（原载《柳州党史资料》第17期）

革命烈士

(新民主主义时期)

刘明文

张胆烈士(1905—1927)

福建省顺昌县人，字芸生。1925年在广州参加中国共产党。1926年以国民党党员身分任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秘书。同年7月，受中共南宁地委派遣，以国民党党务指导员身分到柳州工作，配合先期到柳的共产党员陈岳秀、罗琴谱开展建党活动。张胆一到柳州，便领导省立四中学生非基督教同盟和柳江学生联合会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中共柳州支部干事会成立后，张胆任组织干事。同年10月，共青团柳州支部成立，张胆兼任书记。张胆擅长宣传鼓动和统战工作，曾深入柳城、融县、象县、柳江等县指导农民运动和青年运动。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张胆被捕，9月1日就义于南宁。

熊秀民烈士(1898—1927)

柳江县成团乡人，壮族，字朝栋。1925年5月在梧州国民党宣传员养成所学习，接受共产党员教官谭寿林、毛简青的教育，成为国民党左派分子。回乡后开展农民运动。1926年10月任国民党马平县(即柳州旧称)党部青年部部长。同年冬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国民党柳庆党务整理处党员特别训

练班教官，还奉派到河池、宜山等地开展革命运动。1927年8月在宜山被捕，押回柳州下狱，坚贞不屈，慨慷赴死，同年10月被国民党杀害于更新亭（今三中路口）。

刘策奇烈士（1895—1927）

象州县人，又名啸真，中共柳州支部的首批党员。1925年5月在梧州国民党宣传员养成所学习，受到共产党员教官的教育。他在梧州《民国日报》发表《广西青年的切要问题》、《干、干、干！》等文章，主张反帝反封建，实行国民革命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结业后回到象州组织革命青年社，与地方上的反动势力作斗争。刘策奇是个优秀的民俗学专家，对广西少数民族的历史、语言、风俗有深入的研究，他的著作多次在北京大学的学报发表，《鲁迅全集》亦载有他与鲁迅的通信。1926年冬，张胆邀他到柳州工作，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并在国民党特别训练班任教官，讲授革命运动史。1927年9月他带领一批学员到南宁工作时被捕，经亲友保释出狱后仍坚持革命斗争，遂二次被捕，12月被国民党反动派杀害。

陶保桓烈士（1910—1937）

融水苗族自治县人，原名陶保康。17岁在家乡读小学时，参加了中共柳州支部领导的外围组织“革命青年社”。1933年在桂林就读广西师范专科学校，受到共产党员教师的教育，积极参加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和“六·一”运动。陶保桓与一些进步同学秘密发起组织“反帝反法西斯大同盟”，领导进步同学与学校的托洛斯基主义势力进行斗争。1936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任中共桂林特支书记和桂林县委委员。1937年3月中共广西省工委派他到柳州恢复重

建党组织，任中共柳州支部书记。他以省立柳中（今柳高）教师职业为掩护，在柳中和沙塘农学院发展了一批党员，建立了党组织。他积极领导了柳中的反对托派言论的斗争和柳州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因此遭到桂系军阀的忌恨，遂于1937年8月31将他逮捕投入桂林监狱。他遭受酷刑，四肢被打断，遍体鳞伤，但他坚贞不屈，9月17日被桂系军阀杀害于桂林。用生命和鲜血保守了党的秘密和党组织的安全。

赵素娥烈士（1921—1941）

柳州市中山东路人，女，别名艾侠。1937年在柳中读书，积极参加中共柳州支部领导的抗日救亡运动和反托斗争。抗日战争爆发后投笔从戎，随广西学生军开赴安徽六安、合肥前线，从事战地救护等工作。在此期间参加中国共产党。1940年春，奉党组织指示转移到新四军工作。同年11月她随刘少奇率领的“乌江大队”来到江苏省盐城地区开辟工作。担任了民运工作队队长，发动群众与日本侵略者和汉奸伪军进行斗争。1941年6月，赵素娥任中共十三区委委员。7月反“扫荡”时不幸被敌伪军俘虏。伪军师长徐绍南对她软硬兼施，逼她投降。赵素娥坚贞不屈，高唱《国际歌》表明自己的革命气节。恼羞成怒的敌人无计可施，遂于11月初将她活埋。

陈守善烈士（1921—1947）

柳州市人，女，别名辛文。与赵素娥烈士是同学和战友。1938春，随广西学生军到达安徽大别山区，参加了中共鄂豫皖区委的地下组织。入党后改名辛文，她擅长演讲、演戏、唱歌和新闻报道。1940年初，她正式参加新四军，先后在江苏省盐城、淮海地区从事民运和新闻工作，任《淮海

报》记者。1942年夏，任涟水县敌工部部长，经常化装为农妇深入敌占区进行策反工作。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又破坏和平谈判，内战全面爆发。她随军转战沂蒙山区。1947年4月，她参加了华东野战军全歼国民党王牌军整编74师的孟良崮战役，因积劳成疾住院治疗。在一次国民党飞机轰炸时牺牲。

侯 信烈士（1919—1949）

柳城县太平乡人，又名侯骏驹。1938年底参加广西学生军，在南宁、武鸣一带做战地动员和锄奸工作。1940年11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1年以后，到柳城、全州等地活动。1944年秋，日军攻占柳州，他到罗城参加柳州日报社地下党组织领导的抗日工作。1946年春，在柳州私立龙城中学任教务处干事，任中共柳州特支组织委员，积极参与领导柳州学生反内战、反迫害、反饥饿的民主运动。同年冬转移到贺县工作。尔后回到柳北地区活动。1948年10月，他与其他同志一道成立了柳北地区的第一支武工队，并任队长。随着武装力量不断壮大，他先后任桂黔边人民保卫团第二大队大队长、柳北人民解放总队第二大队大队长。他在游击战争中，多次带领部队奇袭敌人和粉碎敌人的“围剿”。1949年11月15日在解放太平圩的战斗中，他带领战士冲锋时中弹牺牲。

贺智华烈士（1930—1949）

柳州市人，原籍湖南，女。1944年秋，柳州被日本侵略军攻占，她家疏散在成团乡避难。不久，成团乡亦沦陷。她在哥哥、姐姐的带领下参加抗日活动。一次，她和姐姐贺莉华化装进入成团圩场，秘密运送枪支给游击队员，打死了日军军官曹开川。1946年，贺智华就读龙城中学，在学校地下

党组织的教育培养下，参加了革命文学社团“奔流社”，积极参加党领导的反对美帝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后来被党吸收为爱国民主青年会会员。1949年2月，受党组织派遣参加中共上忻工委领导的农村武装斗争。她先后在忻城县冷水、果后、龙锁等村庄，从事妇女、儿童、宣传工作。5月25日，都宜忻人民解放总队某部在大塘附近的稀饭坳与国民党军队激战，贺智华中弹光荣牺牲。

（未完待续）

记著名国画家邓俊群

方 贵 益

邓俊群，号梅谷、六然。原籍广西融水县，后迁居柳州。1906年出生，1934年毕业于上海美专。他从事国画和书法逾半世纪之久，经验丰富，艺术精湛，是著名国画家。曾任前广西桂林美专国画系教授、柳州市六中美术教师（1973年退休）、广西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书画函授大学柳州分校顾问、柳州画院顾问。他是柳州市政协委员、中国民主同盟盟员。他擅长绘画梅、兰、竹、菊、松、鹤、鸡、鹰、猫、马、鱼虾、蟹、山、水等等。所绘形象，维妙维肖，栩栩如生。尤其画梅，生动逼真，活现纸上，因有“画梅圣手”之称。而尤为难能可贵者，是对水墨之运用，能一笔六彩，堪称“丹青妙手”，有“八大山人”之神韵，突出国画传统之功力，独具一家艺术风格。《光明日报》评论其作品称：画竹节能圆，竹节发亮，超过前人；画梅也具特色，笔墨变化无穷，耐人寻味；画鱼、虾、松、鹤，极为生动，别具心裁。他能题诗，且擅书法，堪称诗、书、画三绝。

他在上海美专时，得我国著名画家刘海粟校长的教导，诚所谓有名师必有高徒，为他日后打下创作和成名的基础。

他于1941年与友人、名画家马万里等创办桂林榕门美术专科学校，推举马万里为校长。时值抗日战争进入第五个年

头，物价飞涨、币值低落、金融混乱、人心惶惶，教师、经费、校址、校舍均得之不易。但由于他对国画经验丰富，造诣精深，在艺术界及社会上颇均有声誉而争取得到各方支援，并一面作画筹集资金，终能建成第一所美专，开广西历史上创办美术专科学校之先河。培育造就美术人才甚众。

他当时任国画系教授，对学生讲授用笔墨的技巧，求灵活变化，破除呆板古法，教学生在传统中突出新意境。当时就读者，多能脱颖而出，并独立作业。因而甚得马校长所器重和学生爱戴。

1956年，他作《鱼峰与龙潭之新气象》一幅，获选入全国第二届国画展览会展出，后参加广西第一届国画展览，被评为优秀作品奖，载入《优秀国画作品纪念册》。此画现为广西博物馆所珍藏。

1980年，民族友谊画苑特邀请他带作品去北京展销，他的作品备受外宾赏购。同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来柳为他拍摄书画生涯记录片，题为《水墨丹青》。他即席表演的国画老梅、葡萄、鱼虾和草书“龙飞凤舞”4个大字收入镜头。嗣后在国内外放映，颇得观众称赞。

在1983年，桂林博物馆展销他的作品《鹤立鸡群》时，日本客人以15万日元购买。他的书画，深受国内外艺术爱好者和收藏家所欢迎。

1985年春，柳州市博物馆等单位，曾联合举办他个人的书画义卖展览，他所得画酬，全部奉献给修筑柳堤和设立“六然书画苑”之用。

1987年4月25日，由广西区文史研究馆主办的滇、川、黔、桂四省区及渝、沪两市书画联展，在南宁广西博物馆开

幕展出，作品共320余幅，作者200余人，多是已有四五十年经验的老书画家。邓老入选四幅。此中、有2.7×1.8公尺的巨幅20鹤苍松画，其画幅之大，是居所展出的书画中首屈一指者。其布局极为壮观，所画亦甚生动，堪称难得佳作，吸引了众多观众观赏。

是月27号在广西军区招待所，由区馆号召各参展者进行书画表演，邓老表演敏捷画竹，每20—30分钟创作一幅，且生动逼真，参观者甚为惊叹，忽有许多艺术爱好者持纸来请他赐画，即席许之。

出席联展的全体人员，于同月29日赴桂林参观并开笔会，他曾题诗四首：

聆四川重庆代表程同志发言感咏

聆君高论适吾心，古法相承是识音；
发展精华传后代，光辉灿烂世人钦。

书画联展观感

文史由来盛著功，西南省市汇相通；
佳书佳画同联展，丰富文明四化隆。

在联展座谈会上

馆员代表汇邕州，欣见西南气象稠；
联展诗书新画作，各彰风采映千秋。

泛舟漓江

欣泛漓江碧水舟，万里丛翠焕风流；
合将诗句联成韵，付与骚坛雅唱酬。

笔者亦得参加联展开会观摩，后来又随同邓老游七星岩及七星公园。当时他虽已达耄耋之年，惟精神矍铄，步履尚健，游兴甚浓，于七星公园内曾与他摄影留念。

同年6月14日，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又第二次来柳为他拍摄画大竹的记录片。题为《柳州印象录》。后来于国内外发行放映。

邓老除长于书画外，复工于诗。他著有《清风集》七十九卷，作诗一万余首。这是他老人家50多年来智慧的结晶。诗句多为题画和感怀。现为他故乡融水县县志部门所复印和珍藏。其书法墨宝，在桂林西山、象鼻山和柳州都乐岩等风景名胜处，有立碑刻石多处，其笔法潇洒，苍劲端庄流畅。

同年，中国函授大学（浙江）宁波分校编纂《中国当代名画家辞典》，收入邓老的作品和个人的中、英文自传，向国内外发行。

邓老为继续和发扬祖国的书画艺术传统，穷毕生之精力。他曾到各地培育大量书画人才，如永福县之何道德，桂林之梁寄尧、唐道昌、南宁之罗鼎华、马慧仙（女）等，均已成为画家。他一生为祖国文化作出无私的奉献。他态度和藹，平易近人。他治学严谨，淡泊名利，生活朴素。1990年1月26日，因患脑溢血经医院多方抢救无效，于柳州与世长辞，享年85岁。

回忆父亲肖甘牛

肖丁三

我的父亲肖甘牛离开人间已有八个年头了，可他酷爱文学的精神和艰辛的创作生活情景却仍清晰地留在我的脑海里，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父亲原名肖钟棠，后因追随鲁迅的文学事业，甘愿作人民的“牛”，故按鲁迅的诗句“俯首甘为孺子牛”而取笔名肖甘牛。父亲是广西桂林永福县人，1905年出生，壮族。祖父是教师。祖母善于唱歌又善讲故事。祖父创办桂岑民族师范学校，教师学生来自十多个民族，父亲在家庭和学校的影晌下，自幼就深深地爱上了少数民族文学。

父亲从小爱听奶奶讲故事，并且爱写故事。他在桂岑师范读书期间，就开始在校刊上发表故事，并常到小学去给学生讲故事。

我的母亲潘平元也爱好文学，尤其爱听爱写故事，常常和父亲一道下农村去搜集整理少数民族民间文学资料。在父亲漫长的文学生涯中，母亲不但是他的贤内助，而且是他终身的文学伴侣。父亲和母亲曾合作搜集整理和出版民间故事集。

1929年，父亲随祖父到平乐中学任文学教师，并到平乐小学去兼课。这期间他经常给全校师生讲述生动而有意义的

民间故事、给学生唱儿歌和民歌、还辅导学生讲故事、写故事。

为了教学和收集整理民间文学以及创作需要，父亲刻苦攻读语文，特别是语法。在上海文学院学习这段期间，撰写《中国学词辨正》和《中国修辞学讲话》，由上海春光书局出版。

1934年，父亲大学毕业荣获文学博士学位，回到广西梧州中学任教，并参加《梧州日报》的《春笋》文艺副刊工作。后因副刊内容切弊及国民党梧州政府，难以继任而被迫转桂林中学任教。

抗日战争期间，父亲看到一批一批少年儿童从各地疏散到桂林的悲惨情景，熬了几个不眠之夜，写了儿童剧《孩子流亡曲》、《家在哪里》、《流浪儿》，亲自导演，还带领学生到街头街尾给苦难的孩子们演出。有的感动得泪珠滚滚，有的甚至扑在妈妈怀里放声痛哭。

在这期间，父亲常利用寒暑假深入苗山瑶寨采风，搜集了大量的民间文学资料。他还渡过海峡，到台湾高山族人民聚居的地方搜集高山族民间文学资料，解放后出版了高山族民间故事集《日月潭》、《椰姑娘》、《浊水溪》、《台湾民间故事集》（与母亲合作）。

解放初期，他主动申请并获上级批准到桂北瑶族地区参加土地改革工作，这期间作了诗歌《刘付生诉苦歌》，由土改办公室印发到各地区宣传，对进行阶级教育推动土改运动起到了很好的作用。

土改结束后，父亲又要求到少数民族聚居的来宾、大圩、宜山等地任教。在这里三年时间，他边教书边进行民间文学的搜集整理工作，发表了大量的各族民间故事，出版了《宝盖山》、《长发妹》、《铜鼓老爹》、《刘三姐》等民

间文学集子。其中《刘三姐》是我和父亲合作。我还清楚地记得，1955年冬，我和父亲顶寒风冒冷雨到刘三姐家乡——宜山下枳村采风，时大路泥泞，难于行走，父亲几乎跌成一个泥人，可他仍然精神抖擞地前进。到了下枳已是暮色苍茫，他换上干衣，饭也顾不上吃就访东家走西家。吃过晚饭，已经午夜，奔走了一天，累得精疲力竭，刚脱下衣正要上床休息，忽然听隔壁韦老爹说，下枳河边有座小石山，山下有一长石条，传说是三姐和小牛到那里砍柴时挑断的扁担化成的。父亲听了很高兴，立刻穿上衣服，打亮手电叫我去看。我说明天再去吧，父亲却说，“抢救民间文学，就要分秒必争呵！”说完，匆匆地走了。我在后面紧紧跟着，回来已经是凌晨两点多钟。两个月以后，父亲在病床上编写桂剧《刘三姐》，不久与宜山观众见面了。半年后，我们父子共同整理的民间故事《刘三姐》，由北京通俗读物出版社出版。

由于父亲对民族文学的酷爱，1956年春，毅然辞去教师职务，带着全家迁入苗、壮、瑶、汉同胞聚居的大苗山区落户当农民。他穿上少数民族服装，和少数民族同胞一道伐木、种田、走寨、坐火塘。

在深山老林中生活的日子里，他曾多次迷路未归，爬上大树枝丫渡过寒冷的夜晚；也曾经掉进山沟被山蚂横咬得两腿流血。不知多少个夜晚，他蹲在火塘边，映着火塘里一闪一灼的光亮，记录老人们唱的民歌和讲的故事，直至深夜。他常躺在火塘边的稻草堆上睡觉。

在深山老林里，父亲常遭到毒蛇猛兽的袭击，有一天，几个苗族儿童拿着猎枪带领我和爸爸去采风，途经老林，突

然，从山洞里窜出一头山猪。一苗童立刻命令伙伴们隐蔽，叫我和父亲爬上树去。山猪走近了，众枪齐鸣，山猪被打伤，疯狂地向我和父亲扑来，窜到树下，用嘴不停地拱着树兜。父亲叫我不害怕，他脱下身上的单衣，向山猪头丢去，衣服蒙住了它的眼睛，跌跌撞撞地摇摆着。这时，小猎手已装好第二枪火药，“呼”的一声，山猪倒在地上挣扎。父亲跳下树来，拿起钢叉，对准山猪头，“咔嚓”一声，山猪踢了两下，躺在血泊中不动了。一年以后，父亲写成儿童文学小说《打山猪》由上海少儿出版社出版。接着又出版了《龙牙颗颗钉满天》、《红水河》故事集及挽救了日本妇女北鸟岁枝和两个孩子生命、引起国内外轰动的苗族民间故事《灯花》。

1957年，父亲加入了中南作家协会、广西文联，还当选为广西政协委员。

1957年至1958年，父亲以惊人的速度连续出版了民歌集《大苗山情歌集》、《哈迈》、《双宿岩》、《苗山走寨歌》、《眼泪河》。民间故事集《大苗山民间故事》、《亮眼宝石》，散文集《香香的集子万年长》，传记故事集《韦拔群和瑶族人民》，桂剧《一幅壮锦》。

1959年，父亲虽身体不佳，可他仍以惊人的毅力创作。这一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出版了散文游记集《采风小记》、《壮锦里的花纹》，小说《深山探宝》并完成了电影文学剧本《一幅壮锦》，由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拍摄，获得全国电影优秀剧本奖和1965年的卡罗维·发利第十二届国际电影荣誉奖。他创作的《金耳环和铁锄头》也在这一年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成动画片。

由于父亲创作的成果显著，这一年，他被吸收为中国民

民间文学研究会、广西作家协会会员，并担任广西民间文艺研究会理事。

一九五九年，父亲应邀参加《广西壮族文学》的编写工作。他带领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学生深入壮族山区进行艰苦的采风工作。

1960年八月，父亲到北京出席了全国第三次文代会，受到更大的鼓舞和鞭策。从北京回来后，他即兴致勃勃地到东兰、隆林、龙胜、河池等县采风，采集了大量的创作素材。

1961年底，父亲出任柳州市桂剧团顾问，全家迁出大苗山，定居柳州。

从1962年至1963年，父亲除了为剧团编写剧本外，还收集整理和创作了大量的民间故事、儿童故事、小说、散文。这期间，他当选为中国作协广西分会儿童文学委员会主任，被吸收为电影家协会广西分会会员。他历任广西政协一、二、三届委员。

几年后，他从大苗山获得的创作素材已感到不够用了，正准备二进大苗山，再访大瑶山，搜集新素材。遗憾的是，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不幸的遭遇接踵而来。

1966年到1977年，父亲被关、被斗，下放到干校劳动，受到了残酷的迫害，连写作的权利也被剥夺了。劳动过累，身心受到了极大的摧残，可他不但坚强地活下去，还偷偷地进行写作、换名投稿。十年的动乱，他创作的热心都没有半点冷却。

粉碎了“四人帮”，形势大好。父亲又获得写作和发表作品的权利。他激动得赋诗于创作室墙壁上：“桑榆晚景好珍惜，白发更应争朝夕，老骥长嘶迎彩虹，敢将七五变五

七。”此时，他已75岁高龄，仍夜以继日地伏案疾书，发表了散文力作《橘子洲头》、《火红的彩霞》。1979年，他光荣出席了全国第四次文代会。

1980年，他出版了有较大影响的《台湾民间传说》、童话《草鞋妈妈》，不久，此书被评为湖北省1980年儿童文学优秀作品。1981年春，他到湖北出版社去领奖，数日之后，刮去胡子，系上鲜艳的红领巾，满面春风带着党和人民给予的荣誉归来了。父亲显得年轻多了。

1981年，是父亲以极大的热情走完了他漫长的创作道路、度过他创作生涯的最后一年。这一年，他身体虚弱多了，可他仍以极大的毅力写出并出版了电影剧本《灯花》、《龙牙星》，（已拍摄）出版了民间故事集《孔雀的翅膀》（四川出版社）和十本连环图（合作），发表了台湾小说《山魈》。

日本妇女北岛岁枝读了《灯花》受到教育而放弃了轻生念头。她非常感激作者。1981年远渡重洋，千里迢迢来到柳州看望父亲。一篇《灯花》居然救了日本母子三人，父亲怎能不激动呢！他抱病陪日本友人漫游柳州、桂林的山水风光。刚送走日本《灯花》访华团，正要提笔撰写“论民间故事的功能”一文时，癌症的病魔就把他拖入了医院。

父亲明知得了不治之症，可他不悲观，他躺在病床上一面向癌症抗争，一面讲述他的散文、故事，叫我好好记录整理。

1982年元月31日，病魔终于夺去了父亲的生命。我从数十封唁电中记下了其中大苗山一位苗族老人的挽联：

音容永留苗寨，

“灯花”长照人间。

父亲去逝了，他以实际行动去实现了他的誓言：“七十年文学迷，一生心血化为书”。

父亲谢康的治学与著作

谢庆云

卅年久别一相聚，限期离台促归程。

但愿和风吹湛露，春风珍重护航行。

这首诗，是今年我与妹桂云赴台探亲返航时，父亲赠给我们的。回想在台北与父亲相处的日子里，能观其言行，亲聆教诲，使我们得到许多立身处世的宝贵经验。父亲已是九旬老人了，仍精神矍铄，每日坚持读书、著书立说，刻苦治学精神不逊于年青时期。尽管患病初愈，身体虚弱，仍是思维敏捷，做事讲求效率。他极珍惜时间，把能挤出的每一分钟都用在读书写作上。视写作为第二生命。他对我们说：“时间不多了，要赶快做才行”。他的著作甚多，已出版的书40种共1000万言，（内有法文两种，翻译的3种），可谓著作等身。从份量言，在广西学人中，可入先进行列。在他的著作中，以社会学及文学两类为多。

父亲对我们娓娓讲述了他人生历程中的种种轶事、求学经历和教学生涯。他的一生，是勤奋治学、刻苦笔耕、致力于教育、力求服务于大多数人的一生。这里着重简述他的治学和写作生涯。

父亲谢康，别号永年，广西柳城人。1899年农历10月25日生。先辈多科第中人，先祖谢三聘，号莘农，同治甲子年中举，终生从事教育，历任岑溪县学训导，柳城凤山、龙城

书院、柳江书院山长。祖父谢滋谷，清秀才，廪生，两任柳城劝学所总董，任1910年印行的《柳城县志》总编纂，是一位清正严谨的学者。父亲对我们说：“我小时能饱读旧书，多是祖父的遗泽和父亲的影响”。

父亲一生治学严谨，从小勤读好学，追求上进。他是柳州高中最早时期学生。几年的中学生活是在柳侯公园旁度过的。他说：“那里有罗池遗庙，荔子残碑、亭台楼阁。课余流连，每景仰先贤，曾立志为古文家。”中学时代，父亲最喜欢的功课是国文、历史两科，那时普遍古文笔调的散文，甚至短篇的骈文诗词，已能挥写成篇。

父亲中学肄业后，被聘任柳城县立模范高等小学校教员，后任该校校长。3年后，辞去校长职务，于民国9年初春，到上海大同大学预科就读。从乡下到上海，大开了眼界，接触了现代文明和新思想，发觉“世界之大，进步之快，决非我们乡下人的头脑所能想像”。仅半年时间，就结识了不少当时学术界的名人，其中有广西老乡钟震吾、马志超先生和中华职业教育社黄炎培先生。父亲在回忆中说：“他们待人接物，恳切周到，彬彬有礼，使我这个南方‘蛮子’自愧弗如”。这时期，正值杜威博士来华任教，父亲听了杜威夫妇的演讲，受到许多启示。当时正是“五四”新潮澎湃之际，受了新思想的影响，父亲的思想观念有了较大的转变，从租界的繁华与上海县城的落后、贫穷相比之中，发觉了东方文明的停滞落后，痛感到“非急起直追不可”。后来因在上海读书花费甚巨，于是南下广州，考入广东高师文史部。高师当时是华南国立最高学府，所收多为清寒子弟、勤奋好学的学生。该校环境优雅，极利于读书学习，学校馆藏图书

甚丰，有黄仲樵、杨果庵等一批名教授执教。父亲如鱼得水。他说，在学校住满4年，还觉得时间太短。

在上海与广州两地求学，是父亲青年时期思想转变的重要关键，高师4年，奠定了他往后几十年立身处世的师范生型和笔耕生涯的基础。在学问上，有八个方面的进展：（一）提高了对文字学和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的兴趣。（二）除学中文外，还精通一、二门外国文。（三）注意中国文学史上的研究，先后发表了《离骚楚国方言考》、《九百年前的地质学家——沈括》、《唐诗的音乐价值》、《柳宗元评传》等20多篇专著，这是他最早的一批专著，可惜在迁徙中散失了。（四）对研究地质学和世界地理发生了兴趣，（五）1924年，亲聆孙中山先生在高师礼堂演讲三民主义，受益非浅。（六）对出版刊物有了兴趣，这时他主编的刊物颇多，单是知用学社就有三种。有广西留穗学会编的《群言杂志》、广高桂同乡会编的《西江湖》等。（七）对团体服务产生热忱，他当时参加的服务工作，有知用学社、广西留穗学会、广东高师学生贸易部、广州广西会馆董事会等。（八）版吴稚晖先生学注音字母，并商谈留法勤工俭学，引起留法动机。

高师毕业后，曾任省立玉林九中教员和柳州省立四中校长。1927年1月，向广西省政府及教育厅呈请辞去四中校长职务。1928年，以广西省政府《新广西旬报》社特派员身份，经香港赴法国留学。由香港到马赛港，通过南中国海、印度洋、红海、地中海。他留心考察，把途中见闻写成的《赴欧纪程》，在《广西旬报》上发表。

在法留学12年，是父亲人生中又一个重要的转折，初到

了巴黎，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个陌生而新奇的西方文明世界，巴黎圣母院的壮观，凯旋门的雄伟，都使他流连忘返。在某教主的介绍下，迁入皇后镇天主教学生宿舍寄宿，历时4年。他参加了多次宗教仪式，对天主教逐渐有所同情和崇敬。通过自己的见闻，加深了对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了解。他多次参观巴黎的国际殖民展览会和反殖民博览会后，写成《白种人的殖民世界》一书，约八万言。产生了对殖民地的研究兴趣。此时，他的爱国观念和民族意识得到增强，创作的内容更加丰富。“九·一八”事变发生，在巴黎的侨胞和留学生十分震惊和悲愤，纷纷组织抗日队伍，父亲当选为抗日会委员，并奉派伦敦，与留英华侨抗日会联络。

这期可，他参加了国联工作，六次到了日内瓦，与国际友人以及外交界人士往来，他负责驻欧国际宣传委员会工作，组织罗马及柏林观光团进行国民外交，主持巴黎书报社，参加国际反侵略大会、世界青年大会等国际性活动，进一步注意国际时事问题。他认为，我国对国联外交，应该加强；对驻欧各国使馆，应予以改善，要作调整及增加经费。对这些问题，父亲曾发表过几篇文章。后来他奉派负责驻帝文领馆的工作，敢于从事，劳怨不辞。

留法期间，法国人的批评精神、怀疑精神给了父亲很大的影响，尤其是文学批评和历史方法。他在1931年2月号的《小说月报》发表《法国文坛对美国的批判》一文，就是这种精神的表现。这期间，他对社会学、民族学和文化人类学方面产生了兴趣，并到巴黎的民族学博物馆实习了一个时期。1931年，东方杂志发表了他的《五十年来法国社会学鸟瞰》，中央日报发表了他的《欧洲文明与美国文化》，1938

年他编译的《东方各国禁贩妇女问题》，由国联出版。在进行学术研究过程中，他对法国文学产生了嗜好，用力较多的是法国文学，曾用法文发表一部有关母性与妇女文艺的著作，得到教授们的好评，还翻译了法国3部名家作品，也曾将一些中文书籍译成法文。

留欧期间，父亲曾入巴黎大学及法兰西学院深造，毕业于巴黎人类学院。1937年春考取巴黎大学文科博士。

父亲从1928至1933年在法留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由海路自法国经越南转回广西。在归程中，为所见全民团结抗战情景感动，创作长诗《我重新发现祖国》。留欧12载，是他求学经历中最辉煌的一个时期。这时期，无论是思想的发展，还是学术上的研究成果，其领域之宽，内涵之丰富，远非高师时代所能比拟。

父亲的著作，较有代表性的有：

文学方面

- (一) 中国妇女文艺的母爱（法文本、巴黎版）。
- (二) 文艺论集（香港版）
- (三) 文史论丛（香港版）
- (四) 散文小品（香港版）
- (五) 诗联清话（台北版上、下二册）

社会方面

- (一) 中西文明及文化论丛（台北版）
- (二) 社会学及社会问题（香港版）
- (三) 社会学研究（台北版）
- (四) 社会问题论丛（台北版）
- (五) 卖淫制度与台湾娼妓问题（台北版）

(六) 中国社会制度研究(台北版)

(七) 中外社会思想之比较研究(台北版)

(八) 中国社会思想简史(台北版)

(九) 孙中山思想研究(台北版)

其 他

教育学要义(香港版)

1982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台湾怀乡 思亲 诗词选》载有父亲七律绝句一首:

《立春后五日偶成》

兵戈扰攘走仓惶,卅载流人几断肠。

柳水鹅山无恙否,逢迎却忆故家乡。

壮族诗人黄勇刹

庞绍元

黄勇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壮族诗人。他多才多艺，既是热情奔放的壮族歌手、诗人，又是卓有成就的民族民间文学艺术专家，文艺理论家，也创作不少小说和散文作品，他把毕生精力无私地奉献给灿烂的壮族民族文化事业。

黄勇刹于1929年12月26日出生在广西田阳县那扩村的一个壮族贫农家庭。父亲于1929年参加过韦拔群领导的农民赤卫队，母亲黄妹亭是个当地有名的民歌手。那扩村素有歌圩习俗，兴唱壮语民歌。他自幼随母年年参加歌圩，从民歌手的抄本和口唱中学到很多好歌，从学歌、唱歌到编歌。年岁还不小，就成为村里年轻唱歌人中的佼佼者。

黄勇刹原名黄玉琛，少年时代在家放牛，常在隆冬季节随家人到深山野岭去烧木炭。稍长后就读于田州镇小学，抗战后期，他考取了在今田林县的田西师范简师班，后又考入南武师范。按当时的规定，简师班毕业学生要升学，必须有3年的教龄才准予录取。由于他家境清贫，没有人事关系，所以小学老师当不成，当然也就不能录取了。后又想投考百色高中，但因没有中学毕业证书无法报考。这时恰逢一族人叫黄勇刹的刚从中学毕业，黄勇刹便向他借了中学毕业证书，在“刹”上加上一“丿”，便成了“刹”字，于是便得现名。

中学时代的黄勇刹，酷爱文艺书籍，特别对诗歌，更是

手不择卷。他在高中阶段就开始文艺创作，向报社投稿。其中包括小说、散文、诗歌，笔名曾用“泪眼”、“南风”、“新浪”、“观海”等。这些作品思想的倾向进步，为反动政府所注意，于是迫使他极力寻找革命出路。

1949年12月黄勇刹参加了革命工作，1954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曾做过民运队员、小学教师，后考入广西壮族自治区司法训练班，结业后分配到广西高级法院、柳州市检察院、柳州铁路检察院工作。

1958年他调到柳州市文联工作，任秘书长职务，从此走上文艺专业的道路。1959年3月市文化馆曾昭文创作的彩调剧《刘三姐》，由柳州市彩调团排演，参加柳州地市联合举办的柳州专区专业文艺会演，引起了文艺界人士的关注。4月，该团又以《刘三姐》参加广西文化局举办的“庆祝国庆十周年献礼演出”活动，受到中央文化艺术部门的贺敬之、张庚等专家的赞赏。为了提高《刘三姐》的创作演出水平，黄勇刹以熟悉壮欢（壮山歌）的特长，参加了《刘三姐》第二方案的提纲研究，后又参加了由柳州市委组织的有邓凡平、牛秀、曾昭文、龚邦榕等参加的《刘三姐》创作小组，先后深入宜山、罗城等地去采风，收集山歌，向各地民歌手请教，从而使他对丰富多彩的各族民歌有了新的了解和认识。1959年7月，《刘三姐》（第三方案）写成，一方面交由剧团排练，一方面由牛秀、黄勇刹、吴超凡携带剧本赴北京征求专家意见。7月22日，《剧本》月刊在中国文联召开《刘三姐》（第三方案）剧本座谈会，参加座谈的有贺敬之（会议主持人）、孙福田（中国剧协副秘书长）、严青《剧本》编辑部主任）及风子、范溶、乔羽、田川、任萍等11人。通过这些创

作和学习，黄勇刹获得更大的教益。

1962年初，黄勇刹从市桂剧团调到市彩调团任副团长，主管剧团业务工作。这时期剧团很困难，他积极送戏下乡，带队到武宣、石龙等地演出。在工作中和大家一块干，和演员们一块滚地铺，把剧团带得生气勃勃。在百忙中还积极组织 and 参加文艺创作，与邓凡平、曾昭文创作了以民间谚语为基础的彩调剧《指天椒》。市彩调团演出后，剧本在《柳州日报》刊载，受到好评。

1962年下半年，黄勇刹调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任理论研究会组长，1979年任秘书长，此间从事民间叙事长诗《嘹歌》的搜集、翻译整理和民歌理论研究工作，并进行诗歌、民歌、歌剧、戏曲创作。1980年被选为广西作家协会第二届常务理事，同年8月27日广西民族文学工作委员会成立，黄勇刹被选为副主席。他曾出席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先后被选为全国文联委员，中国民间文学研究会第三、第四届理事，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学会理事长，中国歌谣学会副会长。

黄勇刹是一位诗歌民歌兼长的诗人，他常即兴放声歌唱，1979年，在全国少数民族民间歌手、民间诗人座谈会上，即兴创作并吟唱了一首民歌，赢得与会者赞叹和热烈的掌声。他唱到：

什么比茶香透瓶？

谁人集会香山会？

好花比茶香透瓶，

各族歌手香山会，

不同语言同心声，

唱党唱民唱四化，

什么比花香透心？

什么比酒还醉人？

好酒比花香透心，

好歌比酒还醉人。

不同年龄同豪情，

团结歌声漫北京。

不同琴弦同心弦，
高唱民族大团结，
各族歌手会香山，
弹到“四害”害人惨，
几多乐器被砸碎，
几多歌手被迫害，
平反冤案是党恩，
哪个听了心不碎，
各族歌手聚一堂，
今日歌手香山会，
海宽装得千江水，
党恩比海比地大，
歌台搭在香山上，
唱罢歌颂和暴露，
天上断云海断沙，
不信就请问自己，
爱的多来恨的多，
若问歌手为何唱，
北京香山摆歌台，
我象蜜蜂穿云雾，
南宁来到北京城，
人民万岁歌万岁，
天旱不断红河水，
生活万岁歌万岁，

不同风格同调门，
越弹琴弦越知音，
知音琴弦日夜弹，
牙齿咬断铁栏杆，
几多歌本变火灰，
惨死不见白骨回，
歌手放声招迷魂，
十根肝肠断九根，
开口就唱党恩长，
全靠英明党中央，
地大装得万重山，
歌手不唱心不安，
题材多样不寻常，
还唱情妹和情郎，
人间不断爱情花，
何曾到老不成家，
心中的歌千万箩，
因为生活不断歌，
歌声唱得心花开，
一路唱歌一路来！
各路歌手唱不停，
谁想禁歌万不能，
雨打不烂石山坡，
人民代代不断歌。

他的即兴创作和歌唱，唱出了人民对“四害”的愤恨，
唱出了党的伟大，唱出了人民的心声，唱出了歌手为党为

“四化”而纵情歌唱的豪情。

黄勇刹的文学活动非常广泛，除搜集、翻译整理大量民间文学外，他还创作小说、散文、诗歌，撰写理论文章，共约300万字之多，其中200万字是粉碎“四人帮”以后才问世的。1963年他与黄耀光合作整理发表了民间故事长诗《唱离乱》；1980年他创作的诗歌《因为歌》，获广西壮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国作家协会广西分会1981年举办广西少数民族文学创作奖。1981年，广西人民出版社发表他的文艺理论《歌海漫记》；1983年他的理论专著《壮族歌谣概论》由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在1985年获中国作协广西分会、广西民间文学研究会联合举办的广西第二届少数民族文学（1981—1984）作品奖。另外，他的代表作品还有叙事民歌《马骨胡之歌》（合作）、《歌王传》（合作）、《莫一大王》（合作）、电影大型记录片《壮乡处处是春天》（合作）、论文《采风的脚印》、诗歌《中国有个太阳城》等。

黄勇刹在小说、散文、诗歌、文艺理论、戏剧创作方面的成就，是与他数十年来的勤奋耕耘分不开的，刻苦是他自幼即形成的进取精神。早在中学时代，他对古文、世界著名作品，特别是诗歌，能一大段一大段背诵下来，在《刘三姐》的创作中，他收集到的民歌，也废寝忘食地一首一首死记硬背出来。在他从事专业创作的20多年中，长期坚持爬山涉水，穿区过县去采风，他的足迹踏遍了广西少数民族乡乡寨寨，他每走一段路程，就有一串民歌的收获；每有一串民歌的收获，就有一群歌手的结识，不断深入生活，向生活学习，做人民群众的学生，这是他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1984年12月27日，黄勇刹在参加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代表大会期间，不幸逝世于北京。他给后人留下了丰富的遗产，人们永远怀念他。

壮族剧作家韦壮凡和他的戏剧创作

庞绍元

韦壮凡是位区内外颇负盛誉的壮族剧作家。他是广西鹿寨县人，生于1939年12月。中国共产党党员。1982年担任柳州市文化局副局长，1986年任局长；1984年加入中国剧协家协会；1986年加入中国少数民族戏剧学会；同年，任柳州市戏剧、曲艺协会主席、广西壮族自治区文联委员、中国戏剧家协会广西分会副主席；1987年任柳州市文联主席；1989年调广西艺术学院任副院长。

韦壮凡于1958年秋从柳州二中高中毕业后，进柳州机电厂当工人。工作之余，积极参与业余文化艺术活动，编剧本、演彩调，是个活跃的业余文艺骨干。1962年2月，到自治区工人文艺训练班学习。同年，参与广西职工业余文艺代表团赴北京参加全国职工业余文艺会演。7月，任柳州市艺术训练班业务教员。8月，调市文化馆任文艺组长兼《文艺演唱》编辑。从此，跨入文化艺术专业之门。1963年，《文艺演唱》发表了他的处女作《将军与农民》，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后又改为文场《选郎君》，演出后获演唱作品二等奖，随即在市外刊物转载，电台也录音转播。1963年，他到区文艺干校戏剧编导训练班学习，主修戏曲编导理论。这期间，他创作了彩调现代小喜剧《田老满卖瓜》，参加训练班结业汇报演出，1964年该剧由柳州市彩调剧团排练，参加广

同年5月举行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演出,受到好评。剧本发表在《广西文艺》1963年12月号。1964年8月,韦壮凡调柳州市文化局创编室任编剧。同年,他创编的桂剧现代小喜剧《夫妻行》,由柳州市桂剧团演出,并参加全区现代戏文艺会演。广西人民出版社辑入《革命现代戏丛书》出版。1965年12月,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单行本。1972年他创编的彩调剧《长樱在手》,由柳州市文艺工作团一队(戏剧队)演出。1975年创作《钟声阵阵》,由市桂剧西演出,参加同年12月举行的全区现代戏调演。1976年,柳州市代表队排演了他创作的现代桂剧《风云岭》,参加全区调演。1977年他创作现代桂剧小戏《百年大计》,由柳州市文艺代表团演出,参加全区现代戏会演。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韦壮凡创作热情越发高涨。1978年,他创编《未有结束的审判》(文场话剧),得到文艺界的肯定,后来桂林、新疆等外地剧团相继上演,受到欢迎。1979年,广西农村一些地方开始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当时社会上产生了不同的反应,褒贬不一,他深入农村去体验生活,在象州中平、大乐及金秀瑶寨一些实行承包责任制的地方,看到了瑶族人民从“割资本主义尾巴”的大刀下解脱出来后,凭借山区优势,种植香草、香菇、八角等作物,发展多种经营,向致富的道路迈开了第一步。农民新激发出来的热情和干劲,触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于是写出了表达农民心声、讴歌承包责任制这一新生事物的八场彩剧调《喜事》,由柳州市彩调剧团排演,几经修改,1981年10月参加柳州市专业文艺调演。同年11月,赴南宁参加全区现代戏观摩演出,获演出二等奖、剧本创作二等奖。1982年4月广西人民广

播电台录音播放。6月，全国举办（1980—1981年）首届剧本评奖，荣获文化部授予优秀剧本奖。剧本先后在1982年广西《剧目与评论》（第一期）、《广西1981年全区现代戏观摩演出剧目选编》、《柳州文艺》发表。1984年获全国少数民族题材戏剧荣誉奖，1989年12月获广西区政府首届“振兴广西文艺创作”荣誉奖。

韦壮凡同志从1982年就任柳州市文化局副局长、局长以来，为提高柳州市创作演出队伍的水平，作了大量的工作，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他在繁忙的行政事务中，还挤出时间创作。1984年，他看了历史传说故事“泥马渡康王”有新的启发，组织了《泥马泪》剧本创作。他团结剧组人员，发挥集体智慧，使剧本的主题从骂皇帝的残酷，提升到鞭挞毒害了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造神意识的高度。在思想和艺术上有新的突破，夺得1986年“广西第二届剧展”桂冠。1987年4月，桂剧《泥马泪》受中国艺术研究院的邀请，赴北京为“国际戏曲学术讨论会”演出。引起首都文艺界和国内外专家的关注。著名戏剧家曹禺为《泥马泪》的演出题词：“戏剧在不断探索中前进”。热烈祝贺演出成功。著名戏剧家曲六乙称誉该剧是桂剧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1988年获自治区人民政府首届“振兴广西文艺创作铜鼓奖”。韦壮凡作为《泥马泪》剧组的组织者和作者之一，也付出了艰辛的劳动。

韦壮凡在任领导职务期间，除了亲自动笔创作外，还热情地帮助辅导作者提高创作水平。如在1987年的柳州市首届戏剧小品电视大奖赛中，柳江县壮族作者陆焕高创作的参赛小品《上上下下》，开始演出效果甚差，在初赛中被淘汰了。韦壮凡觉得，这个本子有一个好的点子，就是剧中那个

农民，在3个干部的办公室前转来转去，但由于3个干部的推诿扯皮，结果什么事也办不成，从中可以透视到目前一些机关存在的机构重叠、不干实事的弊病。他找作者谈想法、出点子，鼓励作者改成话剧小品。作者在他的鼓励支持下，经过二次修改，终于写成话剧小品《肿瘤》。之后，韦壮凡又请来导演和其它剧作者再次为这一小品讨论修改。又通过排练提高，结果效果很好，最后获选参加1987年全区首届戏剧小品电视大奖赛，夺得了业余组第一名。还有小品《莫明》、《高女人和矮男人》也获得了大奖赛二、三等创作奖（业余组），《农伯与女郎》获得了专业组一等奖。这些成果的取得，无不渗透了韦壮凡的心血和汗水。

韦壮凡为了在柳州组织一支高水平的创作队伍，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他团结老一辈剧作家，如曾昭文、龚邦榕、郭玉景等，尊重他们，调动和激发他们的创作热情。对中、青年作者，他积极鼓励、帮助和培养，使他们在艺术实践中不断趋于成熟，如王超常、符震海、吴源信、李维邦等。在市委、市政府的关怀、支持下，这批文艺创作的中坚与广大文艺工作者共同努力，开创了柳州市戏剧工作的新局面，在广西第一届、第二届剧展和广西首届戏剧小品电视大奖赛中，连中三元，《玉蜻蜓》、《泥马泪》相继进京演出，引起文艺界的瞩目。

剧作家韦壮凡多才多艺，多年来，不仅创作了一批有影响的剧目，还创作了一批曲艺、小说、诗歌等文艺作品。其中《友谊诗抄》、《帽子》、《姑娘的心愿》、《晨光新曲》、《你、我、他》等，分别由中国作家出版社和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和在文艺会演中获奖。

韦壮凡的作品贴近时代，反映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沸腾生活，反映时代精神，他以敏锐的洞察力去观察生活、熟悉生活，从生活中发现人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闪光的思想和行为，从而提炼升华主题。这是他在创作上取得成功的重要方面。从《将军与农民》到《田老满卖瓜》、《夫妻行》、《百年大计》、《未有结束的审判》、《喜事》，逐步形成了他的独特的艺术风格。他的作品以喜剧见长，笔调辛辣、语言风趣、有浓厚的生活气息。这些作品具有鼓舞人民奋发向上和积极进取的作用，突出了时代的主旋律。勤奋刻苦，是韦壮凡成功的重要基础。“勤学方知不足，知不足而刻苦”是他一生奋斗的座右铭。他在担任市文化局长之后，仍参加吉林大学中文系理论专修班学习，经考核合格，取得结业证书。为了提高创作的艺术技巧，他不仅努力学习文化和文艺理论知识，而且还虚心学习各个剧种的表演艺术，为他的创作增强了艺术感染力，极大地发挥寓教于乐的作用。

琐忆地方书画家李漫涛

朱 光 华

地方书画家李漫涛，年过古稀后，作古10年了。李老世居柳州，解放前家居七家村，后改文武街。他和已作古的书画家陶尊五、邓俊群、敖起絮、曹墨倡、陈汉宸、韦炳勋及今年逾古稀尚健在书画师罗沛林、黄河剑、何如坚、陈墨交往深厚，经常相聚互访观摩品评，切磋画艺书论。现年当半百的书画后辈陈惠琪、汤漾、吴健邦、朱光华、叶现望、阳永枯……在书画技艺方面都曾受过漫涛师的精心指导，深得教益。李老平易近人，性格开朗，布中山装，穿着简朴。他和同辈道友或青年后辈都谈得来，出语幽默，谈笑风生，十分融洽。他对前人书画的真赝鉴别也颇具眼力。市博物馆成立后收购古书画，也常邀李老去过目，可知他过去浏览甚广，在这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知识。

李老书画兼优，隶书行楷，山水花鸟都有所长。特别爱画荷花。笔者曾问过他，为何甚喜画荷？他说：“宋人周敦颐对荷有文字赞美，我也有丹青之好，皆因此花出污泥而不染，品行清雅，仪态高洁。”他还善画山水，取承古人传统笔墨外，更注重汲取近代泼墨浑洒的新意，所作古水融汇古今之法，功力见深，别具一格。他的书法师“二王”十七帖，行书古朴，隶书稳健。1963年柳侯祠重修后，祠内屏风

简介，即请李老捉笔，所书隶体，端庄隽永，字形多变，为参观者啧啧称赞。

李老双耳失听，其不少书画作品，不具实名，常落“聋叟”二字。作画写书，态度十分严谨，凡自己不能过目之作，决不轻易送人。一次，他应来者画松鹰，画了三张，都不满意，观者拿了其中一张说：“这幅还可以”请李老赠送，李老说：“败笔不少，鹰眼欠威，墨韵不足”说罢将画揉碎，投入纸篓，并说“我宁愿欠画债后还”。他常说：“书画此道，即使名家高手，亦常出笔即废，以废品应酬，有欠尊重。”他对同道和爱好者求画，往往有求必应，不加拒绝。60年代初，我在李老家闲聊，有两位与李老素不相识的青年慕名造访，还带来10多张国画作品请求指导。李老欣然相待，还泡上热茶，然后他将每幅作品仔细过目后，先竖起拇指，称赞画面好的细部。再十分谦和的指出笔墨、章法、设色欠妥的地方。并提出修改意见及鼓励之词，谆谆善导之情，使两青年高兴而归。平日也常有求画者至，李老兴致来时，往往立即摆开文房四宝，当场挥毫。此时亦偶得高妙之幅，他从不自留，都割爱相赠，因此他逝世后，自作书画留藏甚少。

五十年代及六十年代初，漫涛师在印刷厂从事美术设计，多次参加区市书画展览及在报刊发表作品。记得1963年在柳侯祠举办画展。最近作古的画家邓俊群，毕生喜画梅、兰、竹，展出多幅作品，李老参展山水墨荷外，特意画了一幅“棉花图”，并题诗云：“人画我也画，人笑我不怕，不画梅兰竹，只爱画棉花。”此幅刚好与邓老梅竹相邻，有意和邓老开了一个风趣玩笑，引得在场诸君开怀大笑。

李老书画的深厚功夫，全在自然造化及写实钻研。抗日

战争时期，全国知名文化人士荟集桂林，李老亦参加对敌美术宣传工作。与徐悲鸿、阳太阳、马万里、张家瑶、龙廷霖……都交往甚切。文革十年，花鸟山水画一时销声匿迹，李老也沉默挂笔，常与几位书画知友品茗闲话。正值1977年书画再度解冻不久，他却与世长辞，今地方书画同道十分惋惜，感念不已。

艰苦创业 执着追求

记制药业老行尊黄斗才先生

刘郁卿

黄斗才（1914—1952）原籍广东顺德县马齐乡，出生于柳州市。其父当时是柳州大同春药房司理。他六岁破蒙，12岁就读于关铁算开设的国粹私塾（地址在今龙城路二巷）。就读者大部份是市内工商界子弟。其后关铁算应聘在柳州总商会内设馆，仍从其事业，直到1933年才到大同春药房工作。

黄斗才天资聪颖好学，在国粹私塾的诸多就读者中，他是其中的佼佼者。

大同春是当时柳州市唯一经营中西成药的药房。随着父亲的经营浸润，又由于广州市大同春药房与柳州大同春有联系，有些成药在柳州分装，引起黄斗才从小就对药品的研制、加工、生产、经营发生了浓厚的兴趣。

1932年后，广西政局比较稳定，市场渐趋繁荣。群众感到中西成药效应快，乐意采用。1934年黄斗才接任大同春药房经理。他锐意经营，积极推销，业务逐渐发展，到1935—1936年间，他在粤籍工商界中，已崭露头角，赢得了声誉。遂想自己生产成药，向制药业方向发展。

只读了十一二年私塾的黄斗才，深感自己药学知识的不足，因此，1933—1934年间，他又读了一年多卫生专业夜

校，钻研中西药的药性药理，配方加工等专业知识，虚心向行家医生等专业人士请教，逐渐充实自己。

1936年他开始用进口的西药原料，以黄家和名义试制治疗常见疾病的胃金丹、气痛散、止咳散、红膏药等药物。为了打开销路，曾斥资大造广告，並烧制一批广告茶具，馈赠客户。1937年夏，他被选为柳江县（现 柳州市）商会理事长，是柳江县商会改制后的第一任。3个月后，抗日战争爆发，商会事务增多，既要料理店务，又要处理会务，已无暇顾及药品生产（旧商会理事长、常务均义务职、不脱产）。

1942年黄斗才以黄宝善制药厂名义，出产退热散、止痛散、止咳散、消积散四种成药。用“黄宝善”和他自己肖像作注册商标，包装改用凹凸版字在广州彩印，装璜美观。为扩大市场，由大同春药房总经销，还独资在广州市18甫北路开了间宝华药房经销。

斗才推销商品，很有办法，他派出专人，深入柳州专区各县镇和贵州云南等地，张贴广告，宣传药品的用途功效，取得相当效果，业务蒸蒸日上。正当业务发展之际，日寇南侵，柳州沦陷，业务又告停止。

1945年柳州光复，黄斗才重振旗鼓，迅速恢复大同春药房，交其堂弟经理，自己则着手把黄宝善药厂迁到广州市怀远驿，继续生产，以图发展。从此，他专心致志，精细筹划，潜心经营管理，几年间，黄宝善药厂，在广州市制药行家如林中，也站稳了脚跟。特别是广州市解放后两年间，在党的“发展生产，繁荣经济”的政策鼓舞下，他打破顾虑，积极经营，由初到广州时只有20多人生产的小厂，发展到1952年有八十多人的中型厂。他眼光长远，考虑到成药日后

的剂型改革，生产要发展，原有厂房不敷应用，遂进口了制药机械设备，由手工操作，过渡到机器生产。黄宝善的产品也行销到全国各省市。1952年黄宝善药厂的销售额，在广州市制药业中，跻身前列，声誉雀起，他也在这一年中，不幸逝世。

黄斗才在柳州生活、求学、经商创业，近32年，最后成为制药业行家，总结他的成功经验，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一、薄利多销。他在经营管理方面，精打细算，杜绝浪费，以减少成本，把产品的毛利率，尽量降低，以争取顾客。

二、重视广告宣传，在柳州和初到广州的几年，为了开拓市场，每年产品的利润，除用于扩大生产外，其余大部份投入广告费。在全国大多省、市、县和部分乡村，都张贴或涂写有黄宝善药厂出品的退热散、气痛散广告。

三、派出推销员组成小分队，随带产品，深入云南、贵州、四川、湖南、广西等地城乡，联系客户，了解市场，宣传推销产品。

四、面向广大农村，用邮局代收货款的办法，打开销路。旧社会偏远山区，缺医少药，而当地小药房，人力少、资金少、周转困难。邮局代收货款的办法，解决小药房困难，使其成为黄宝善四种成药的代销店，产品销量大增。

五、讲究质量、讲究信用。宁愿药厂经济受损，也要维护药厂的信誉。例如：在客户来信述及寄去的药品收不到，或收到的药片有受潮或损耗等情况时，不论损失原因属谁，都立即如数补偿给客户。

黄斗才精明干练，经营专一，认定一个目标，必全力以赴，务期成功，他对人诚恳，热情大方，热心公益，因此，也获得各方人士的赞赏，这可能也是他成功之道吧！

刘古香革命事略

市政协文史委 市地方志办

刘古香（1869～1913）以字行，名起今。柳州人，家住小南门码头长寿路口。1900、1901年（庚子、辛丑）并科举人。1904年刘古香就读广州广雅书院。顾清廷腐朽，丧权辱国，1906年入广东陆军将弁学堂。刘古香矢志革命，驱除鞑虏，建立民国。

1907年春，刘古香在香港与钱权（柳城人，字秀斋）由姚雨平（民国建元粤军北伐总司令）介绍入同盟会。深受孙中山、黄兴信任，即奉派回广州于人塘街廖氏书屋暗设会党机关，吸收同志。旋又奉派入广西，运动梧州、浔州、柳州的消防军及联络各地革命会党。刘古香在柳州以办学掩护革命活动。

柳州学堂未成立之前，他协助邓成绪（字子恢，柳州人）创设“龙城求是学会”，并担任体操课。1906、1907年假期回柳，协助创办柳郡中学堂（柳州府官立中学堂）、马邑（马平县）两等小学堂。历任劝学所总董兼学堂经学、国文、体操等课教员。致力于国民革命宣传、组织工作，王植槐（字冠三）、刘震寰（字显丞）以及李德山、柯汉贤（字奎城）、梁润生、郭干臣、李子廷、杨秀芝、王干廷、杨瑞池、莫显丞、熊少丞等皆相继由刘古香与邓宝书介绍加入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后来他们均成为柳州独立骨干。

1908年5月，刘古香受命从广州回广西，与刘崛、黄日初、甘乃纲、陈勉生、苏无涯等同盟会员即在梧州三角咀西医院秘密会议，决定先从梧州举事，浔州、柳州、桂林随起响应。会后，他即回柳进行，邀许子林、董豁然、刘福卿、刘静三、刘瑞麟（字山谷）等在拉堡葛婆庙开秘密会议，被警察局长张玉麟侦悉，报请知府杨道霖下令缉捕，此时三角咀会议事亦被查觉。梧州知府李开先正在大肆搜捕党人，局势逆转。刘古香与李德山、李子廷等下广州出港。

1909年，香港成立同盟会南方支部，为指挥南方革命总机关，广西党人行动更为周密。六月，刘古香由香港与甘乃纲等回柳州联络防军长官陈晓峰、张铁成、卢笙白、黄岱等，拟先取柳州，继攻桂林，并已取得担任桂林新军的冷御秋等同意。乃集结民军千余人于柳城太平圩和四十八弄一带，候机暴发，詎被右江镇总兵李国治发觉，即率大队围攻，激战四昼夜，撤退苗山。陈晓峰愤而自杀，刘古香与部分同志星夜步行至石龙搭轮船走广东，刘古香离柳时，将工作交王植槐主持，特别以刘震寰负责组织民军、震寰以其家财作经费用，向来宾、迁江、忻城、雒容、象县各地绿林运动，积蓄革命力量。同时开展对清军各级军官的策反工作。刘古香夫人马电，勇敢有谋，负责筹集军需，并能联络四方会党，运动绿林，又从清军官家属运动他们反正。

1911年初，香港成立革命统筹部，联络云南各省，指示各地同盟会负责人积极准备策应广州起义，黄兴派刘古香负责选拔广西志士20人为先锋，准备攻广州督府。刘古备即与柯汉资、钱权在广州旧仓巷芙蓉里四号，暗设联络机关，开展活动。指派李德山回广西邀来韦统铃等二十余人，4月19日

(农历三月二十九)广州起义,刘古香率领李德山、钱权、王植槐、郭干臣、韦统铃等广西同志共约30人,随黄兴从小东营进攻总督府(衙门),尽歼其门卫。清援兵大至,起义军弹尽无援,李德山等广西志士七人壮烈牺牲。刘古香和部分同志分向大南门、大东门冲出,乘小艇过河南,次早乘轮出港。

刘古香到港,在同盟会南方支部参加筹款和购买武器工作,他介绍从南洋回国的华侨殷商捐助一万多元。

武昌起义后,刘古香和姚雨平奉命先入广州布置新军反正。11月9日与胡汉民、姚雨平指挥新军光复广东,胡汉民任广东都督。刘古香任都督府秘书长。

1911年11月9日(农历九月十九日),柳州宣布独立。之前,同盟会员钱权、王冠三、宋洪(字新洲)、柯汉资、郭干臣、王干廷等数十人集议决定:一面指挥民军集结压境,一面通过亲友关系向清官兵策反。如宋新洲通过朱子垣之妻陈文说服防营分统陈朝政(号宗棠),蔡劲柏通过刘月卿说服防营帮统刘炳宇(号统丞)。当时右江镇台兼防营统领陈鸿初(号仲宾)实力已为陈分统、刘帮统等掌握,并向陈统领陈说利害关系。同时王冠三、宋新洲、郭干臣、王干廷等则手执武器进入各衙门威胁,右江道台沈炳炎、知府高墨霖、知县万荣龄只求脱身,皆愿听从独立。同盟会随即决定在柳郡中学堂(今中山东路文化大院)召开群众大会,宣布柳州独立。大会通过:成立“右江国民军总机关”,王植槐为总机关司令官,迅速建立起以同盟会员为主体的新政权机构;发出通电宣布独立;王植槐并即致电广州,请派刘古香回柳主持工作。当时广东革命政府为加强革命党人在广西力量,即派遣柳州革命派人士中最有威望者——刘古香,乘两艘浅水兵轮于1911年11月13日回抵柳州,主持右江国民总机关军政事

宜。并带来几十名华侨敢死队，全部配备炸弹和手枪，准备参加北伐（民二年二月南北议和，停止北伐后，资遣回籍）。

1911年11月28日，右江国民军总机关改组，成立右江军政分府。刘古香任分府总长，并取得广西军政府确认。

当时，融县（今融水、融安）知事张礼干及其警备大队长焦盛贵，有反对独立形迹。刘古香察实，即派民军与该县士绅及各县团练联络，组织融县民军办事处。终于12月1日（农历十月十一日）柳州民军与融县民军合力对融县顽抗势力，予以平定。随即宣布融县独立。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同此一天，刘古香在柳州就任广西右江军政分府总长。同时刷新军、民政务，派出朱奇元、邓宝书、邓士瞻、黄坤、王宏猷分任迁江、融县、怀远、罗城、马平等县知事，锺尧勋任柳州警察局长。

1912年3月，怀远与龙胜边境土匪复炽。刘古香率队前往处理。省防军亦由龙胜到达古宜会师。刘古香主持，剿抚兼施，吴吉彪及吴国泰就抚。然后以计擒李林红、张三嫂、梁月初，悉经刘统领一一正法。余匪王均臣、杨大林恃险顽抗，卒被次第平复。

此役，刘古香为巩固柳江革命根据地，主动采取措施，招抚绿林，壮大民军队伍，肃清匪患；知县邓士瞻（柳城人）协力善后，恢复地方秩序。

陆荣廷任广西都督以来，整编军队，将包括民军所有全省武装力量，置于自己控制之下。1912年2月26日，陆荣廷电令柳、梧、龙州军政分府，3月1日撤销，原分府总长改任统领。刘古香任第五统领（统兵一千余人）亦即广西境内仅

存同盟会掌握的武装），百色设镇台，令调刘古香为百色总兵。刘置之不理，但他继续训练新军。加强治理右江各县行政，掌握革命实力。

当广西独立之初，同盟会中曾有人提请省参议会推选刘古香为都督之议，终因实力不足与陆荣廷抗衡而作罢。柳州同盟会员有认为广西宣布独立时，陆荣廷态度暧昧，对邕、梧、浔、柳等地革命党人肆虐，曾提驱陆口号。由此种种，陆荣廷对柳州方面革命势力，十分忌疾。袁世凯帝制自为，陆荣廷拥袁据桂。孙中山发起讨袁——二次革命后，陆对柳州革命组织，进行分裂，收买柳州府长（即知府）王狮灵和刘古香从绿林中招安并经提拔到实力最强的沈鸿英。王狮灵与沈鸿英亦以陆荣廷附袁势大而变节投靠。柳州实已形成陆荣廷势力控制之下。

1913年7月初，孙中山、陈炯明分别由香港、广州来电，促令响应二次革命。7月12日，二次革命爆发，柳州革命党人毅然树起二次革命讨袁大旗。当刘古香同意广东起兵讨袁时，柳州革命派处境已日趋险恶。外是拥袁军阀陆荣廷据南宁，陈炯明据桂林，两面夹攻；内有王狮灵、沈鸿英叛变投靠，但刘古香不畏艰险，仍继续作讨袁活动，取得讨袁军信任，予以饷械支援。一方面前往南宁运动独立的农实达被陆荣廷捕杀。另一方面派去湖南运动的陈绍虞，到达道州，接柳州失败讯而终止，刘古香不顾自身安危，不作逃避打算。当部下兵变之夕，马氏夫人及媳杨澄丧于乱枪中，刘古香越墙伤足，被沈鸿英软禁。陆荣廷控王狮灵密电，于十月九日专程抵柳，沈鸿英将刘古香当作战俘献给陆荣廷，陆急电袁世凯请示，袁复电将刘古香就地枪决。

临刑前，陆设宴款刘，席间示以袁电，并问刘：“你有何话说？”刘怒斥陆，说：“沈鸿英是我一手栽培起来的，今天为你帮凶而杀我，将来沈鸿英同样可以杀你！”然后即昂首阔步，走向刑场（东门外粤东会馆前鹧鸪堆——今机关幼儿园）从容就义，成为二次革命最后的牺牲者。

时公元1913年10月13日（农历癸丑九月十四日），刘古香年仅四十四岁。他革命的一生，功在民国，史迹卓著。二次革命讨袁牺牲，血洒柳江，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民国廿四年），予以明令褒扬（今存市博物馆）。柳人缅怀深切，曾以兴仁路改名古香路（即今曙光东、中、西路。详柳州市地名志21、22页）以示纪念。

卢焘在柳州二三事

蒙 智 扉

卢焘，字寿慈，壮族，广西宜北（今环江）县人。生于清光绪8年（1882年）农历五月初一，出生贫寒，勤学勇进。青年时即从事反清活动，是早期同盟会会员。辛亥革命前，1905年曾到柳州设立秘密联络站开展革命工作。并准备举行武装起义。曾与李德三（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罗城人）、刘古香（柳州人，同盟会柳州支部负责人）等革命志士遵照孙中山武装起义的指示，他从香港秘密运送枪支弹药回柳州。岂料在武宜事泄而被清政府通缉，遑远赴云南，考入陆军讲武学堂，继续进行反清革命活动，辛亥革命以后，卢焘投入如火如荼的反袁护国护法运动，并屡建功勋。他37岁时担任黔军第一混成旅旅长。后代理黔军总司令；40岁时奉孙中山大总统电令为贵州总司令兼省长。并追随孙中山元帅大本营。被聘任、委派为高等顾问和高级参谋。后因其母病逝，离穗返黔，治丧尽孝。自此，他奔波于黔、桂、粤诸省之间，致力于地方交通、文化等建设事业。

1936年“六一”运动时，为了促进蒋桂和谈，卢焘挺身而出，到广西南丹收编云南，四川等地在野散军并就任国民革命抗日救国第二十五路军总司令。曾先后三度奔赴南宁，从中斡旋调停，促进团结抗日。1949年11月，为了迎接贵阳和平解放，为了维持社会治安，保护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卢焘毅然挺身而出任贵阳市民众临时治安委员会主任委员。不料，竟于贵阳解放前夕（1949年11月14日晨），被国

民党反动派特务头子刘伯龙以开会为名，诱害于贵阳郊外。时年六十八岁。

卢焘牺牲后，中央民政部追认他为国家级革命烈士。卢焘一生光明磊落，清正廉洁，做了许多重大的益国利民之举，其爱国精神千古永垂。

卢焘烈士之生平活动，多有记载。兹根据卢焘烈士有关亲友覃栋梁等的回忆，对卢焘生前在柳州的活动，及其轶闻、轶事，作一些必要的补述。

1938年春，卢焘应李宗仁之邀，参加广西各界赴前线到江苏徐州安徽等地慰问抗日将士，并参观震惊中外的台儿庄战役。返回时，取道柳州，转赴贵阳（因为他已在早一年举家离广州到贵阳定居）。到柳州后，一不惊动地方官绅，二不告知亲朋好友，而是迳直投宿往昔住惯了的培新路亚新旅馆。该馆因位于当时的要津闹市，早已客满，该旅馆经营者卢秀女士，与卢焘早年彼此都认识辛亥革命老人林耿凡（宜山县人）。由于有此机缘，曾结拜为义兄妹。卢的投宿，自然惊动了这位义妹，从而得到妥善的款待。

为了便于奔走抗日救国大计，卢焘自1940年起在柳居住在东门路64号“息尘寄庐”（即今罗池路昔阍维雍公馆第三家隔壁）。卢焘应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的聘请，担任国民党广西省政府高级顾问，做一些团结各界抗日的工作，诸如动员地方士绅及各阶层力量，以支持抗日战争，支持广西当局的政治改革。黄旭初利用左派势力，在南宁创办干部学校，组织学生军（许多人后来成为我党地下武装“东江纵队”及解放战争中的“两广纵队”的骨干力量）。

那时，广西省政府每月拨给卢焘高级顾问薪金2000元

大洋。卢焘将此钱大部分用以接济一些贫困亲友，一小部分用来支持在广东碇石（南雄）就读于中山大学文学系的五女儿卢慈达（现定居于美国加州）。

在柳州就读的晚辈们，常常亲聆卢焘先生的教诲。卢焘常以其早年参加辛亥革命的历史，训导子孙，尤其强调“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的道理。为了推动革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他曾于1908年，到香港秘运武器，并伪装其为“洋纱”，装载上船，取道珠江、经梧州溯水而上。卢焘亲自押运。抵达武宣码头时，被清政府的厘金局（相当于现在的工商、税务局）发现。故因事泄而潜回柳州。

卢焘在柳州的家眷有母亲莫太夫人，夫人覃清德女士，年方3岁的长女卢慈祥（即覃栋梁生母）、年仅1岁的次女卢慈明。她们都居住在府前街（今中山路老人委大院斜对面立新路口）。卢焘自武宣潜回柳州，走到富贵升客栈门口（今工贸大楼对面），得知清政府的密探正欲往家中抓他，情势万分危急，已来不及辞别老母、妻女，迅即趑出东门到沙角，乘便船逃往梧州。抵梧时得到同盟会地下组织的资助，转赴广州。是时阅见报登昆明讲武学堂招生，遂从广州到广西龙州，入安南（今越南）海防，再沿滇越铁路乘火车到达昆明，经三次考试，均列榜首，遂考入当时满清最先进的军校云南讲武堂。在讲武堂与朱德是同学。朱在步兵科，卢在特别班。当时有10位地下同盟会员结为异姓兄弟，卢焘年长（比朱德大四岁），称为大哥，朱德为四弟，其间还有李云鹤、金汉鼎等等。后来，均在辛亥革命及护国护法运动中建立功勋。

卢焘1940年居住柳州，至1944年7月底日寇南侵商柳返

筑为止，约四年时间。此期间来访者有冯玉祥、蔡延锴、茅以升、李济深、白崇禧、张发奎等要人，当时的抗日战争进入紧要关头。1944年抗日战争时期，国统区每个月的头一天，都要召开国民大会，由当地军政长官主持会议。工农兵学商各界、机关职员都得参加。内容包括报告1个月来的抗战形势等等。1944年5月1日的国民月会，会场设在如今罗池路老干部活动中心旁边——当时是一个大体育场。卢焘居住的息尘寄庐，恰位于该体育场正对面。那天上午十一时散会后，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对白崇禧说：“卢寿公（卢焘字寿慈，人称寿公）就住对面。”于是由张前引，白随后，造访“寄庐”，拜会寿公。恰遇卢焘正在厨下手操吹火筒帮厨娜吹火。白、张登堂入室便打招呼：“寿公，我们拜访您来了”，寿公遂摆下吹火筒连忙起身相迎，自嘲道：“骑马不见骑牛见，你俩早不来晚不来，偏偏此时，大驾光临，有失远迎哪！”话落遂将白、张二人迎上楼客厅述聊。话的内容是近期日寇在河南一带结集，有南下湖北（当时武汉已沦陷）之意，对蒋介石消极抗战，甚感不满。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国民党军委会副委员长冯玉祥路经柳州，也曾到东门路“息尘寄庐”造访过卢寿公，冯、卢亦是莫逆之交。

卢焘在柳州乃至广西的时间虽然不长，却做了不少直接或间接与柳州、广西有关而又鲜为人知的利国利民利社会之事情，在此亦故举数例。

1907年，卢焘（当时仅25岁）与张铁城（江西瑞金人，1923年因反袁被杀害）在柳州创办樟脑公司，并设富贵升旗馆，一为筹集革命活动经费，二为以公司为掩护设立联络

站，与各方革命志士，如刘古香、李德三、卢笛伯等10数人，共同开展革命活动。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穗就任非常大总统。当时湘、桂两省当局反对，唯独任黔军代总司令之卢焘首先通电承认，并出师广西，命谷正伦为第一纵队出师柳州，胡瑛为第二纵队出师南宁。广西军阀慑于大兵压境，纷纷通电拥护孙中山，孙中山大总统电令委派卢焘为贵州省军总司令兼省长，加陆军上将衔，遂使广西的割据局面统一在孙中山的革命阵营中。

1922年，孙中山令滇、黔军队统一组织成滇黔联军，卢焘任联军总司令，把原来盘踞在柳州，骚扰民众的范石生、刘震寰部，全部带出柳州，离开广西，开赴广东，以支持、拥护孙中山。

1932年，云南商人赠给卢焘两万银元，卢分文不留，将一万元汇到淞沪前线，支持抗日将领蔡廷锴所领导的19路军；另一万元送给广西省政府，由公路局长莫树杰（南丹人）经收，作为丹（南丹）池（河池）公路的修筑经费。

1938年，抗战期间，卢焘在柳州兼营东古陵农场，先后种植松树140万株，桐树25000余棵。同年，卢参加广西省抗日慰劳团，前往第五战区信阳、合肥、徐州等地慰劳抗日将士，三月返柳。

1947年3月18日，卢焘致函粮食部部长谷正长（原卢之部下），要求减免广西田赋军粮；并亲自前往面陈困难状况，终获减免粮55万担，并发还1941、1942两年度粮食库券，使在贫困线上挣扎的广西人民稍得喘息之机。

1948年支持其子卢慈仪在柳州沙塘一带等办“柳州德寿农场”旨在推动发展地方畜牧业。

1943年2月春节，卢焘在柳州市东门路64号息尘寄庐的大门各书写了如下的对联：

庆中华一统

祝全世大同

横额为“卡萨布朗加”。（按：“卡萨布朗加”系北非洲的一个城市名称。1943年1月，中、美、英、苏四国首脑在此开会，认定对德、日两国作战计划，故在“息尘寄庐”门楣上挂悬“卡萨布朗”的字样）。

二门对子是：

轰炸东京飞不断

雄心硬夺太平洋

其横额是：“胜利属我”。以上两幅对联虽然格式比较简单、接近口语，然而就内容而言，却体现其爱国爱乡、救国救民的高尚情操。

〔注：此稿经卢焘烈士之子卢慈议先生（76岁）及卢焘烈士之外孙覃栋梁同志审阅，并作了某些订正。在此顺致谢忱〕。

怀念我们的父亲翟念劬

翟晓蓓 翟晓葵

父亲翟念劬，字秋莪。解放前，他是广西政法界知名人士，对广西法制建设和教学工作，多有贡献。父亲在解放前夕靠拢中国共产党，为迎接柳州解放和建立人民政权，竭诚务。柳州市人民政协成立，他即担任政协副主席，直至1987年病逝，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做出了贡献。他生于1891年（农历8月13日），今年是100周年诞辰。我们写这篇文章，缅怀他一生的业绩。

（一）

父亲祖籍来宾县城厢北门街，抗日战争爆发才定居柳州。祖父翟富文，是清末举人，1894年中举，曾先后任教于广州两广师范及桂林广西第二师范。1907年创办柳州中学堂，任柳州中学第一任校长（学监）。辛亥革命后，他当选国会议员，在北京任职。曹锟贿选总统，他拒贿南下，在广州国民政府领导下，履行国会议员职务。祖父为人，给父亲以至我们这一代，留下深远影响。

父亲早年随祖父在县办书院、两广师范附属小学以及县桥渭小学读书，熟读四书五经，唐诗宋词，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较多接触，培养了较强的国家民族观念。

1907年，他就读于柳州中学。1908年由来宾县考送广西第二师范，转学桂林。1910年在桂林二师毕业，成绩第一，1911

年公费送北京法律学堂。1912年学堂改名北京法律专科学校，他在校攻读法律专业，至1915年毕业。此间接受现代教育，受西方科学民主思想影响，有较强的民主法制观念和较高的法学造诣，为他的一生业绩，打下了坚实基础。

（二）

父亲于北京法律专科学校毕业后，1916年至1920年，先后担任广西陆川县承审员、广东地方审判所东莞分庭推事、广东紫金县承审员。民国初年，行政、司法逐步分离，改变了旧社会县长断案状况。当时的承审员、推事，独立办案，行使着现在县一级法院的职权。父亲任职五年，为民国初年的法制建设作出努力。

1921年至1925年，他参加桂军刘震寰军事活动，在法律界工作中断。

1926年春，他到桂林广西法政专门学校任民法债权教师，秋季，兼任广西第二师范应用文教师，开始教学工作。1927年春代理法专校长，兼任广西省立桂林第三中学国文及三民主义课教师。1928年到1930年又兼任广西高等法院（桂林分院）推事。1931年春到1933年秋，任法专训育主任。1933年秋法专停办，他又登录律师职务。在桂林八年，主要从事法学教育及法制建设工作，历年选任桂林教育会执行委员。

1934年10月，到当时广西省首府南宁任省察计委员，办理司法行政事务，计划改设各县司法处，筹办梧州高等法院第二分院。1936年梧州高二分院成立，父亲任首席检察官。1937年抗战爆发，定居柳州，开业任专业律师。

1939年广西大学改国立，校址由梧州迁往桂林，马君武

复任校长，他受聘为广西大学讲师。1940年聘为法律系副教授。1941年，日军撤出，南宁光复，他仍回柳州执行律师业务。直至1944年日军大举入侵，广西沦陷，避难至柳江县乡下。

1945年广西光复，日本无条件投降。10月，广西大学在柳州鹧鸪江复课，他再次受聘为广西大学法律系教授。1946年广西大学迁回桂林将军桥，他继续受聘，同时仍兼任开业律师，直至1949年广西解放。

从1915年在北京法专毕业至1949年广西解放，父亲从事法制建设工作30余年，其中，担任基层法官、地方法官、律师职务10多年；从事法专教学、西大法律系教学10多年；讲授过民法、刑法、民事诉讼法，他的学生、同事，遍布广西各地。他在担任法官职务和执行律师业务期间，清正廉明、刚正不阿，给人们留下深刻印象。

(三)

辛亥革命后，父亲曾离校经上海到广州，后与祖父同回广西，参加同盟会革命活动，是同盟会早期会员。

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后，曾到广西桂林督师北伐。1921年刘震寰受任广西陆军第一师师长，父亲因柳中同学关系，受邀任刘震寰机要秘书、副官长。1922年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退出广州，刘震寰就任西路讨贼军总司令，父亲以总司令代表名义进驻香港，与孙中山代表邹鲁联络，对陈炯明部下策反，立下功绩。陈炯明在广州的统治动摇，退出广州，溃逃惠州，父亲在追击陈炯明的飞鹅岭战役中立过战功，在战斗中负伤。1923年6月，孙中山回到广州。廖仲恺任广东省长，委任父亲为东莞县县长，兼任虎门要塞司令，

在兼任虎门要塞司令期间，曾以旗语发炮相威胁，阻止英舰入境。

1924年春，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确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父亲在广州亲自听到孙中山演讲，深受教育。西路讨贼军改称桂军，刘震寰任桂军总司令，父亲任军法处长。他在桂军总部特别党部参加国民党，是国民党早期党员。刘震寰所部桂军及杨希闵所部滇军盘踞广州。孙中山与共产党人合作，组建黄埔军校，筹划东征陈炯明，北伐打开局面。刘、杨与国民党中央争权夺利，国民党右派策划清共、反共，广州政局复杂、多变，父亲与刘震寰政见不合，离职还乡。

1925年，广州刘、杨事变解决，广西李白黄兴起。父亲在家乡隐居，至1926年春，才到桂林从事教学工作。

1927年国民党清党反共，在桂林搜捕、屠杀共产党人。南宁省党部电派父亲为桂林县党部改组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父亲托病辞职，并辞去代理法专校长职务。

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沦陷，他在家向北痛哭流涕，以法专训育主任身份在学校总理纪念周上作政治报告，号召爱国捐献，支援黑龙江马占山将军武装抗日。

国共合作，国民党组建国民参政会，邀请共产党人及民主人士参加。他当选为广西二、三届省参议员。1947年，又由来宾、武宣、象州三县选为国民党立法院立法委员，和国民党桂系有了联系。

(四)

1949年北京国共和谈，李宗仁拒签和谈协议，解放军渡江，李宗仁从南京出走。父亲回柳州家中隐居。7月，听

从家人意见，给满弟瞻莱经香港投入解放区，到北京跟姐姐上大学。9月，通过瞻葵、瞻霍与地下党柳州城工委委员熊元清同志取得直接联系，接受地下党交给的任务，联系地方开明人士，积极投入迎接解放柳州的工作。10月，白崇禧到柳州，要父亲经香港转台湾，继续履行立法委员职务。他避而不见，决心跟随共产党，竭诚为人民服务。

1949年11月25日柳州解放，在地下党领导下，他和高天骥等人组成柳州治安委员会，任副主任委员。在历任柳州市人民代表大会特邀代表、中苏友协筹委会主任委员、中苏友协副会长、抗美援朝分会副主任委员、省人民政府参事、省人民代表大会区域代表、柳州市人民政府委员、省政协委员、柳州市政协副主席，为人民革命和建设事业，竭诚尽力。

解放后，父亲积极投入城市民主改革和农村土地改革运动，以身作则，将来宾祖上遗下及柳州城乡自置房地产房地契，以及家藏黄金、首饰、白银硬币全部交城乡联络委员会处理，与地主阶级划清界限。城乡联络会将自住房屋兴仁东路房契退回，作自家住宅，人民政府并给他以省参事室参事名义领发工资。直至1967年他病逝前，一至在市政协办公。

1956年，他曾参加毛主席召开的最高国务会议，听了毛主席《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问题》的报告，亲自记下笔记。《资本论》出版他自费购置一套三卷，仔细阅读，勾划要点，晚年，他仍不断认真学习，真心实意的拥护共产党的领导，坚决走社会主义道路。解放后，我们姐妹八人，分别在各地工厂、医院、学校、政府机关工作，有6人参加中国共产党。

廖磊简历

廖 锋

廖磊字燕农，初名梦祥，生于1890年农历二月初二，系广西陆川县清湖乡永平村人。

父亲名绍甫，母赖氏，生三男一女，廖磊居长。廖磊未离家外出前，曾娶罗姓女为妻，罗氏病故后，在他驻军湖南期间，与湖南长沙人胡慧结婚，此后少与老家来往。驻军柳州后，在柳购置房产，柳州则成其第二家乡。

廖磊小时候入乡间私塾就读。1907年赴桂林考入蔡松坡（锷）创立的陆军小学。1911年毕业，直接升入湖北陆军第三中学。是时正值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廖磊为首倡导，同学响应，与清军战于汉口。1914年由陆军三中直接升入保定军官学校步兵科二期学习。1916年毕业，即往湖南唐生智部服役。时年27岁。

二

1916年初，在保定军校二期毕业之桂省同学，原拟回桂工作，但为陆荣廷等所不容，故与叶琪、周祖晃等同学，投湘军前保定军校同学唐生智部，廖被任为一师三团三连中尉连附。后升上尉副官、少校连长、中校营长。1920年护法之

役，任上校团长，自衡州出兵，进占宝庆、永丰、直下岳州。是时人称之为“廖猛子”。1926年，北伐军兴，唐生智部加入孙中山国民政府革命阵营，共同北伐。唐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唐任军长，廖磊任八军四师副师长，兼第三团团长。首先在湖南衡阳发动北伐战争，参与汉阳武胜诸役。北伐军占领武汉后，四师改编为三十六军，廖磊升任中将一师师长。1927年，攻占信阳、西平、直捣郑州、击溃吴佩孚主力，河南局势率定。廖升任三十六军副军长。

1927年秋，国民党宁汉两派分裂，互相火拼，唐生智部拥护武汉政府。蒋介石南京政府派程潜指挥第四路军西征，与唐生智部大战于黄梅一线，结果唐部失利。汉派汪精卫、唐生智宣布下野。唐部李品仙、何健、刘兴三军均向湖南退却，在汨罗河一线与白崇禧部激战又失利，退入湘西。李品仙与何健向白投降。三十六军军长刘兴也辞退他去。副军长廖磊继军长职，出兵占领宝庆，继续抵抗。白崇禧见廖磊勇猛善战，兼是同乡，因而通过唐生智劝得廖磊停战。所部三十六军则改隶第四集团军，廖仍任军长。

1928年4月，二次北伐开始，廖率所部随白崇禧继续参加北伐，沿京汉铁路经郑州，进占新乡、安阳、正定、保定，6月直扑北京，9月再克唐山。肃清军阀残部，北伐胜利。廖磊升为三十六军上将军长，驻率京津一带。

三

北伐胜利后，1929年2月，驻武汉第四集团军19军军长胡宗铎及十八军军长陶钧，趁李宗仁不在武汉之机，借用武汉政治分会之名，罢免湖南省主席鲁涤平。事件发生后，

介石企图趁机铲除桂系势力，桂系与蒋则因之决裂。蒋介石密派唐生智携巨款到北京，企图收买其旧部廖磊叛白（崇禧）。捉白解送南京。时廖磊与白共事已有一定感情，且属广西同乡，拒绝从命。反以搬家为名，把白藏于火车厢中行李堆里，廖夫人胡慧则以在内洗脚为由，拒绝军警入内检查，保得白氏潜离京津，乘日轮经香港回桂。随后，廖磊也难予立足，解兵与叶琪会合，经香港赴越南西贡躲避。

1929年3月，白崇禧回桂后，与黄绍竑、张发奎会合，出兵进攻陈济棠，事遭失败。蒋介石又派何健出兵湘南，进攻广西，形成湘粤夹攻之势。同时蒋又派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白在广西无法容身，只好和黄绍竑一同逃往越南，与廖磊等相处。1929年11月，黄绍竑经港回桂，重掌兵权，俞作柏也已下台。黄绍竑则电请李、白回桂，廖磊和叶琪也随李、白回到广西。从此廖磊投入桂系李、白怀抱，成为桂系主要成员之一。廖磊回桂后，任前敌指挥部参谋长兼七军副军长。1930年12月，原七军军长杨腾辉因与蒋介石势力勾结，被李、白赶下台，廖磊则升任七军上将军长，驻军柳州达7年之久。

李宗仁、白崇禧回到广西后，一面肃清省内敌对势力，以巩固其在广西的统治地位；一面加紧整训部队，并拉拢广东的陈济棠和北方的冯玉祥、阎锡山等反蒋势力，决心与蒋介石周旋。因此要扑灭俞作柏。俞作柏转入桂西山区的共产党部队。1931年春，李白命廖磊率部开赴右江革命根据地东兰，镇压韦拔群领导的红七军。根据地军民，奋勇抵抗，最后化整为零，廖磊一筹莫展，退回柳州。1932年7月，李、白又命廖磊率部第二次侵入东兰，重重包围红七军根据地，镇压革命，残害人民（按：详见《柳州文史资料》第一辑，《广西文史

资料选辑》第七辑)红七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机智应战,与敌周旋,相持两月之久。

1934年11月,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经过广西北部时,蒋介石电告李、白出兵阻击,以拨给巨额军费为报酬。时李、白与蒋对抗,不愿为蒋介石买命,消耗自己的兵力,但又恐红军侵入广西,抢夺了自己的地盘,所以表面上答应蒋介石的要求,命廖磊在桂北一带布防,以防红军侵入广西,密谕廖磊,如红军无侵桂企图,则尽量避免接触,以保存自己的实力。故当红军经过桂北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很快顺利通过。最后廖磊只截获少数红军落伍的伤残散兵及民伕,作为俘虏,照了一张照片,向蒋介石交差领赏。

四

廖磊对教育很支持,1934年回陆川省亲的时候,看到全乡没有一所小学,失学儿童很多,当即捐款2000元,并倡导各姓祖尝集资,创办了永平中心小学。当时陆川全县,亦仅有陆川初级中学一所,廖磊即与县当局商议,将陆中扩建成完全中学,并在经济上及师资方面,给予大力支持。陆中扩建后,在操场一旁,建成“燕农纪念亭”,亭内写有对联曰:一亭屹立流芳百世,陆中发展全仗鸿猷。

廖磊驻军柳州时,1935年间,龙城中学开办之初,由于经费、校址、校舍各方面都有困难,校董会研究决定,邀请廖磊出任董事长兼校长。廖应诺担任名誉校长。自此,廖对龙中建校给予大力支持,不到两年的时间,新校舍即告完成,在1936年秋即搬进新校舍上课。为了纪念他的事迹,该校新建的大礼堂。特命名为“燕堂”。

在三十年代以前，柳侯公园，十分简陋而荒芜。当时虽免费入园，但游人仍稀少，廖磊于1932年派本军工兵营士兵，对公园粗略规划，进行整修，建好游览道路，并从羊角山搬来桂花等花木，种在路旁，又从广东雇请名师，建高乐亭一座，供游人休息。

李、白为了与蒋介石对抗，积极扩军备战，令廖磊在柳州建造飞机场，创办航空学校，并任廖为航校校长，从日本购进教练机及战斗机，并请来教官，训练空军飞行员，建立桂军系统之空军。抗日战争爆发后，广西空军曾在武汉空战中建立战功。

廖磊驻军柳州时，秉承李、白之命，积极整训部队，以便与蒋介石对抗。廖磊从严治军、为后来抗日储蓄战斗力量。

五

“七·七”事变，抗战军兴，廖磊升任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率第七及四十八两军北上抗日。8月底到达山东，警戒海州、日照诸地。10月中旋即奉命率部参加淞沪会战，于陈家行、蕴藻滨、大场一线与日寇精锐浴血苦战一月之久，廖磊亲临前线，激励三军，裹伤继奋，确保阵地。是时战况虽甚恶劣，但仍抽调一团之众，增援黄港、湖里宅告急之友军。11月12日，奉命后撤之时，又命清所部殿后，掩护友军退却。

江南战罢，廖部退至浙西稍事休整后，先后在皖南、浙西发动游击，阻敌西侵。1938年春，奉命由浙西经赣北移师入皖，驻节合肥。四月徐州会战，移师淮北，坐镇宿县，屡挫南路日寇之攻势，阻击南路增援之敌北上，为台儿庄大

捷，创造了外部条件。徐州会战后，廖磊挥师由阜阳、霍邱挺进大别山，以大别山为据点，转战皖中、皖西、鄂东、豫南之间，阻敌西侵。武汉弃守，廖磊留守大别山，建立抗战游击根据地，兼任豫皖鄂边区游击兵团司令。10月又奉命兼任安徽省主席。此时安徽已大部沦陷，全省除立煌一县外，其余均有敌踪，敌寇对大别山已形成大包围，交通封锁，物资欠缺，原地方官员大都逃离，军政重任集聚廖磊一身。他决意死守大别山，为后方之屏障，以冀大举反攻之基。在任一年，采取积极措施，次第收复罗田、浠水、固始、黄川诸地，巩固大别山抗日根据地。

廖磊任用进步人士周新民、朱蘊山等人，任用七君子之一章乃器先生为财政厅长，以整顿财政，废除苛杂，改进交通，提倡勤俭节约，恢复生产建设。廖磊还派人深入敌伪占区，惩办贪污，肃清土劣。期间查实桐城县有一大绅士暗中通敌，立即下令拿办，就地枪决。又查得罗田县书记长以物资与敌伪交换，事发后畏罪潜逃，即下令通缉。因而民心振奋，不到一年时间，安徽有抗战模范省之誉。

六

廖磊在驻军柳州期间，受命出兵东兰，对红军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围剿，曾与中共为敌。但后来他在安徽主政期间却与中共合作抗日，共赴国难，1938年春，新四军四支队组建以后，所需经费，均由廖磊在省府拨给，并同意新四军在省府驻地设立办事处，以便加强与新四军的联系，办事处主任由新四军参谋何伟兼任。新四军领导叶挺、张云逸、戴季英等同志，曾多次到立煌与廖磊会晤，得到廖磊的热情

接待。当时廖磊一手创办的《大别山日报》曾发表《发扬精诚团结欢迎叶挺将军》的社论；还邀请叶挺、张云逸同志，对于校学员发表演讲。

廖磊在主皖期间，任用进步人士及中共党员，如省府秘书陈超琼，动员委员会宣传部长狄超白，组织部副部长等，都是中共党员。

廖磊与共产党新四军合作，为当时蒋介石安插在安徽的CC份子及部份桂系将领之反对，他们分别向蒋介石及李、白控诉，致使蒋介石对廖磊有所烦言，李、白也有埋怨。但廖磊始终以统一救国大业为重与新四军保持合作。

七

廖磊主皖以后，公务繁忙，积劳成疾。1939年春节期间，在主持全省县政会议的闭幕会上，突发脑溢血病，昏迷不省。后经医治，逐渐好转。同僚均劝以休息，但他却说：

“大敌当前，我岂敢偷安！”仍坚持工作。1939年10月12日，廖磊正与民政厅长陈良佐通电话时，旧病复发，昏倒在地。后经急救，但病情仍很严重。当时地处敌后，医生药物均告短缺，最后束手无策，终于23日下午10时，在住所绕室狂奔，面红耳赤，忽大呼“敌来了，杀呀！杀呀！”数声，即倒地口吐鲜血，与世长辞，终年仅五十岁。

廖磊病故后，中国共产党及新四军，曾派何伟为代表，参加了他的葬礼。新四军领导叶挺、项英、张云逸和四支队政委戴季英、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游击支队司令员彭雪枫、江北游击纵队司令员孙仲德等联名致电吊唁。1939年11

月14日，安徽省政府和二十一兵团军总部在立煌为他举行葬礼。

参加葬礼或送挽联悼念者，为数甚众。现摘录部分挽词如下：

1 周恩来 叶剑英挽词

百战仰勋劳当时江右联镳共誓澄清穷极塞
一瞬为寂寞此日山阳闻笛遥看涕泪满江淮

2 朱德 彭德怀挽词

星陨东南长淮柱折
耗传西北燕赵悲歌

3 叶挺挽词

国难方殷端仰长材作针指
台星遽陨缅怀遗志痛挥戈

4 马君武挽词

大树威名伏马长淮惊敌胆
千秋遗爱驻军三皖颂循声

5 李宗仁挽词

死而后已无愧完人举世自滔滔独劲勤昭大节
天不整遗遼樞良栋前塵犹历历那堪凤议平生

6 白崇禧挽词

安危相仗患难相从二十载戮力中原
辗转征塵成梦幻
朝野同悲尊亲同痛三千里惊闻噩耗
艰难时会失干城

（作者原廖磊的堂弟）

柳州历史人物轶闻摭遗

——记高成忠

谢贤修

晚清和民国时期的柳州东门街是遐迩闻名的官僚街，人物衣冠荟集一时，有曾任过广西和广东督军的陈炳焜、做过广西财政厅长的黄惠如、清封武功将军的高紫耀、右江镇参将罗万生及其子广州警察厅长罗冠仑、广西硝磺局长唐培初、少将师长唐纪和清贡生柳城县知事龙黄中、罗城县知事钟善初、清都司玉林城守营龙云庵（龙月卿之父）、统税局局长龙鉴平及其子学者龙梦荪、桂绥上校参议龙孝坚、清武官千总钱廷梁、老一辈戏剧界的组织者乐天堂经理黄秉衡、老司法陈子腾，也有老秀才柳州祀孔会主任胡玉成等，商民有万安堂药材店老板潘慎和。其中有的声名赫奕，炙手可热，有的富甲一方，鲜衣美食。在这些叱咤风云，睥睨一时的人物中，论对柳州地方的贡献，优数高成忠。

一 武职世家

清康熙癸亥（1583）年，高文焕从福建省福清县海瑞村随军至柳，历任千总、守备军职，遂定居柳州。曾孙高连升，道光时任柳州千总、城守营。连升有三子，次子高树堂，即高成忠之父，历任外委、把总，三子高紫耀曾受清廷封武功将军衔。

高成忠有二子，长子天爵，字伯纶，在广西陆军讲武堂毕业，任过荔浦县民团副司令，以后即闲居理家。次子天

驥。卒业于大夏大学，“九·一八”事变，国人愤于日军侵略。“一·二八”淞沪战事继起，有志之士，纷起抗日。时天驥在校将卒业，亦慷慨请缨从戎杀敌，写信回家征求乃父意见，成忠甚嘉其志，回信大加激励。信中有云：“汝，将种也，当报国仇，从戎御侮，以复国土，光我中华……”。适为记者采访，将信登于柳州日报，加以标题云：“凉血动物应该羞死，高成忠助子从戎抗日”。一时作为新闻传播，故称其为武职世家，亦名副其实也。

二 戎行经历

高成忠字景纯，生于光绪元年5月13日，九岁遭父之丧，兄成志亦早逝，遗下四女，因之家道不丰，叔父高紫耀驻防南宁，召成忠至邕抚养，使入学读书。青年时，感到读书前途渺茫，又以其母在堂，遂回柳，投身入右江镇提标左营管带廖大人部下当兵，以骑射见长。光绪20年，广西巡抚部院巡边阅操，考校部队，成忠以马、步、箭考列优等，亦善于使用步枪，得保升哨长。数年后升任哨官，驻防罗城县。光绪三十年，高成忠因参与平定陆亚发“暴乱”作战勇猛，“克乱”、“靖乱”有功，保升管带，赐兰翎。自此名望日彰，擢都司。

入民国后，所部编为桂军巡防营，升任统领，获少将衔。民国2年入将校讲习所学习，毕业后仍在桂军中任统领，讨袁护法之役，率部入湘作战。民国6年，奉调同陈炳燧入粤，任广东督军署少将卫戍司令（即广州城防司令），黎元洪授予他三等文虎章。民7年回柳，将旧宅改建成宏丽坚固的少将第（原悬有匾，后取下），人称高公馆。旋出任广西游击司令，驻柳城、雒容一带。民10年，桂系组织广西护

国军，陈炳焜任护国军使，驻军梧州，准备攻粤，高任梧州商场督办。于战事频仍之际，高对商民多维护。后因桂军刘震寰率部投粤，战事失利，陈炳焜由高率部护送回柳，陈解职赴天津，高受命为护国军第三司令，仍驻柳州。

民十年冬，刘震寰又进占柳州。刘的同学覃超在柳自封为广西民政处长。高看到各地自治军蜂起，各据地盘，互相攻击，强者吞并弱者，而自己只有两营兵力，不吞并别人只有被人收编。乃将所部分别拨与刘震寰、覃超各一营，自己退隐家居，从此脱离军职。

三 “维桑与梓”

高成忠从当勇递升至将官，历程艰难，使他深有体会，所以对部下颇为爱护，肯予提拔。卸职后，有些部属也退职回家，高都帮找工作，不使流离失业。驻军梧州时，不许士兵扰乱市场、不加派捐税，军纪比其他军阀好些。所以梧州的商号联名送一块“商场保障”的大匾，悬于厅前。

1921年至1922年，滇军（民众称红头军）两度进军柳州。军纪之坏，从所未有，要粮要饷，没钱强抢东西，拉夫勒索，奸淫妇女，自治军沈鸿英和旧桂系韩彩凤的部队几乎也和红头军一样恶劣，弄得民不聊生。当时兵至如潮，有钱的早携眷赴港澳安居，其次的在闻警之时也匆匆赴乡下择安全地方躲避，大多数民众无法走避，为了生活，只好留在城里，提心吊胆地过日子。高成忠的家属也避居香港，他却留在家中。当时兵灾已危及妇孺的生命安全，他看到局势太混乱，便号召民众组织武装力量，成立妇孺救济会，用他自己的私宅，收容避难妇女儿童。一旦闻讯大军将至，年青妇女便携包带儿进高公馆避难，楼上楼下全是打地铺的人，高家

暂供应饭食，也有自带干菜咸肉食品的。此时，高家将推笼大门关上，防卫森严，甚是安全。待事定后，避难民众各自陆续回家。以后妇孺救济会扩大，在对河择房屋大间而且坚固的，设立分会。总会则在高家。我家与高家仅后墙之隔，有些亲眷便住在我家里。一闻警耗，连夜便到高家躲避，可见惊惶的程度。

过往的军队开拔时，要拉伕挑担，挑不动的可以拿钱赎身，军队就此勒索驻扎民房，随意毁坏设备，更害怕的是乱开枪打人。地方官管不了，什么县长、局长多数是傀儡，老百姓有苦无处诉。记得有次两军作战，一梭子弹打在我家瓦面上，瓦片跌落打得我祖母一隻手鲜血淋漓，医了一个月。似此情况多不胜数。因此群众要组织力量，保卫自己，各街设立团防。全市设立总团，公推高成忠为团局总团长，陈督军衙门为总团局，有长短枪自卫，这样，各街民众才稍安全，散兵游勇也不敢猖獗，对保卫地方，稳定人心起到积极作用。

1922年10月，韩彩凤驻军城内，沈鸿英军驻城外包围韩军，占据城外高建筑，实行攻城。城内韩军也在城墙上布防，用炮轰击，置居民生命财产于不顾，如果攻防双方战斗激烈，人民必遭惨祸。高成忠对沈、韩都有交往，城内士绅商议由高和美籍传教士陈法言等出面，向两方交涉停火，让韩军撤出城外。高成忠铤城而出，向两方交换停战条件，结果双方同意停战。高留在沈军作人质。俟韩开城退定，沈军不追击也不进城，避免了一场浩劫。事后，全城商民念高屡护百姓，保卫地方，刻了一块“维桑与梓”的金字大匾，以颂其功。

1926年，广西局面渐定，市面逐渐繁荣，开始修公路。伍廷颺提议创办柳州公医院，推高成忠为董事长，负责筹建工作。高择城外天后宫为院址，每天亲往工地监督工程进行，从建大门、围墙、诊室、药房、花圃、购置设备，以及从广东聘请院长、医生、培训护士都经他计划或商议。以后几年中增设病房、科室，他亦具有劳绩。数年中不间寒暑，步行前往办公。后医院改为省立，重建大楼。至今柳州地区专署内还保留有建院碑刻。解放后改为人民医院。

柳州火灾后，街道扩建为马路。为使工程进展顺利，推举地方名望士绅和房地产主为主任。高成忠为最适当的人选，于是众望所归，高被推举为柳州建设委员会主任。扩建东大路、西大路、北大路、庆云路等，他都参与其事。

由于兵灾戕祸疫病流行，为了救死扶伤，地方人士商议成立柳州红十字分会，推举高成忠为会长，用旧三官厅为会址（即今红会医院第三门诊部大楼原址），殷实之户愿捐助者可作为会员，悬牌于门首以示尊崇。红会有职员办公，对贫病者施医赠药，倒毙者加以掩埋，施行人道主义。而高本人也做慈善事情，他家里购制一些中药施赠，如疳积、眼病、痢疾等药，有求皆赠。

高也喜欢桂剧，集股出资筹建东门外娱园和中山东慈善戏院，他家里有时也演唱桂戏，招待亲友观看。那时候，家里能延请戏班唱戏的，柳州只有他一家。

对群众性的文化活动，高成忠也是支持的，如春节舞龙、舞狮、抬阁等皆出资置办，交由爱好者去耍，各街的龙、狮游行到东门街，必有一场精彩的表演，如舞滚龙、洗牌灯、狮子抢青等，烧炮竹烟火最多的要算高家，观者云

等。春节过后，东门的龙灯抬阁等仍旧归还高家，洗补放好，以备来年再用。

高持家是节约的，冬着棉袍，夏穿云纱，也有旧官僚习气吸鸦片，后来戒掉。他不做寿，59岁生日，唐培初备了礼物炮竹前来祝贺，他坚决不受，双方相持，几至红脸，他还是婉谢了。

四 广为乡帮结善果

1932年12月16日高成忠因病逝世，次年3月出殡，丧礼隆重，仅次于陈督。讣文分送省内外各地，挽联祭幛千余张，广西李宗仁以下高级官员白崇禧、张任民、黄旭初、李品仙等皆有挽联或挽词，内容皆对逝者有颂赞之词。今选录数联列下：

李宗仁挽：

危难见公忠，忆当年屡护孤城，乡党至今思德惠；
勋猷昭史乘，悼此日闻歌蒿里，鼓鼙声处想旌旗。

白崇禧挽：

戎行久历，宏任艰难，平生好义急公，宣力桑梓欣誉望；
瀛桥归真，长昭德泽，争道嘉猷伟绩，缅怀硕旧痛凋零。

张任民挽：

公本乡党英豪，忠义薄云霄，御寇折奸真健者；
我黍世交子侄，凄怆怀杖履，扶危济困更何人。

黄旭初挽：

弱冠清长纓，独领编师称劲旅；
晚年还战甲，犹留善举在仙乡。

李品仙挽：

功拟凌烟，名士已归前辈录；

传溢露，典型留与后人看。

覃连芳挽：

解甲得闲身，羨公林下优游，广为乡邦结善果；
归真悲此日，奈我桂边驻守，遥申吊奠热心香。

史蔚馥挽：

百战归来，息影园林，仍能軫念时艰，劝子乘机图伟绩。
一朝复起，劳心桑梓，竟以殚精慈善，令人长此仰仁风。

刁兆英挽：

战萑苻猖獗，立戎马勋名，半世勤劳，易箴已归蓬岛客；
策桑梓安全，谋妇孺救济，四民依附，盖棺不愧柳州人。

清贡生前县长朱奇元挽：

梓里护当年，慨军旅纠纷，虎穴挺身力排解；
薤歌悲此日，恨云山睽隔，鱼峰翘盼徒歆歎。

像赞

周祖晃作：

矫矫高君，为国干城，讨袁护法，卓著奇勋。解甲而后，
独多善行，主医建路，济世利民，疏财仗义，桑梓咸钦，
千秋百祀永垂令名。

高成忠首创业余桂剧社

韦建章

高成忠，字景纯。曾任陈炳焜粤督军署及广西护国军卫戍司令。他常与柳州父老绅士阚德轩、唐培初、张振民、郑明斋、张仲善等聚谈，因大家都爱好桂戏，兴之所至，便共同商谈聘师传艺、组织团社，大家一致推举高成忠领头，高亦乐意承担。于是即席共拟规章，定名为“马平县群英桂剧化妆研究社”。立即筹备，择日成立。先聘来桂剧著名艺人黄经安、蒋直斋二位为师，同时贴出招生布告，不数日，有来自市区和近郊的青年百余人报名投考（那时还没有女性的唱戏）。由师择取30余名，请二位师傅协助购置锣鼓、弦管等乐器，并陆续购置枪、矛、刀、剑、鞭、铜等道具。在初冬时节的一个下午6时举行开学典礼，邀请本城绅士父老们前来指导。大会开始，先由高社长致词，后请来宾讲话，再由艺师讲授学习注意事项。将演员分为生、旦、净、丑、末等行，教导学生学习方法。礼毕，社长宣布每晚七点至十点为学习时间。

自民国12年（公元1923年）冬开始，经过师徒一段时间的共同努力以及高社长的亲聆督导，学生们进步很快。艺师便根据学习情况，按行分派角色排戏。舞台演出的服装、道具由高社长独自出资购买。由于艺师的耐心教导与学徒们的

勤学苦练，约两月左右排练已能正式演出。

学徒中有、周可、张斌、董天寿、韦建章、苏德、区殿元、梁亚冬、蒋竞芝、黄国华等多人。首次正式演出是在高社长家内前面门楼空地灰沙坪上，结果演出效果良好，获得观众的一致赞赏，不到两年，排成的戏有：《彩楼配》、《打金枝》、《抢伞》、《斩之妖》、《杀四门》、《徐杨三秦》、《武昭关》、《北门楼》、《五花阵》、《男斩子》、《女斩子》、《劈三关》、《红霓关》、《闹严府》、《平贵回窑》、《三请梨花》、《马武夺魁》、《杨滚教枪》、《文昭关》、《斩黄袍》、《打渔杀家》。《贺后骂殿》、《刘高抢亲》等数十出传统桂剧。这些戏深得社会人士和地方父老的欢迎。逢年过节，都有人来请求高社长资借演员及全套道具演出。

民国期间，高成忠在柳州除担负全邑治安总责外，举凡修建学校、公共园林、街道、沟渠等皆能踊跃资助。由于他为人谦和、喜于助弱扶危、热心公益，故全邑人都尊称他为高司令。民国14年春，全邑群众赠送他一块匾，匾上镌有“维桑与梓”四个大金字匾，匾长1丈2尺，高4尺。

张先春兆元生平简介

张汉华 区农乐

张先春先生，又名张兆元，1892年7月11日生于广西贵县桥圩太平村一个贫苦农民的家里。少年时勤奋读书，成绩优异。父母早逝，家境贫寒，全赖家族祠堂出资供其上学。

1911年毕业于贵县中学，1912年考入岭南政法学院，並加入同盟会。

1915年从岭南政法学院毕业后，回到家乡任贵县桥圩中学校长。1922年，李宗仁部驻军贵县、兴业一带时，张投笔从戎，加入广西陆军李宗仁部任上尉副官、少校参议。因他为人谨慎、办事得体，受到李宗仁器重。1925年2月起兼任雒容县知事。同年调广西省善后督办署任民政处员、警务处员。

广西省政府鉴于原任忻城土县弹压委员执政不力，乃于1926年委任张先春为忻城土县弹压委员（流官弹压）。张到任后，即对县况、民情进行调查研究，得知忻城从元朝末年起即由莫氏家族任世袭土司，历24世，跨越元、明、清三个朝代，在残酷的土司制度统治之下，人民世代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虽然清光绪30年（1905年），清庭迫于沸腾的民怨，实施改土归流，名义上取消了世袭的土司制度，但由于朝廷腐败无能，且鞭长莫及，所派至忻城县的弹压（官名，地方军

政长官)，对莫氏土司制度的实际统治未能动摇。辛亥革命后，国民政府虽屡派弹压委员至忻城，局势仍混乱，有的搞没有土司的土司制度，专横暴戾，民怨沸腾，百姓受灾深重，怨声载道。张先春到任后，首先鼓励发展生产，其次采取措施抑制土司官族势力；再次对县境内骚扰城乡百姓的绿林散兵游勇进行招安收编，妥善安置。至1927年，张先春看到县境生产有所发展，人口、赋税有所增加，乃向广西省政府报请将土县立为正县。1928年7月，省府批准了张的报告，忻城土县正式立为正县，彻底结束了统治忻城一千多年的土司制度。张先春被任命为忻城县第一任县长兼公路局长。1928年8月，在县城举行改土县为正县的隆重庆典，各乡村士绅前来祝贺，龙、狮並舞，热闹非凡，金鼓齐鸣，响声震天。同时，从柳州请来有名的戏班，连唱十天十夜大戏。又集中全县5个小学的篮球队到县城比赛，更是忻城破天荒的创举。张任县长后，更注意让人民休养生息，並着手修路建桥，为改变忻城交通闭塞的状况作出了贡献。

1929年4月，调任柳城县县长兼民团司令。

1929年11月调任宜山县县长兼任民团司令、公路局长、柳庆财政整理处副处长、宜山中学校长。1931年，张因派系倾轧及部属贪污受到株连而去职，后到柳州定居，开设张兆元律师事务所，从事律师职业，直至解放。其间于1944年春兼任广西大学驻柳办事处主任、任法律系专任教授，直至1945年。

抗战期间，张支持子侄辈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有的参加学生军，有的在校参加抗日救亡宣传工作，还资助一个侄儿乘飞机辗转经昆明、重庆到达延安入抗大学习。解放后，

这位侄儿在东北一个大企业任领导职务，还多次写信慰问并感激张先春对他的关照。

张执业律师期间，曾为一些贫苦百姓仗义执言，不仅不收费，还为他们提供各种方便。有些当事人多年一直和他保持很好的关系。

由于张先春出身贫寒，对来自家乡的穷亲友的子女非常同情，不仅供他们食宿，还供他们上学，其中仅上大学的就有4人。1943年冬，难民汪氏一家因日寇入侵，从江苏疏散逃难到柳州，乞食于张家门旁，张先春看到祖国同胞的苦难，同情汪家不幸，收养了他们，还供他的一个女儿汪若嫣就读于桂林君武中学，供其小女就读于柳州高中。又曾收养广东孤女廖剑芬，1948年供其就读于上海同济大学。

抗日战争胜利后，在张的侄儿、外侄中，有的从事党的地下革命工作，有的参加共产党的外围组织。张家成为他们经常聚会的地方。他们经常利用张先春的声望掩护自己的活动，请张的儿女代购进步书刊……。1949年夏，西大一些进步学生和张先春第三子从桂林同乘军用中吉普（搭“黄鱼”）返回柳州，在进柳关卡处被宪兵查出带有“违禁”书刊，张闻讯立即出面保护，使他们顺利通过。张对子侄中的进步言论、活动早有觉察，不仅不阻止，而且一直表示同情和暗中支持。张先春在罗池路的住宅的后楼，就曾作地下党开会的地方。

解放前夕，原曾在张先春属下任过禁烟局长的曾某，专程从香港乘飞机来到柳州张的家中，並购好张赴港的飞机票，敦促张携一子女或妻室逃往香港，被张婉言谢绝。曾某只得独自返回香港。

柳州解放当天（1949年11月25日），张先春的一个从事地下工作的侄儿，领一位解放军干部王同志来找张，了解柳州敌伪情况。张毫无保留地向王作了介绍。就在这天，王介绍张的次子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初期，土匪暴乱开始，军分区有关部门领导，请张配合写信给一些早年曾是张的故旧的匪首，劝他们出来投降自新。张欣然命笔。

解放不久，张先春积极参加知识份子训练班，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改造世界观，走上新的生活道路。在张的鼓励下，除长子外，其余的四个子女都参了军，其中一个女儿参加志愿军抗美援朝，另一个儿子进入广西革大。由于张先春先生真诚拥护中国共产党，受到党和人民的欢迎，先后被任命为广西文史馆馆员（在柳州办公）和柳州市第一届政协特邀委员、培新路街道革命军属委员会主任，为人民做了不少有益的工作。

张先春（兆元）先生在长期患高血压病住院期间，得到政府的良好照顾和关怀，直至1959年9月4日突发脑血抢救无效，病逝于柳州，终年67岁。

黄梦年小传

叶梦清

黄梦年又名鹤龄，1892年6月（清光绪18年）生于柳州前街（今中山东路黄竹巷口）。父黄仁斋，前清秀才，行医，后当小学教师。母柯氏，市郊白沙村人。黄梦年十五岁（1907年）去桂林投考陆军小学，先备取，领不到棉被，其父去信责之，谓“彼亦人也，你亦人也”。后复试正取。陆小三年毕业；值辛亥革命爆发，黄梦年参加广西学生军北伐。1912父病故（42岁），姐妹星散，黄甚伤感，对人说：

“我看破红尘，干一番后就回家里。”1913年“二次革命”，他逃离学校，投入湖南谭延闿部队北伐。后南京取消独立，湖南汤香铭接管。我军解散，黄梦年回家。几个月后，广西召集前陆小学生送湖北考军官预备学校，毕业后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黄亦随送入学，1919年毕业。是年投入广东第四混成旅当排长，参加孙中山革命军出师北伐。陈炯明叛变，北伐失败，他回广西讲武堂当教官。陆荣廷失败，闲居一年多。1922年黄绍竑讨伐林俊廷、沈鸿英，组织广西讨贼军，黄任宪兵连长。1926年国民革命军北伐，任第七军13团1营营长，留守后方练兵，后改番号为第55军（黄绍竑部）第一师（伍廷飏部）第九团（郭凤岗部）。1927调升第九团团长，参加平定广州教导团起事战争。

1930年第四第七军一败再败，不能在广西立足，决计出

师湖南。黄当时已升副师长，在衡阳与蒋军作战负伤，兵败后部队仍退回广西。

是年滇军入桂围南宁，粤军亦入桂攻桂林占宾阳，桂军各将领都退守红水河，独黄梦年（已升师长）极力主张并越过大明山脉，出至邕宾公路的四圹五圹，用偷渡阴平的办法向南宁进攻。结果滇军被击溃，南宁之围解，宾阳之粤军也不战而退。

黄梦年于1931年辞师职下粤治胃病，此时粤桂已合作反蒋。

1934年黄梦年任梧州海关监督。1937年抗日战争开始，任梧州民团指挥官兼行政监督。反又调浔洲（桂平）民团任指挥官兼行政监督。

1939年日寇攻陷南宁，黄被派为49军副军长（军长周祖晃）兼新19师师长，在桂南邕钦线作战颇勇，黄挑敢死队，参加者升一级，加发一月饷（笔者当时在场，为独立第三团中尉副官，参加敢死队）。1941年日寇退出广西，黄调任柳庆师管区司令，1944年日寇进逼桂林，师管区疏散到宜山，四战区派黄兼宜山警备司令部司令。1945年8月日寇投降，直至1949年11月柳州解放黄不再担任任何职务。

1949年解放军将临桂境，白崇禧布置游击区，一再要黄梦年出桂中区任职。黄固辞。解放后黄梦年靠拢人民，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参事，省政治协商会议委员，并将26亩园地及藏书，送与人民政府，1973年8月在职病故，终年81岁。

刘 克 初

陈 显 达

刘克初原籍柳江县进德乡人，1889年出生。有弟兄三人，他排行第二，尚有一姐均乡居。除种田外，其父还兼营一些副业，籍以维生。

1909年20岁的刘克初在广西陆军小学毕业后，接着入武昌陆军（中学）第二预备学校学习。后考入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第五期），与李宗仁同学。1919年毕业后，在桂军服务，历任连长、营长、参谋、参谋处长及师部参谋长等职。

1925年滇军离桂，广西宣告统一，国民政府命令将广西绥靖督办公署的两个军合并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为黄绍竑。该军的第二纵队改为第五旅，旅长伍廷飏，（当时该军不设师），同年6月，第七军部奉调参加北伐，而伍廷飏所部奉命留守广西。不久，留守广西的军队，改编为第十五军，军长为黄绍竑，伍廷飏的第五旅改为第二师，伍任师长，参谋长为刘克初，该师驻地在柳庆一带地方。伍和刘过去在广西陆军小学同学，相处得很好。

北伐战争中，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实行“清党”，黄绍竑任广西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柳庆地区亦相应成立“清党委员会”，由伍廷飏兼任清党委员会主任。当时，伍还兼任广西建设厅厅长及广

西公路总局局长。他为人开明，热忱欢迎有真才实学的人士（其中有共产党人）来参加建设柳州的工作。当时他和刘克初都不满蒋介石屠杀共产党人的所为。因此，征得伍廷颺的同意，刘克初曾利用伍任清党委员会主任委员的职权，营救过好几位在柳工作的共产党员。现据刘克初生前口述及其所写的遗稿，记录整理如下：

一、营救苏来苏同志。苏是刘克初挚友，在广西陆军第二纵队（即后来改编第二师）任团长的共产党员。“四·一二”后，白崇禧密电伍廷颺逮捕苏来苏。刘接到白的密电后即通知苏逃走。后来苏参加邓小平在广西组建的红七军。

二、营救陈岳秀同志。陈原是柳州中学教师，伍廷颺请其主办《柳州日报》。当刘克初获悉白崇禧派来的两名“清党委员”要逮捕陈时，立即面报伍廷颺。因当时白派来捉拿陈的人已派人守候柳州码头，在柳州下火船定遭逮捕。于是他们想出周密办法，决定派警卫排长，带四名士兵，用师部小汽车护送陈岳秀到鸡喇下船，并手令赵排长，不管任何人拦车搜查，均可开枪保护，等陈上船启航才可回师部复命。

三、营救李六生同志。李是伍廷颺请来柳州工作的广西公路总局技术人员。刘克初得知李处境危险时，立即通知其逃离柳州。

四、营救张胆同志。张是伍廷颺聘请来柳工作，他是福建人。刘克初得知张处境危险时，立即通知他和他爱人陈丽华（柳州人）一齐脱走。

五、营救苏德焕同志。苏是刘克初妻弟陈显扬同窗好友。当时白崇禧派来的两名“清党委员”找到刘克初，要刘派兵去天星巷52号抓以苏为首的5名共产党员。刘借口要打

电话向伍廷飏司令请示，马上派亲信赵排长先到天星巷52号通知苏等五人快逃，然后才派赵排长带兵随“清党委员”去捉人，结果扑了个空。1961年在柳州政协举行的一次晚会上，苏德焕的哥哥德运见到刘克初时，问及当年五人在天星巷开会，是谁派人送信传他们得以逃走？至此刘克初才解开他这个“迷”。

六、营救苏德泉同志。苏是陈显扬同窗好友，刘克初是通过陈与苏相识。1922年苏在黄埔军校被捕，关押在广州南场教养场。场长是柳州人覃采如。刘是应族叔刘震寰（时任滇桂联军总司令）请到广州任职，但因其部属多为绿林出身，部队军纪差，所以拒任。当刘知道苏被关押时，便去找覃采如场长设法营救，覃说需得到刘震寰总司令的信才行。但因刘克初拒绝在刘震寰处工作，不便请他放人。转托在滇桂总司令部任秘书长的柳州人钟震吾想办法，钟当即代刘震寰写了释放苏德泉的信。覃得了信请示上级后，立即释放苏德泉。苏出狱后出走香港。

以上是刘克初在“四·一二”期间主要做的事情。之后在30年代头数年，他曾任柳庆专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长、副指挥官。1936年调任广西桂林专区民团指挥部参谋长。抗战军兴，任中国革命军第十六军集团军兵站参谋长及第五战区第八兵站参谋长。抗日战争胜利后退役。居住在柳州木桥街（今景行路）。

1946—1947年，被选任柳江县参议会会议长，与当时的柳江县长杨义工作配合得很好。他为人温和、待了诚恳、生活简朴，能资助亲友就学，使侄儿启亮能与他三个儿子一道在交大毕业。平素少应酬，唯与杨义、黄鹤龄、胡伴侣、韦昆

若等交情深厚，黄任师长时几度邀请他出任幕僚长，均未如愿。他一生幕僚生活，在乡间未置过一亩田，只在双桥圩外荒岭上的小果园中盖有住房一间，种有少量果木而已。

1949年柳州解放后不久，国民党的柳州警备司令秦镇（黄村人，曾任过师长）率残部匿居乡间，刘克初得知这一消息后，令其长子启焕下乡劝秦向人民政府投降。后又经柳州治安委员会主任高天骥去信劝降，秦镇终于起义投诚，为统战工作出过一分力。1950年柳江县乡下，仍有小股土匪扰乱地方，刘曾接受柳州市军管会指派与杨义一道，冒生命危险下乡劝说“反共救国军”师长韦铁、韦代宣向人民政府投降，对剿匪工作有所贡献。刘于1978年病逝，终年52岁。

张朝玺小传

张宏德

张朝玺（1918—1953）字紫封，镇边县（今那坡县）正阳街人。幼时家境贫寒，晚清在龙州武备学堂读书，成绩优良。毕业后即追随蔡锷、纽永健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主义革命。蔡锷发起云南起义，张亦紧跟讨袁，直至第二次革命胜利。

1901—1908（光绪末年），蔡锷兼任广西陆军小学总办时，张朝玺在该校任教官，是李宗仁的老师，为培养北伐骨干而尽力尽职。

北伐胜利后，张朝玺曾以陆军少将军衔任南京市公安大队一队队长（陈良佐为第二大队队长）。

后从南京调湖北宜昌市任统税局局长，不久即调广西任上林县县长职务，任期三年（1915—1918）。在职期间，宾阳县有一贩毒商曾用6000块光洋作为买路钱，想从上林通过。张将钱和人、毒品一并押交上司处理，此贩毒商又用重金对这位上司行贿，该上司见钱眼开，即将该贩毒商放行。

三年期满时，张卸任商职，民众自发送行，群众中有人端盛满清水的面盆，有人捧一面大镜子，有人捧一把“万民伞”，有人捧一块匾，上书“两袖清风”四字。以示明如镜，清如水，万民伞则意保护民众之意。

1919年（民国八年），张第一次出任镇边县县长，于该地名胜“憩馱岩”悬壁上书题“滴翠岩”三字。字体刚劲有力，下款署以陆军少将张朝玺题。并延工镌刻。可惜该书题于“文革”时被铲除。“文革”后，那坡县正多方查找张的原手迹，该县准备重新镌刻于悬壁原处上。

1927年（民国十六年）张第二次出任镇边县县长，任职期间分管地方治安，以正压邪，扶植正气，政绩显赫，大得民心。

而后，蒋介石背叛孙中山先生“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并排除国民党内左派将领，张亦在排除之列，因而参与众多的国民党革命将领。谒南京中山陵哭墓，以发泄义愤和怀念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1940年（民国二十九年）张出任柳城县县长。因长期受孙中山先生革命思想的熏陶，忠心耿耿为人民服务，廉洁自守，出污泥而不染。近半个世纪政事，乃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身无半文积累。而后目睹国是日非，政治腐败，不愿同流合污而辞官，隐居于柳城县沙塘乡长塘街（今郊区长塘村）。1945年（民国三十四年）抗日战争胜利后，正式定居该地，从事园艺，自食其力，引以为乐，以度晚年。

1950年，张已69岁高龄，家贫如洗，生活来源多是依靠亲朋接济和赊借度日。其妻陆凤翔重病卧床无钱医治而命归黄泉。脚下尚有二子一女，大儿15岁，二儿10岁，小女刚满两岁。

暮年，他目睹国民党反动派政风腐败和蒋家王朝在大陆的覆灭。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五亿中国人民真正的成为国家的主人，他看到了希望，于是他毅然送大儿子参军，保卫国防，建设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张老于1953年谢世。

郑 兰 生

张 正 明

郑兰生，名承典，兰生乃其字，广西柳州市人，1840年生。12岁丧父，幼年时在邑读私塾，青年时曾进广州师范学校就业，后举晚清末科秀才。其时清皇朝政治腐败，内则官僚地主压迫剥削人民，外受帝国主义侵袭。郑兰生青年时即怀爱国图强之志，深思若要富国必先强兵。1906年广西开办陆军小学堂于桂林，他乃毅然报考，获录取入学业，1909年毕业后，旋被选送入湖北陆军中学学习。1911年辛亥武昌首义，广西积极响应，并出兵6个大队，由王芝祥率队出发南京。郑兰生充任王部宪兵连一排长。不久，清帝退位，和议告成，王部解散。1912年，郑兰生转入保定军校第一期深造，1914年毕业后，分发到浙江督军兼北洋第四师长杨善德部任见习官。1915至1918年仍在该部，历任排、连长、副官、参谋等职。至1924年江苏军阀齐燮元与浙江军阀卢永祥因直皖两派的矛盾和淞沪地盘的争执而酝酿战争，局势十分险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郑兰生痛感万一战争发爆不知道又要伤害多少老百姓的生命财产。为避免介入这场罪恶之争，遂愤然辞职回柳州。

1925年李宗仁和黄绍竑两部组成定桂讨贼联军总指挥部，李任总指挥，郑兰生任该总指挥部上校参谋，从此成为李的得力幕僚，尽忠竭力辅佐李宗仁，并参与清除旧桂系军阀陆荣廷、沈鸿英等部的战争。陆、沈被打倒，广西得统一，

1926年国民革命军大元帅府在广州召开两广统一会议，广西军事机构调整名称为“广西全省军务督办公署”。任命李宗仁为督办，黄绍雄为会办。同时将广西军队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七军，李宗仁任军长，率师北伐，黄绍竑为军党代表，镇守广西。郑兰生均在李身边工作，随同北伐。1929年蒋介石阴谋瓦解新桂系实力后，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仓促逃赴香港，郑兰生亦随同逃港。广西政局大乱，幸得旧部师长梁朝玳援助，李、黄、白于1929年底至1930年初先后回到南宁，收拾残局，重整军旅，并于1930年冬，以破釜沉舟之决心，一举击溃滇军主力，荡平侵入广西全部敌军，广西重归统一。即在此种困难情况下，郑兰生始终追随李宗仁。1931年后，郑兰生被任命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少将处长，及总部总办公厅副主任和主任等职。1937年升任中将参议。同年底，取代覃连芳任“广西全边对汛督办”于龙州。1939年日军由钦廉进占南宁时，郑兰生奉命押运金库巨款及机密要件避于越南，同年底日军撤退，郑兰生将原物悉数交还，原封未动，丝毫不缺。是年底，因病辞职归里后，均在家静养，读书习画，尤喜画竹梅，藉表其坚贞之志。并与进步人士如高天骥、陈如平等时有接触往来。1945年日寇无条件投降，抗日战争取得胜利，国共两党酝酿第三次合作，两党领袖在重庆会商国家大政，签订重庆协定。举国庆幸，命认两党团结建国，中国富强在望。詎知蒋介石悍然撕毁重庆协定，重新挑起内战。郑兰生睹此情形，甚感痛切，故在1946年受国民重托，以国大代表身份出席南京政府召开的“国民会议”期间，蒋介石曾拟畀予要职，请他入京，郑兰生愤然谢绝。在此之前，新桂系亦曾多次邀请他出任省财政厅

长和柳江县长，但均予以拒绝，宁愿在家过着清平生活，亦不愿同流合污，以保晚节。郑兰生这种刚直不阿，正气凛然和同情困苦民众与追求真理、要求进步的崇高节操，不仅为梓里所推愿，且为中共所理解。1949年柳州解放之后，深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列为被保护的對象，并以无党派民主人士身份，出任柳州市政协委员。并于1956年参加民革组织、并当选为民革柳州市第二届委员会委员。他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更热爱民革组织。他和藹可亲，平易近人，热情待人，是柳州市民革支部中深受同志们尊敬和爱戴的老同志。不幸于1959年急病逝世，享年75岁。

柯 积 丞 建 功 滇 边

柯 刚 蒋 霖

清末民初，柳州有位建功滇边的著名人物，名柯积丞。边民感蒙他拯救于灾乱疾苦之中，筹资为其兴建生祠永祀。

一、柯积丞的身世

柯积丞，字树勋，生于同治元年（1862年）9月13日。在柳州出生。原籍福建省靖南县南前村鸾泉社。父名子林，为清朝武官。曾在柳江里雍乡落籍，后才迁入柳州城厢。咸丰七年（1857年），李文茂的大成军攻陷柳州，子林全家殉难，唯子林突围奔梧州，续娶夫人姚氏，回柳州生积丞。不久姚母去世，续娶赵氏夫人。

积丞自幼颖悟，好交游，喜技击斗鸡，不好文墨。经常早出藏书于草堆之中，晚则挟书归。继母知后，召回哭告：“你父只生你一人，望你学有所成，你不专心致志，我不能放任不理，如不愿习文，学武如何”？于是聘武师教艺，应试时获武庠生。当年19岁。时值越南战起，积丞投岑襄勤部，授右营帮带，隶属何元凤部。他所带的部属，多系广西人，傣族同胞称他们为“广马”。光绪10年我军克临洮、广威、不拔等府。积丞建有战功，保升千总，调任开广营帮带，防守红河。管带李旭初惜其才，勉励他说：“你是政治才干，光学武不习文不行。你欲献身边疆，应用心研究经史，才有成就。”这时积丞已28岁，从此他发奋攻读

经史，兼学数学、测绘、土木、医学和乐器等。由于他多才多艺，且熟悉边情，被委以改造南溪铁路，在中越边界树立国界碑。滇、越铁路建成，带领铁路巡防第4营驻防河口，缉获劫杀法人要犯，法国政府赠给他二等金质宝星。法人有虐待华工的，他亦抗争不遗余力。

二、为西双版纳人民的安居作出贡献

1910年（宣统二年）前，西双版纳连年战乱，各勐（傣语，地方）头人互相争斗，局势难以收拾。宣慰使（官名）刀承恩，多次向普洱道台和省督告急，请求派兵平叛。从3月19日至4月间，总办刘成良率汉族士兵万余人，围攻曼费，未能将此弹丸之地攻破，刘亦染瘴病故。复委黎肇元平乱，亦未能克。宣慰使着人上省，向省督告急。省督指名速调柯积丞星夜增援。柯巡视后，仅留百名兵丁留守。而以200兵力，悄悄开赴车里，途中露宿密林，次日又浩浩荡荡开至勐海，如此反复多次，造成柯氏大军陆续到达之假像，以灭叛军之威风 and 动摇其军心，以实攻佯攻结合、攻破景真，当夜五更开始围攻勐遮，连战数夜，一举平息遮景之乱。勐遮土司叛匪头目刀正经欲逃，为伏兵截获，枭首于市。柯驻守遮景，抚傣民归田农事，大得民心。

1911年黎肇元总办染瘴病故。邦办亦畏瘴辞职。柯调思茅，时值民国刚建，地方骚乱，柯率第五营防兵保护思茅城池和商号，功绩卓著，省督授以陆军少校和一等金色奖章，并念普思为英、法两国边防，又时闻叛匪帕雅康亮扬言报仇，边民惊恐，省督随电命柯积丞为普思殖边总办，（后为普思沿边行政总局，再后又改为普思殖边总办公署）集大权于一身。他是长期进驻西双版纳的第一个汉族官吏。民国7年2

月澜沧保黑之乱和民国11年緬宁之乱以及雅口之役，均为之平息。西双版纳宣慰、土司、帕雅目及傣族人民，得以安居乐业，柯即开始施行他治边的一系列措施。于是西双版纳出现了一个兴旺时期。

三、制定施行政治、经济改革的十二条陈

（一）改流：以建立巩固中央集权制下的流官（汉族）制度，又保留土司官的世袭制度。顺应了土司世袭愿望，又大权集于汉官之手。采取小权分散的政治改良措施，为西双版纳之安定奠定了基础。

（二）筹款：为建立地方经济自立，规定各地方各税率制度。开办银行、调节地方财政，除土弁头目和赤贫者免征外，每户年征2元。以一半分给各勐土弁头目为办公薪金；一半提交行政总局为管理经费。废除旧有一切苛派，建立统一的税收制度。

（三）官守：规定行政总局及各勐地方行政管理制度及职权范围。车里为西双版纳中心，统率8区25勐之行政事务，以整顿地方，改良风俗。

（四）诉讼：建立地方法律的司法审判机构。各勐设官行政，凡民间鼠、牙、雀、角、随到随审、随结。每勐设2员录案、填格。审判检察机关，敷衍治理，重大案件仍归总局审判。

（五）交涉：规定边境问题的处理原则。旨在维护国土完整，不受侵犯。

（六）实业：兴修水利，引进各类工艺工匠，发展地方手工业。旨在资源开发利用及振兴经济。十二版纳田土肥沃，气候温和，但当地农民栽种专候天雨，不知凿渠灌溉。各

处竹木茂盛而不知制造。为此，募集各种工匠，分往各勐认真习教，逐步推广实业，俾免利源外流。

（七）国币：稳定币值，规定内外币值兑换率均以尊国权为本。禁止锡法抵银元，并免英、法银元、铜元参入。

（八）通商：鼓励经营商旅，疏通航道桥梁，整修马帮道路。十二版纳西南通英缅，东南通法越，东达思普，北达威镇，适为商务辐辏之区。各勐盛产花茶，又有练脑之樟、制材之柏、银、铁、铜矿均属利弃于地。但道路崎岖，路断人稀。为通商贩，开通沟渠，修桥造船，安设旅店，并盖兵防站，使来往商旅驮足得兵保护。

（九）学堂：提倡新学，兴办学校。在车里兴办第一所学校，逐步普及，勐设汉语学堂，改变过去不通汉文状况，以便汉傣文化交流，破除佛寺经书教育，逐步统一教育制度。

（十）邮电：创办邮电局。定点安设电报邮政，疏通信息，以利辟为商埠，连通英法两大国。

（十一）招垦：鼓励农垦，发展农业，粮富民安。并先率自统之第五营开垦示范。

（十二）练兵：训练汉傣民兵，以固国境。有事则荷戈执戟御侮冲锋；无事则凿井耕田散还各寨，时以训练教育，故边陲无事，固若磐石。

当推行十二条陈时，还派生有户籍法、折工法、垦植法、守法及婚姻法。婚姻法规定无论汉傣民族，男女均须平等看待，不得稍有歧视；官、兵、民均可互相结婚，但须男女双方情愿，不能强逼等等。

这十二条陈实施之后，西双版纳各勐之间的争斗日平，

社会安定，商业兴旺，新学萌起，道路畅通，出现了繁荣兴旺景象。边界外的英、法列强，亦不敢轻举妄动。在英发动“五卅”惨案、“沙基”惨案时英方约期修定边界，柯病身发高烧，扑跌断门牙，仍抱病如约前往，并以强硬态度，迫使英方让步。

四、在西双版纳立足得到傣族同胞的支持与信任

民国12年普思道尹萧瑞麟，以积丞久寄居边庭，威望日增，恐养成尾大不掉为由，密电省长唐继尧，请委萧学智接替。同时，将积丞统率的勐遮之第三连，以点验为由，调至思茅，缴械解散。并责积丞以十二版纳之治安安全责，如有风吹草动，惟积丞是罪。积丞忧虑边疆处于英、法两强之旁，境内叛匪时时兴风作浪，武装逐一被解散，一旦战争发生，傣、汉族人民又处于痛苦境地，随即训练民兵，以防万一。边民信任他的措施，尽全力维护治安，并无意外。

省长唐继尧以为，积丞治边10余年，政简刑法，汉傣和睦，边境安宁，省府无南顾之忧。不宜轻易调动，不允萧之所请。萧又呈请省公署，将普思沿边8个行政区改为县，直隶萧道尹公署，并拟撤销普思沿边行政总局。积丞认为拟区改县，条件不成熟，据理力争，随以搁置。

西双版纳的刀片领（傣语土地之主）宣慰使刀承恩，生有9男，均请柯积丞命以汉名。柯将长子柯祥晖拜刀承恩为义父。1943年6月21日刀承恩病逝，议事庭决定让刀世勳任刀片领——车里宣慰使，他以“和亲”政策，沟通了汉傣关系。

云南古时为夜郎国。但长期受大汉族主义的影响，是以各勐上弁及傣民，不时以“两广大还是车里大”的疑问向柯

质询。几经解释仍不通。民国13年夏，柯亲率宣慰史及各土司头目团首等，到省晋谒唐继尧，并参观云南昆明各兵营、机关、学校和工厂，年底由昆明归来。他们体会中国幅员广大，民众物富，并深感各机关长官对边民一视同仁，优礼有加，才不再作驱逐汉人之想。唯以共存共荣为最高目标，积忝随取得了傣族广大人民的信任。

五、在西双版纳留下大量遗迹和诗篇

(一) 修建车里至思茅大道的测量与桥梁的建设。

(二) 车里宣慰街西北10里之景德。行政总局衙署的设计与建筑。

(三) 铁路营碛地点的勘测和设计。

(四) 中越边界线的测定与订立国界碑。

(五) 测量改造南溪铁路。

(六) 创办普思沿边土民学堂于思茅之大佛寺。

(七) 勘查滇缅南段，打洛至南雅河段界牌。

(八) 带去柳州打击乐器——杨琴，并传给她女祥贞。

(九) 首次开发勐板银矿，组建普利银矿公司，定名“普利”，寓有均利之意。

(十) 留下了大量诗篇。现录“龙江竹枝词”诗6首，均为反映当时傣族人民风情诗句。

(一) 学僧（傣族儿童从8—9岁便送入缅寺学僧，身披袈裟）。至弱冠学成还俗，谓之变人。

稽首慈悲佛一尊，袈裟新着晚风翻，

他年学就都还俗，见说人才出梵门。

(二) 胆佛（傣俗信佛重僧，每有疾病事故，必往缅寺祈祷，谓之胆佛）。

钟鼓喧声缙寺开，老僧持扇坐蒲台，

腊条数炬花双朵，队队夷姑胆佛来。

（三）抛毬（傣女2、3月抛球，亦名丢包，见如意少年击中，则成夫妇）。

时样衣衫趁体妍，绣球抛掷早春天，

邻家姐妹齐身贺，恰中多情美少年。

（四）捕蝉（3、4月傣族男、女青年，持火把到江边捕“知了”实为男、女幽会）。

夜色清凉四月天，相思无那不成眠，

手携火把江边去，可有同心共捕蝉！

（五）唱歌（傣俗每逢喜庆必欢歌，女唱声言优美悦耳年）。

一曲当筵进酒行，歌喉宛转似流莺，

休嫌缺舌音难解，笛韵悠扬也动情。

（六）约骚，少年男女夜深相互调情，谓约骚，父母见之不禁。

春心脉脉夜迢迢，笑语楼头两意调，

郎本知情依少艾，莫教辜负此良霄。

六、临终时公开清点箱柜

积丞操劳过度，于1926年5月29日（阴历4月18日）卒于任所，年64岁。同年9月21日省督府加赐丧葬费2000元，公葬于澜沧江东北岸白花山，并追赠柯树勋陆军少将军衔。

积丞在滇边任职15年，临终前，邀集公署总务科长陈祖培、二区委员王承义、三区委员胡人剑、汇同公署员工及他家属，公开清点箱柜，共得7000余元，祖培大声报知，积丞说：“内有2000元是车里富滇银行寄存，若干元为公款，应取出归还，遂瞑目不语。

曾 胜

陈铁生

清代道光年间，柳州出了一个高级武将曾胜，他官至广东陆路提督。提督，又名提督军务总兵官，为清代省级地方武职的最高长官，军阶为从一品。

曾氏先人来自山东，于明末迁柳州。到柳始祖为太寿公，时任柳州地方武官，清兵破城时战歿。曾胜的曾祖名自秀，祖父名子干，父名圃安。

曾圃安生三子，长子曾颇，三为曾谦，次即曾胜。胜字诚斋，号心一。生于乾隆37年（1772）12月初三。长得魁梧剷悍，孔武有力，能弯12石的硬弓。从小有谋略，19岁弃学入伍，由于作战英勇，很快擢为提标外委（清各省提督直接统领的绿营军称为“提标”，外委为从九品），不久，又提为把总（正九品）。清制，对于武职官员升补，均须严格考核，“较技能”是考核内容之一。同邑者全某与曾胜有表亲之谊，也一起得机会参加提升把总的考核。全俱曾骑射过人，恐于己不利，临考暗用小刀将曾所骑马的蹬革割断，当曾胜上骑时自不知觉，但仍然安稳地乘坐，在弓刀的考核中获得通过，而全反而落榜。不久全某所为被曾胜知道，彼此有了戒心。这段时间，曾胜因连年“清剿”有功，又由把总累升为义宁协右营外委千总（正八品），东兰营千总，降

林营守备（正五品），梧州协都司（正四品），以及游击（从三品）。而全某也由于善于攀附，升了把总。但他视钱如命，克扣军晌，按名吃缺，被下属控告，曾胜具情上禀，将全免职，永不录用。全怀恨在心，回家后于夏日的一个傍晚，趁曾胜之父曾圃安在门前乘凉之际，用刀将其刺杀了。全某事后自知难逃法网，遂投监自首，照律当斩，于是被解至曾圃安的葬地罗汉岭生祭后行刑。这时曾胜仍接连提升，先后为云南城守营参将（正三品）、维西协副将（从二品）、湖南永州镇总兵（正二品）、广东南韶连镇总兵，直到道光13年（1833）任广东陆路提督。

其时，正当资本主义列强以贸易为幌子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侵略之际，其中尤以英国为烈，以往英国对清贸易，一向是把垄断权交给东印度公司。这是一个民间商人组成的贸易集团。由东印度公司向广州派出的特派委员，清朝方面称之为“大班”，其贸易特许证由英国发给，每20年更换一次。1834年是到了更换特许证的时间，但在此前两年，英国国会作出决议，要回收对清贸易的特权，不再延长东印度公司的特许证，由政府直接派驻商务监督以代换东印度公司的代表。

英国第一任派到中国广州的商务监督是威廉·约翰·律劳卑，47岁，海军大校，拥有贵族的称号。他到了广州，住进十三行街的英国商馆，很快即按英外交大臣巴麦尊的指令，把自己到任的通知信交给本同书记官，令其转送两广总督。在当时，这一行动是违反清朝禁令的，这次英国政府派人进入广州，事先未向清政府提出申请，又公然不经当地商人而把表示对等关系的信件由他们的人递交总督。当时的两广

总督叫卢坤，他对此十分愤慨，令下属向来人严正指出，他们这次到广州违反了清朝的规矩，既带有女眷，又以平行的口气写信，不经商人转呈而直接交给官府，信中还夹写英文，声明对此信件不予接收。谁知律劳卑固执己见，一意孤行，声称自己和普通商人不同，非要和官府直接打交道不可。如此反复数次，相持不下，卢坤于是在同年九月二日宣布封仓，也就是停止对英国的一切贸易，接着命令在英国商馆里工作的所有中国人包括翻译、厨师、仆役等退出，后包围了英国商馆，并不许任何人向他们提供食物，违者处以死刑。

商馆被断绝食粮后，律劳卑暗中派出了密使，命令停在外洋的两艘英国军舰安德洛玛克号和伊姆杰号开来广州，决定以武力相威胁，这样做实际上又一次违反了清朝的禁令。这两艘军舰一边和虎门的各个炮台炮战，一边乘涨潮之机溯江而上，直抵黄埔。在这个过程中，安德洛玛克号战死一人，轻伤三人，伊姆杰号战死一人，轻伤二人。但由于当时清军战备观念不强，以致二英舰强行突破成功，进入了黄埔江，并用舢板围绕在军舰四周，把二舰上的约四百名英军部署在各个岗位，准备对峙。卢坤急忙把此事上奏皇帝，道光闻报大怒，竟撤了广东水师提督的职、枷号示众，革去卢坤太子少保衔，拔去双眼花翎，戴罪督办。

正当卢坤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曾胜因公到广州（广东陆路提督驻惠州府），卢坤拉住他把形势相告，二人并亲到现场察看了督形，英国侵略军的无耻行径，激起了曾胜强烈的愤慨，于是使立即向卢坤作了一个决战决胜的建议：在内河上流处用铁链横连十余条大船，每船载大石10万斤，使沉入水底阻塞水道，水而扎上木筏，这样，造成英舰无法

前进的局面，又以数百条小船装上干燥柴草，屯集江边，准备随时出动用火攻。作战的兵船上挂以湿絮褥，以防英人枪炮。沿岸则设营棚，集数千士卒配合，务与英军战斗到底。卢坤采用了曾胜的计划，并将水陆两军交他具体指挥。曾按计划而行，只见黄埔一带内河，“檣楫如林，戈矛森列，旌旗跃云，日钲鼓声震数十里”。在这种情况下，英舰陷于进退两难的境地，更惟恐火攻，兵士只得伏处船中，相持了数天，在内外消息不通，进出无路，饮食无着之下，英人才被迫认错，答应修复击坏的炮台，请求准予退回澳门。这一胜利，大长了中国人的志气，大灭了侵略者的威风，连道光皇帝也深感满意，认为卢坤等人“始虽失于防范，终能办理妥善，不失国体，而免衅端，朕颇嘉悦”。而那个制造事端的律劳卑，则被驱出广州，他到澳门居住期间，一方面痛恨他的失败，另一方面害怕回国后无法交待，又气又病，不久，在中国百姓庆祝胜利的锣鼓、爆竹声中死去了。

曾胜不仅有勇有谋，而且有识，在驱逐英舰之后几个月，有人向皇帝上奏，说澳门有澳大利亚人筑的炮台，对中国不利，要求拆除。皇帝下旨严责广东地方官员：“速将澳夷实在情形设法办理，据实具奏，如稍有含混讳饰，尚不认真查办，将来激生事端，酿成后患，惟该督等是问，试问能当此重咎耶？”对此，曾胜和新任的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等人能不惧高压，据实上报说：澳门澳大利亚人所筑炮台，已有一百多年历史，炮口向海，“专为防御外洋，而非意在抗衡内地”，何况险要之地仍在清军手中，不存在对中国不利的问题。又大胆提出看法，认为澳人在澳“事事恪遵法度”，“与英夷向不相同”，与他们友好相处，可以“以夷

防夷”。曾胜的这种对外国人区别对待的态度，在当时是高于常人的。

曾胜于道光17年（1837）4月16日亥时歿于任上，享寿65岁。皇帝赐祭葬，谥曰“勤勇”，墓地在 今 市 郊蟠龙村边。原墓约高六尺，直径丈二，墓前石碑 高 约 四尺，上刻

“皇清诰授建威将军曾公讳胜谥勤勇之墓”和“御葬”等字，墓四周有青条石围作栏杆，里许还有石人石马。后于1958和1970年先后遭破坏，现仅剩一土堆。另在黄村头塘立有“曾公神道碑”一块，上书“皇清诰授建威将军、提督广东省军务、瑚尔察图 额巴图鲁、世袭云骑尉曾公神道碑”字样，其中巴图鲁为满族语勇士之意，清政府用作称号以赐有武功的官员。后不久，曾胜子承禧专程赴京师找到王拯，请王为其父写一篇“行状”，王的文章中保留下一桩难得的史实，即前面所说的曾胜计以大船载石沉江阻英舰事，事后曾才知

“船石实未集，公为人言之尤以为愤也”。由于清朝吏治的腐败，以至军令不行，下属居然有人不按 曾 的 计策办事，如此说来，曾的获胜是一种险胜。然而两广总督向皇帝的上奏却说是依计而行的，《清实录》也如此记载。清廷上下的昏庸，于此可见一斑。王拯所述的情况和官书所载唱反调，如不是事实，他是断然不敢下笔的。这“内部”资料看来也是曾胜之子提供。

曾胜受历史的局限，前大半生所为，无甚 值 得 称道之处，晚年敢于设计抵抗骄横的外国侵略者，此举足以使他流芳后世。那场战斗和鸦片战争的几场战斗相比，虽然不算大战，却意义深远，是以侵略者失败而结束的。后代有历史学家认为它是鸦片战争的序曲。明清两代柳州所出名人，以文官居多，武将极少，现有曾胜一人。可谓凤毛麟角。

杨 廷 理

陈铁生

杨廷理，字双梧，号苏斋。马平县（今柳州）人。清乾隆42年丁酉（1777）拔贡（科举考选制度之一），以入选二等先被任命为福建侯官知县，不久升建宁知府。很快又调任台防同知。

乾隆51年11月，以林爽文为首的天地会在台湾起事，很快攻陷彰化县，把台湾知府也杀了，全台为之震动。杨廷理代理知府，负责防守府城。杨集训八千人，沥血誓师，以战为守，乘林爽文兵初到，开城冲击，林军被迫退却。乾隆52年春，林再聚兵两路把府城围住，义军攻城又一次失败。原来杨早已暗中策反了一名头领反戈，导致义军攻城失败。就这样，杨廷理镇守孤城近一年，清政府方于是年年底派大将军福康安率大陆军队渡海入台支援，杨得以与之会合，几经“围剿”，台湾才平定，杨则因“剿灭”有功，升为台澎兵备道加按察使銜。

乾隆60年，杨被谪戍新疆伊犁，原因是他在福建任侯官知县时，亏欠了库银。一直到嘉庆8年，还清库银，才得赦还。12年，由于有蔡牵、朱濆率兵占据台湾海面的零星小岛，骚扰台湾，清廷派兵捕杀，多年来未能击退，皇帝闻报，想起了杨廷理，于是启用其为台湾知府，率兵行剿，

此时蔡牵已被打败远遁，朱濆则虽败但却占据台湾东面的噶玛兰地区，以图发展。杨廷理与南澳镇总兵王得禄水陆合军将朱围困，利用当地土人为之卖命，断绝了朱濆等人的用柴及饮水。久之，朱濆终于失败。海岛复归清廷，从此台湾有颇长一段时间的安定。

嘉庆15年，皇帝又委派他筹办开设噶玛兰厅（“噶玛兰”意为阳光的地方，故也有称其为阳兰的。福建语讹为蛤仔难或甲子兰）。噶玛兰位于台湾东北部，那里三面负山，东临太平洋，森林茂密，雨量充沛，土地肥沃。起初只有当地少数民族居住，以捕鱼、打猎为生，长期以来处于封闭状态。后有福建漳浦人吴沙率漳州、泉州及广东省的一些移民到来开垦。朱濆曾看上此地，欲占为据点，终因当地人的反抗而未能成功。清政府大臣之间对噶玛兰是保持原状还是加以开发有所争议。杨廷理根据那里的地理位置和环境以及当地人民的请求，为巩固台防计，提出“当开不宜弃以貽边患”的意见。这是很有眼光的。当时清政府真正在台湾行使权力的地方不多，除少数几个府县外，其余大部地区号令未能到达。在此之前的康熙32年，施琅攻灭郑氏政权统一台湾后，清政府的最高领导层，曾就台湾的弃取问题展开过一场大争论，一些朝臣主张守澎湖而弃台湾，连康熙本人也一时看不清台湾地位的重要性而未能决断。施琅等人则坚决反对“守澎弃台”的愚昧主张，上疏力排众议，阐明台湾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方面的重要地位，进而说服了康熙皇帝终于设台湾府，下辖三县，隶属于福建省。而杨廷理开发噶玛兰厅的建议，可说是当年清政府决定开发台湾的继续。他的建议几经周折，最后得到皇帝的批准并被任为通判。杨几次亲到

那里勘查，解决当地少数民族的土地纠纷，划定地界，组织生产。第一年筑以上城，第二年环种九芎木（当地一种木质很硬的树）以护之，后还加植刺竹，故噶玛兰亦称九芎城。杨在当地还进行了文化建设，他在那里建了一个仰山书院，寓意仰宋代福建学者杨龟山之意。经过数年的开发，荒凉的宜兰平原建设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新城镇。杨廷理开发噶玛兰厅的经过，后来到过台湾的大文学家姚莹在《噶玛兰纪略》一文中详细记录。此后台湾东北一片领土算是真正在清政府的控制下。不久杨奉令调回大陆任福建建宁知府，由于他开发噶玛兰的功绩，当地人立了一个杨公去思碑纪念他。并建有杨公祠，祠中供有他的禄位，称他为开兰长官。光绪元年，噶玛兰厅改为宜兰县，后一直沿袭下来，现已成为台湾省的一个大县，人口达45万以上。

杨廷理于67岁时因积劳而逝。他死后，福建著名学者高澍然替他作有传，文载于《抑快轩文钞》一书中。现代台湾学者连横（雅堂）先生在其所著《台湾通史》也对杨开发台湾的功绩予以肯定。杨不仅是个武人，诗文也写得很好，曾有《双梧轩诗草》行世，另有《东瀛纪事》一卷，记载在台湾镇压林爽文事，还有《噶玛兰说略》一卷，记在台湾的见闻，并有《东游诗草》一卷，其中的诗作于今已成了研究台湾开发情况的重要史料，如两首《重定噶玛兰全图》诗：

“尺幅图成噶玛兰，旁观慎勿薄弹丸，一关横镇炊烟壮，两港平铺海若宽。金面翠开云吐纳，玉山白映雪迷漫。筹边久已承天语，贾傅频烦策治安”。“三农力穡趁青晴，雨霁烟消极望平，山拟半规深且邃，溪如双带浊兼清。培元布化思良吏，划界分疆顺兆氓，他日浓阴怀旧泽，听人谈说九芎

城”。又《度建兰城公署》一首：“背山面海势宏开，百里平原亦快哉（指兰阳平原），六万生灵新户口，三千田甲旧蒿莱。碓舂夜急船初泊，岸涵晨喧雨欲来，浮议频年无定局，开疆端赖出群才。”又一首《罗东道中》（罗东镇在宜兰县之南）：“凌晨闲揽辔，极目望清秋。地判东南势，溪分清浊流，炊烟村远近，帆影海沉浮。鸥鹭应驯我，三年五次游。”还有一首《登员山》（员山乡在宜兰县城东七里）：“莫谓此山小，龟峰许并肩。千寻压吼浪，一抹绕浓烟。蟠际看随地，安排本应天。披榛舒倦眼，吟望好平田。”（按：诗中的龟山是指宜兰城东北30里海中小岛，平田指兰阳平原）。这些诗作除对台湾城镇风光给以赞美外，也表达了他忠君爱国的思想。

杨廷理在台湾镇压过人民起义，但后来为巩固台防、开发台湾出力。对此，广西钟山县旅台人士卢世标有诗云：“兰志重翻百六年，方知吾桂出名贤。不辞筇路三秋若，赢得馨香一瓣鲜。绩著黄堂光史册，语惊丹阙富诗篇。东游自愧居杨后，异代相思益惘然。”杨廷理是汉代以来大陆人到台湾任职、开发台湾值得称道的一位。

王拯和《龙壁山房诗草》

萧泽昌整理

王拯（公元1815—1876年），初名锡振，字少鹤，又字定甫，清广西马平（柳州）人，家住今本市中山西路细柳巷。王拯在孩时即丧双亲，便由其姐姐抚养。姐守寡家贫，靠为人洗衣浆裳过活。出身贫苦的王拯自幼发奋攻读，当年他家隔壁是豆腐店，少年王拯常借豆腐坊的灯光读书写字，通宵不辍。他姐姐虽不通文墨，但很贤惠，而且深明读书的重要。传说他家院内有两棵梧桐树，树下有两块石板，一块供王拯读书练字用，一块为她洗衣用。她一面洗衣，一面督促王拯攻读。王拯以诗《出门》记述他的清贫刻苦读书生活（见本文选录）。经过十几年的勤学苦读，王拯终于在清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考取进士，历任户部主事、左副都御史、通政使等官职。他在任以上官职期间，常以宋代清官包拯为师，因更名为拯。

王拯的毕生成就主要是在文学上。因喜爱柳州城北的龙壁山风景，他撰文、写诗常以“龙壁山人”自称，其居室也自称为“龙壁山房”。著有《龙壁山房文集》、《龙壁山房诗草》、《龙壁山房词》和《归方评点史记后笔》等书问世。王拯在文学上，研习安徽桐城派古文家梅曾亮的古文书法义，并将桐城派的古文，传播到广西来。他和当时广西境内

的吕璩、朱琦、龙启瑞、彭昱尧等人，同称为“粤西五大古文家”。其文风以“渊雅古茂”见称。在他的文集中以记事之文最为精彩，简净有法。尤为可贵的是，在鸦片战争期间，王拯作了《王刚节公家传跋尾》、《陈将军画像记》、《浙江定海总兵葛云飞墓志铭》等文，记叙和歌颂在抗英战斗中壮烈牺牲的爱国将领，表现了作者的民族正义感和爱国之心。他在柳州写的《鱼峰游记》，更是脍炙人口的优美散文之作。

王拯也是清代有名的词家。卢前在《饮虹移花清词百家》中对他推崇至极。他说：“龙壁古文能合辙，粤西词脉已深藏。”陈祖望在《龙壁山房词题跋》也说他的词“清丽纤绵”，“上追五代北宋诸公”。夏善业也在《跋龙壁山房词》中说：“少鹤立作，力追北宋，浏亮浑脱，较美成诸君，无不及焉，洵词家巨手也”。王拯除了工于填词，甚有成就外，还于北京组织在京粤西诗人共研词学。是他引导桂林的王鹏运、况周仪等进入词坛，后王、况两人词学蜚声海内，声誉为晚清四大词人之二，世称“临桂词派”。

王拯不仅是清代有名的词家和古文家，而且还是有名的诗人和书画家。其诗有“清新明静”的称誉。所编《龙壁山房诗草》一书，在广西诗苑里颇有地位。

王拯的书法，早年学董其昌、赵孟俯、晚学颜真卿。其书法以楷书见称，具有清丽潇洒的风格。他还精工绘画，擅长画梅，以金农为师，既取人之长，又不拘泥于人，所作梅花，颇有白雪素妆，不落俗套的特点。《粤西先哲书画序》的作者，曾称赞王拯所画的梅花有“寒香铁干，位置精严，能以书之关键透入画中”的独特风格。

现从其所编《龙壁山房诗草》来看王拯的身世及其实学意境。

壶城①杂咏

方塘

方圻达泉脉， 迴波澹容笑；
上有白头渔， 一竿钓秋雨。

锦秋亭

细雨淡晓色， 数峰围玉屏；
海棠开未了， 红上锦秋亭。②

罗池

半亩罗池在， 孤亭锦树隈；
桔香③三百本， 留待我归来。

鲤鱼岩

古洞闷凉秋， 松颠白云驻；
山风吹落木， 泉声不知处。

（选自王拯《龙壁山房诗草》卷一，一页）

无题

龙翰臣同年启瑞④，来自武陵。辱以诗草属之，予题其后。

桂林山水甲天下，	平地苍玉立嵯峨；
十年探奇兴不尽，	虞衡一志⑤余偏颇。
东山七星何磊落，	西岩六洞凭森罗；
玉华南来天地隘，	海阳北去风云多。
为熊为罴为虎豹，	如狮如象如鼉鼉；
拂云笼茏翡翠，	树拔地萃蔕珊瑚。
柯山川钟毓几奇，	士旧游历曾相过；

商君雄才久沦落， 龚刁骏足还跌蹉。
后走彭生⑥育文笔， 苏唐秀萧琼山峨，
漫骏最晚城北郭⑦， 僻巷⑧夜静闻咿哦。

（选自王拯《龙壁山房诗草》卷一，五页）

出 门⑨

我生甫一龄，	皇天夺其怙，
能言襁褓中，	日诵唐贤句。
饥食与寒衣，	日惟母丝缕；
时时束栗索，	肯扑邻家树。
七岁著荷衣，	晨兴就乡傅。
归来呼病榻，	痛母失眠去。
大父时毫衰，	苍黄泣如雨；
童年两兄弟，	与我遂孤露。
大姊嫁彭城，	夫家早崩殂；
所书招我至，	性命始得所。
童婚苦疾疫，	负气猛如虎；
十岁强之学，	读书殊莽卤。
朝眠及日晏，	嬉戏涉园圃；
老塾怜我孤，	薄戒负夏楚。
群经未毕业，	帖帖先涂附；
十五谒黉宫，	游观偏廊庑。
翻然自激温，	慷慨寥期许；
稍知经九七，	何乃论四部。
乡僻罕师傅，	兔园惟册簿；
前年秋赋兴，	猥与计吏伍。
行生附傅车，	光辉到羁旅；

神都拱北极，
巍然宫阙壮，
谁能辨昆贾，
虽然无远志，
五月京师热，
所知亦留恋，
捧策向宜城，
十程九泥泞，
夜行苦同饥，
迢迢盼所戚，
黄鹄自天来，
南浮洞庭旷，
快哉五雨轻，
秋色下湘漓，
空还余万里，
阿姊喜我归，
两甥长並我，
相聚曾几朝，
才疏龄百轧，
桂林山水地，
六棺痛伶俜，
稽首告先灵，
佳城觅西坞，
远涉恨修阻，
有待意酸楚，
山村雨如注，

凭高控四字。
试席面宫市，
射策侵覬纓。
簿植良知惧，
言归别天府。
浩然不可御，
停鞭嗟暑雨。
蹇蹇叹跋扈，
野宿投荒莽。
默默愉延宁，
江兴拜凤舞。
四望迷岛屿，
渐渐将烟槽。
团栾正三五，
情话独姬煦。
具食宴贫娄，
婉婉弄机杼。
囊笔行伛偻，
居隘值鸢杼。
群峰莽旗鼓，
萧寺许支柱。
佳城觅西坞，
岂忘首邱志？
幽宫暂屯宿，
十月天风寒。
经营就奋局，

泪血湿干土，
百困岁谁取？
锄耰亦我与，
耕读吾家素，
愿为溺与沮，
妻聚农家女，
横经复学右，
齑食充盎缸，
萧条叹环堵，
州家告乡举，
促迫不能拒，
呻吟日有瘼，
劝我结涛侣，
我留又不许，
堂前照列炬，
我疾行且愈，
无为搅肠腑，
远道戒寒暑，
此志天所予，
惺然闻猛虓，
明月照烟渚，
清泪洒洲渚，
艰难望楼柱，
弱笈同柳柜，
离别乃逾苦，
长跪告芬洁，

萤域二填田。
买置良可致，
人生贵自得。
稷禹在廊庙，
儿谕齐民书。
盛世安耕凿，
群鱼罗俎豆。
奈无百轡长，
岁晚春风温。
所厚咸赈馈，
阿姊病在床。
朝来勉加餐，
我去心志乱。
簿暮出门行，
姊病强起言。
汝出志宜壮，
长途慎风波。
孝弟首敬身，
掩涕识兹训。
拿舟问江干，
宵征黯无寐。
人国重材良，
嗟予木樗散。
济施尽我力，
赫赫谁所主，
仲诚白献剖，

我志鄙膏粱，	我心随华咽。
平生残骨肉，	所愿作蚕驱，
富贵五鼎烹，	椎牛向奚补？
僧生夸元印，	堪笑一腐鼠；
我行日以逢，	惻惻叹靡盐。

（选自王拯《龙壁山房诗草》卷一，四页）

注：

- ①壶城：柳州。
- ②锦秋亭：柳州清代名胜遗址。
- ③橘香：指柳宗元。
- ④龙启瑞：和王拯同时誉为“粤西五大古文名家”。
- ⑤虞衡志：指宋朝周去非撰写的《桂海虞衡志》。
- ⑥彭生：“粤西五大家”之一的彭昱尧。
- ⑦北郭：柳州城北隅。
- ⑧僻巷：王拯幼年居住的柳州细柳巷。
- ⑨《出门》：王拯以诗的形式，反映他清贫的读书生活。

徐 养 正

蓝 阳

徐养正，是明代比较清廉的官员，他刚正不阿，做了一些抑恶扬善的事情，受到人们的赞扬。

徐养正，字吉夫，号蒙泉，柳州府马平县（今柳州市）人，明朝嘉靖七年中举人，二十年中进士，后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庶吉士是一种带见习性的官职，“选进士文学优等及善书者为之”，并委派学士加以教习。三年以后，庶吉士再行考试，成绩优秀者，就留在翰林院，分配做编修和检讨，其余的则任命为给事中、御史等京官，或任命为州、县地方官。徐养正经过庶吉士考试之后，被任命为户科右给事中。在明朝，各科给事中品级并不高，是正七品或从七品官。但他们职掌钅发章疏、监察六部、稽察违误、弹劾官吏，权力颇重。

徐养正在任户科给事中期间，做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就是弹劾了严嵩的党羽，直至严嵩的儿子严世蕃，以致遭到严嵩的打击，受到了廷杖和谪贬。

严嵩是臭名远扬的奸相和贪官。他从嘉靖二十年开始担任宰相，直做到嘉靖四十一年，与阉党勾结，贪污受贿，迫害忠良，无恶不作。而在皇帝面前，极会巴结逢迎，很得明世宗的宠爱，因而能够一再击败他的政敌。他曾在世宗面前

构杀了夏言、曾铣、杨继盛、沈炼、王子等人，其中夏言死前地位比严嵩还高。前后有大批人就是因为弹劾严嵩而受到严的疯狂迫害，甚至置于死地的。徐养正以一个七品芝麻官，敢于摸严嵩的老虎屁股，说明他还是比较刚正的。最初，徐养正参劾了严嵩党羽中一个姓戴的府尹，已使严嵩很恼火。嘉靖二十七年，徐养正又与户科都给事中厉汝进、给事中查秉彝、刘起宗、刘禄等联合上疏，直接揭发严嵩的儿子严世蕃“承贿受嘱”、“窃弄父权”、“嗜贿张焰”等丑行。严嵩对此更暴跳如雷，亲自上书申辩，并“求援于中官以激帝怒”。其结果是，世宗再次被严嵩摆布，下令将厉汝进廷杖八十，将徐养正、查秉彝、刘起宗、刘禄廷杖六十，并全部贬到广西、云南边远地区去“戍边”。

这一次，徐养正被贬到云南临安府通海县（今云南省通海县）当典史，这是一种“流外”（即九品以外）的小官，负责传递来往公文事务。此后，徐养正又逐步升官。首先是升任广东肇庆府推官（官阶七品，专管一府刑名），接着调任贵州提学金事、云南提学（均为掌管教育行政的官员）。在云南提学任内，徐养正把自己辖地教育方面的规草制度，整顿得比较严明。同时，他还能在自己的教育行政职责之外，兼管学生课业和品行的考察工作。这说明，庶吉士出身的徐养正，确是有些学问和办事能力的。另外，当时云南有个布政使在元江（即元江府，今云南元江县及墨江县。吴光升《柳州府志》及谢启昆《广西通志》均作“沅江”，误）。被人刺杀，久未破案，徐养正自告奋勇，请准前往破案，终于抓住刺客并加以法办。因为此事，徐养正也被同僚和上司认为是个有谋略的人。

从此以后，徐养正又升任京官。开始时被任命为南京光禄寺少卿（正五品官，职责是协助光禄寺卿掌管朝廷宴会、祭祀一类事）。嘉靖三十六年，他被改派到尚宝司担任尚宝卿（正五品官，职责是管理皇帝的宝玺、符牌、印章）。因当时严世蕃以工部左侍郎兼管尚宝司事，徐养正“不欲与同列，请告归”，直到嘉靖四十一年严氏父子倒台之后，徐养正才重新应召进京为官。由此可以看出，徐养正在遭到廷杖和贬官之后，虽然仍在严党横行的情况下当官，也未曾向严党作过正面斗争，但也不甘与他们同流，甚至宁可丢官回家，也不愿与他们共事。徐养正参加政治活动的大部分时间，正是严嵩把持朝政、专权横行、弄得天昏地黑的时代。徐养正在此权奸当道、贿赂成风的黑暗时期，能够公开地与严党划清界线，宁不作官，清白自守，这种精神是难得的。

严党败亡之后，徐养正再次出任京官。初时任南京通政使司参议（正五品官，职责是协助通政使，受理内外章疏的敷奏封驳之事）。嘉靖四十三年，升调南京光禄寺卿（从三品官）。在任光禄寺卿时，他能够兴利革弊，并管束部下，使他们不敢胡作非为。嘉靖四十四年，徐养正转任南京户部侍郎，四十五年晋升户部左侍郎（正三品官）。次年，穆宗即位，徐养正被提升为南京工部尚书，在任中因母丧归服，不久死于原籍。

后人评徐养正之为人，说他能做到“不以死生利害动其心”，“皜然涅而不缁”。又说他在家乡时，曾经“却污令二千金之馈”。他死之后，明朝统治者给他谥赠“宫保”（即太子少保，属正二品官职），还在柳州为他建了两处牌坊。徐养正葬于柳州城北盘龙村，今犹有墓。

徐养正著有《蛙鸣集》、《范运吉传》和两篇碑文。《蛙鸣集》已散失，内容无考。《范运吉传》写的是云南蒙化府举人范运吉的“孝行”，叙述范运吉如何用了五年时间，走南闯北寻得父骸归葬。文中还虚构了一些充满迷信色彩的情节。这类文字，表现封建伦理道德观点，对于今天并无多大意义。

徐养正写的碑文之一是《沈公去思碑》，所谓《去思碑》，也叫《德政碑》。古代被认为有“德政”的官吏，“所居民富，所去见思”，故去职之后，士民为之立碑以纪念，故称“去思碑”。“沈公”，指的是曾在柳州做广西右江柳庆参将的沈希仪。《嘉庆重修一统志》载：“沈希仪，贵县人，嗣世职为奉仪卫指挥使。正德中，屡破义宁、荔浦、临桂、灌阳、古田等贼，进署都指挥同知。……以参将署柳州，诸瑶畏威，积功至都督同知。”可见沈是一个镇压瑶民起义的剑子手。而徐养正却对沈颂扬备至，说什么“公去任，贼猖獗愈甚，右江始知不可一日无公……士民思公益切”，甚至说（沈希仪）“手植嘉木成林，民不忍伐，此可以见人心矣。”这是徐养正站在起义人民的敌对立场的言行。这又是他的阶级地位和历史条件所决定，今天看来亦不足为奇。

徐养正写的另一篇碑文是《资政大夫南京兵部尚书赠太子少保谥恭简屠公楷神道碑铭》（下面简称“碑铭”）。这是为屠楷写的墓志铭。屠楷字良植，桂林人，嘉靖进士。据徐养正的“碑铭”记载，屠楷也是一员比较清廉的官员。徐养正说他在做吏部主事和郎中时，“凡官职繁简、人才贤不肖得见于闻者，咸纪之于册。而高下其任，先节行，后才

艺。抑奔竞、奖廉能，每注选因才授职，虽势权请赋亦抗论不从”。又说他 在嘉靖三十二年辞官回家时，“途送者填塞、或相聚辄称曰：‘公惟饮江水去耳，惜乎不可挽焉！’公自家居，不为觞泳之乐，惟励志问学，杜门谢客，居第落落仅足蔽风雨”。是个难得的清官。徐养正不仅自己为官比较清廉，而且疾恶如仇，勇敢地弹劾严嵩，同时又热心为清廉的人写传，这种精神在今天还是有积极意义的。

（原载《广西文史资料》第1期）

张 肿

蓝 阳

张肿字子议，号鹤楼，柳州人。其父张全，曾任四川成都教授。张肿于明嘉靖二十八年中举人，三十二年中进士。

张肿的宦海生涯，是从担任刑部主事开始的。刑部主事一职，属刑部十三清吏司，位在郎中和员外郎之下，官阶为正六品，是一司里最低的一级。但张肿在担任这个职务时，却做了一件大事，就是于嘉靖三十七年上疏弹劾严嵩。严嵩是当时权势仅在皇帝一人之下的奸臣，曾经打击陷害过许多弹劾他的人。面对这样一个地位显赫而凶恶的对手，张肿从边防、财赋、人才三个方面淋漓尽致地揭发了严嵩营私乱政的罪恶。张肿考虑到明世宗比较关心边防的安危，便首先从边事陈言。他指出，国家的安全不能不依赖边镇，而严嵩却利用边事私及囊橐：委派边镇将吏时，不看资历和本事，只要谁肯行贿巴结便给除授；提拔将吏时不看有功无功，只要谁勤于问安和馈送便给谁升迁。于是人们托名修边建堡聚敛钱财以馈严党，卖官鬻爵成风，复军之将得到封妻荫子，杀民冒功者得到升官。这就使得祖宗二百年来巩固边防的努力全都被断送了。接着张肿又指出，在严党的聚敛下，国家岁发边饷只有四成输边，倒有六成装进奸臣腰包。这就造成了奸臣私藏充溢，边卒冻饿欲毙的局面。而在人事方面，由于

严嵩营私舞弊，一些无耻之徒络绎不绝奔走，丧心病狂，弄得二百年来培养人才的传统也尽败坏了。最后张时贞疾呼，要求皇帝对严嵩加以斥谴，以快众愤和振奋守边将士，并达到刷新政治的目的②。

张时贞的行动，无疑是从巩固明王朝封建统治制度出发的，这是忠君的一种行动，而且表现了相当难得的胆略和牺牲精神。张时贞的奏疏如果被采纳，使贪官污吏受到惩办，使边防得到加强，这对国家、对民族和人民也是有好处的。可是，独断而昏庸的明世宗，却仍然和以往一样不知好歹，却把张时贞逮捕下狱，并且廷杖、谪贬。

据《明史·吴时来传》载，张时贞上疏弹劾严嵩那天，正好刑科给事中吴时来和刑部另一个主事董传策也同时上疏弹劾严嵩。于是严嵩怀疑同僚徐阶在后面主使，便“密奏三人同日构陷，必有人主之。”而明世宗也依照这个奸臣的意思，下令“严鞫主谋者。”结果三人无一招供，主狱者只好以“三人互为主使”定罪和交差。明世宗则照例把他们一概廷杖和贬去“戍边”。结果是奸人得意，好人遭殃！

嘉靖三十七年到四十五年这九年中，张时贞一直在贵州都匀戍所度过。他的曾孙张秉忠写的《张忠简公传》说他到戍所以后，当地“诸生闻而贤之，相率执经就讲。”这时，他“所居湫隘”，以致从学者不得不“为之共建一楼，以作讲室”。他把这楼名为“问月楼”，还作了《问月赋》。此赋未见流传。嘉靖四十一年严嵩倒台，过去为反严嵩面被贬的人一般都复了官。但张时贞直到嘉靖四十五年世宗死时，仍然未得复官。

张时贞在《柳河东传》（见吴光升等纂《柳州县志》第九

卷)一文中,用大部分篇幅写柳宗元被贬之后在永州和柳州的生活和思想。他所以要这样尽心写柳宗元,看来写与他自己的被贬有关。张肿刚做官不几年便被贬斥,这点与柳宗元很相似。因此,他未免借柳宗元的身世,抒发自己胸中的愤懑。他在“传”中说柳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固自放山泽间。其理厄感爵(应是“郛”之误),一寓诸文,仿离骚数十篇,读者悲恻”,又说柳宗元在给别人的书信中说:

“人生少六十者,近来日月渐觉益促,大都不过数十寒暑,是非荣辱又何足道。”柳宗元这种鄙薄功名的情绪,曾在张肿思想中引起共鸣。因为张肿在九年谪贬生活中,并未积极钻研以复官,而是以讲学度日。不过,他对前途功名也并非完全不抱希望,他还是通过柳宗元身世的叙述,表达自己希望有朝一日能与以往一些“贤者”一样,“赖当世豪杰分明辨别,卒光史册。”事实上,张肿后来果然还有一段飞黄腾达的历史,这与柳宗元的“终柳州刺史”的结局是相同的。

隆庆元年(1567)穆宗上台后,张肿立即被召进京为官,并且节节高升。两年之内,他由吏部稽勋司主事(正五品)历升考功司员外郎(从五品)、文选司郎中(正五品)、太常寺少卿(正四品)、大理寺少卿(正四品)。隆庆二年,又以右金都御史(正四品)身份巡抚南雄、赣州、汀州、韶州诸府。在政治上,这时期他表现了积极卖命的劲头。巡抚南、赣诸府期间,他不仅镇压了广东、福建、湖广边境万羊山区的人民起义和南雄府的人民起义,而且对不属于他辖区的广西少数民族人民起义,他也“疏请”朝廷派兵镇压,并且就这件事为朝廷出谋划策。后来明王朝果然依照他的建议,派大军镇压了广西古田、府江、北三等处的少数

民族人民起义。事后，张肿又连续写了三篇颂扬镇压人民起义的碑文，即《平古田大功碑》、《平北三大功碑》、《平府江大功碑》，竭力歌颂明王朝对广西少数民族人民的残酷镇压。由于他在这方面的“功绩”和表现的劲头，不久又被擢升为大寺卿（正三品），加兵部右侍郎衔（正三品），并被转派巡抚湖广。

张肿在大理寺卿任内因家乡发生水灾，告假回家省视及侍养老母。其母死后，明王朝于万历二年复授张肿兵部侍郎兼右金都御史，委派总督漕运。任满后，转授刑部侍郎，到任不久便“连章乞休”，回家两年后便死了。到了天启初年，明王朝追赠他兵部尚衔书，并谥“忠简”。这说明，明王朝对他在镇压人民起义方面的作用，是给以相当高的评价的。

（原载《广西文史资料》第2期）

裴文中教授与柳州白莲洞的开拓

易光远

我国古人类学的主要创始者、世界著名的学者、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的开拓者裴文中教授，一生关心广西的史前考古事业，早在50年代他就在广西举办了考古训练班和科学讲座，为广西培养了人才。

1956年秋，裴教授率领的中国科学院广西野外队到广西进行田野考查时，于柳城县社冲楞寨山经农民覃秀怀提供的线索，在该山的硝岩洞中找到了世界第一个巨猿的下颌骨出土地点，解决了1935年荷兰的古生物学家孔尼华在香港发现巨猿牙齿以来所没有解决的巨猿出土地点问题。

农民覃秀怀在硝岩洞挖“龙骨”时得到了一个巨猿的下颌骨化石，经柳州市科普协会筹备委员会、市第二文化馆、市文物管理部门报告裴文中教授。裴老从北京带领了一行七、八人赶到了柳州，在柳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陈显扬的陪同下，迅速去到了柳城县冲脉村，为了具体的考察巨猿下颌骨出土的地点，裴老不顾生命安危，亲自抓着绳索攀登上90多米高的陡壁悬崖上观察。还漏夜在菜地泥土中筛选，找到了遗失的单个牙齿，使它与下颌骨重新结合。在此同时，裴老还满腔热情地对群众进行科普宣传，介绍考古知识，就在离巨猿下颌骨出土不远的洛满圩上，举办了考古训练班，组织附

近乡村干部、中小学教员、知识青年等有关人员进行培训，使大家知道保护文物——化石的方针政策，掌握鉴别化石的基本知识及古生物与古人类等科学知识，大大激发了群众对史前考古的兴趣和保护洞穴遗址的积极性。

裴教授还在南宁、柳州等地举办古生物化石展览，重点展出第一个巨猿下颌骨；又多次进行“从猿到人”科普讲座，柳州市科普协会干部何光球、谢昌贵先后在柳城县沙塘农校及柳州市工人俱乐部航空站、铁路俱乐部等地组织讲座。满头白发的裴教授神采奕奕地向群众传授科普知识，生动地阐述了第一个巨猿下颌骨发现的过程和研究的重要意义，使群众受到了深刻的爱国主义教育。

自1956年以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广西野外队，在裴教授等科学家的率领下，在柳城巨猿洞连续进行了十年的发掘工作，共采到了3个巨猿下颌骨、1000多颗单个巨猿牙齿，大量的伴生动物骸骨。这些宝贵的标本资料，为研究工作提供了极丰富的材料。因此可以这样说，柳城巨猿洞为世界上首次发现巨猿的故乡。标本之多，成为研究巨猿的“世界之最”。

1956年裴教授和贾兰坡教授等人在考查柳城巨猿洞的同时，在柳州市文管会陈显扬先生陪同下，在柳州市郊东南大桥园艺场所属的北面山发现了白莲洞文化遗址，在离地面27米的岩厦的灰黄色螺蛳壳堆积扰乱层中找到了一枚骨针、一枚骨椎和4件石器，后由贾兰坡、邱中郎在《广西洞穴中打击石器的时代》一文中发表，确定白莲洞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遗址。以后柳州市政府即将此处列为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1979年12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猿人第一个头盖骨出土

50周年纪念大会”的时候，裴老与贾兰坡教授先后向与会者柳州市博物馆的易光远建议在白莲洞建立一个洞穴科学博物馆的设想。会后易光远到了裴老住宅，向裴老请教建馆的方法步骤，裴老兴致勃勃地谈起广西山洞多，容易保存人类化石，很有条件开展史前文化的研究工作，而且人类遗址的发现对该地喀斯特地形的研究也有所帮助，同时建议进行系统的调查，创造建馆条件。他说白莲洞地处桂中平原，周围古人类遗址不少，“柳江人”遗址就在附近，在此建馆很合适；在白莲洞内、外通过雕塑的手段复原远古人类的生活情景，以对群众进行社会发展史的教育。裴师母也兴奋地拿出了裴老早年在广西进行田野工作照片，特别是人民画报上刊登巨猿洞的发现和裴老攀登悬崖的图片，解说裴老对广西考古事业的重视和关心。事后裴教授派出了专业人员协助柳州市博物馆工作。

1981年裴教授在任北京自然博物馆馆长期间，派出了他的助手人类学家周国兴先生到柳州，与柳州市博物馆签订了联合发掘白莲洞的协议书，裴老亲自担任发掘队长，领导工作的进行。他于1981年给我的复信：“光远同志：2月1日来信收到。多年来我总想去柳州，但未实现。今年（9、10月间）自然博物馆到柳州白莲洞进行发掘，我决定同往。如何发掘，周国兴再同你商量，发掘至何程度，也待商定。即祝安好！裴文中上。2月12日。”从4月起白莲洞遗址的发掘工作在裴教授直接领导下，顺利地开展了。可惜不久裴老因病不能预期到柳州。

1981年4月—1982年3月，通过了系统的、科学的发掘，共采得了标本计人类牙齿两颗，石器500多件，动物化

石3000多件，动物牙齿化石300多枚，还有骨器及火坑两处。每阶段进程都向裴老作了汇报。经发掘与研究工作者周国兴等人的研究，白莲洞遗址可分三个时代连续的文化层，即旧石器时代晚期——中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早期（约距今3万年前——11500年——7500年），研究工作在裴老指导下进行着，重要标本裴老都详细过目，认真分析，作出判断。白莲洞遗址内中石器时代的确立，证实了裴教授早在1935年前所提出的广西部分洞穴文化堆积物中的石器可能为中石器时代的精辟论断是正确的。

裴教授为筹备柳州白莲洞科学博物馆工作，呕心沥血，他亲自担任了筹备处主任，甚至在病榻上还为该馆题词：“中国可以成为世界古人类学的中心，广西是中心的中心。裴文中。1981年‘5·1’节。”

柳州市政府采纳了裴文中教授的建议，决定正式成立柳州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筹备处。派员前往北京汇报请求拨款建洞，1982年3月25日，易光远等人专程到中国科学院宿舍区去向裴教授再次系统汇报。而裴教授已病重，说话不甚清楚。但仍然极为兴奋地主动出来接见，在谈话中裴师母不断的转达裴教授讲话的内容：“我身体好了后一定要到广西去，我最后的愿望是不到内蒙和广西，死也不瞑目。”还逗趣地说：“我还要到柳江河去钓鱼！”他断断续续的讲着：

“到柳州去，看看老朋友陈显扬，和老农覃秀怀……”裴老喜悦地与易光远在室内拍照留影。谁知这次的舍见，是他最后一次接见考古工作了。裴先生的微笑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上。

我们继承裴老的遗志，加快了建馆的步伐，1985白莲洞洞

穴博物馆成立并在春节时正式开放了。这座中国第一座洞穴博物馆的建立，体现了裴教授一生的业绩。博物馆的现场展出，主要是古人类遗址，还包括岩溶、地质、矿物、动植物、生物、气象、环保、水文等有关洞穴内容，洞内总面积7500平方米，游览路程1870米，洞外将建成一个“史前动植物园”面积100亩。这里成了科研的基地，科普的阵地和旅游胜地。白莲洞自开馆以来这里每年平均接待中外宾客达15万人次。

白莲洞创办人之一、北京自然博物馆副馆长、人类学家周国兴副教授，曾于1985年4、5月间，应全美考古学会主席的邀请，赴美进行讲学和学术交流，并参加了美国考古学会成立五十周年纪念大会和美国西北人类学会三十八届年会。他的《广西柳州白莲洞石器时代洞穴遗址对华南地区旧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向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过渡的探索》的论文，引起了美国考古界权威人士对白莲洞的关注。

香港中文大学、亚洲考古艺术研究中心邓聪副教授1986年1月16日题词：“白莲洞遗址的发掘成果，完全解决了中国考古学研究里旧石器时代如何过渡到新石器时代长久以来不解之迷，白莲洞遗址的发掘是伟大的，是中国人的光荣！”苏联莫斯科大学考古学家、民族学研究家刘克甫教授1989年7月27日到白莲洞博物馆进行学术探讨时，认为中石器时代的研究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重大课题，它具有国际学术界在人类学方面研究的重要价值，这里的研究成果是可喜的。

白莲洞人类学的研究促进了洞穴各门科学的发展，1988年10月在柳州市召开的“柳州国际洞穴研究会”，来自加

拿大、美国、法国、澳大利亚等7个国家的学者，考察了白莲洞后给予高度的评价，世界洞穴学会主席福特说：“柳州是世界岩溶的心脏。”

裴教授已经辞世了，他的精神永远鼓舞着我们前进。让我们借用北京自然博物馆人类学家甄朔南研究员的题词“全国科学界、博物馆界盼望已久的白莲洞洞穴科学博物馆已经成立，开拓者之歌是最宏亮的，历史功绩永远不会被人民忘记，让我们的每一件工作都成为历史的脚印吧！”来寄托对裴教授的哀思。

旅柳名人逸事撷拾

陈 铁 生

茅盾在柳州一夜

1942年3月9日，茅盾（沈雁冰）等一大批文化人在党的营救下，从被日本人占领的香港安全撤到了桂林。蒋介石对这批人集中在反蒋势力强大的广西，非常不放心，派了公开身分是文化服务社社长、实际是CC系的文化特务刘某到桂林，劝说茅盾等人到重庆工作。当时茅盾还是国民党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委员的常务委员。起先，茅盾一直不答应，刘某也无可奈何。到年底，他考虑到中共中央办事处设在重庆，周恩来以及郭沫若、老舍、阳翰笙等一大批同志、朋友也在那里，可以更好的在党的直接领导下进行抗战的宣传工作，于是决定转到重庆。当时的交通情况是须先乘火车到柳州，然后在柳换车到金城江，再坐长途汽车才能到达目的地。同行的除茅盾的夫人德祉外，还有田汉的长子海男，海男是个军人，正好有公务亦到重庆。

12月3日茅盾一行顺利地到了柳州，为等第二天的车，他们在此地住了一夜。就是这一夜使茅盾遇到了一件惊险的事。原来，在桂林的这段时间里，蒋介石特务一直未放松对茅盾等

人的监视，而这次茅盾一离开桂林，又立即被特务盯上了。当他们在柳州刚住进一家旅馆，还未坐定，就有人来“拜访”。来人自称在桂林和茅盾有所接触。茅盾问他有什么事，他说他也要去重庆，与茅盾一路同行，并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来给茅盾看，只见上面写道：“查沈雁冰（茅盾）、邹韬奋系异党分子，有不轨行为，着各地的分处、分局留心稽查他们的行径”。下面盖有总统局的印章。茅盾看后认为这是对他进行神经攻击，笑了笑，作出无所谓的样子。那人却认真严肃地说：“沈先生不要以为这是开玩笑，这是真的，我就是吃这碗饭的人。因我一向敬佩先生，所以向你透个风。明天火车上还有一个人和你同行，那是我的上司。我们奉命‘陪送’你到重庆”。说完就走了。

事后茅盾夫人回忆起来，此人确是个中统特务，姓陆，公开身分是西南公路局稽查。该局在桂林、柳州都有办事处。由于此人的通报，使他们有了思想准备。

第二天在去金城江的车上，果然发现昨夜见的那人和一中年胖子带着一位女人，走进车厢坐在他们附近，茅盾知道，那女人是为了方便监视他夫人的。车到金城江，茅盾拿出省政府的介绍信，很顺利地买到第二天去贵阳的汽车票。而海男拿出军人证明反而买不到票。这明明是有意要将他们拆开。无奈，茅盾夫妇只好和海男分手。第二天茅盾夫妇乘车而行，那3人仍然一路紧跟着。到贵阳后茅盾曾想把他们甩开，但由于监视严密，无法甩掉，这样一直到了重庆。一下车他们简单的行李遇到彻底的检查，幸亏茅盾事先知情，未带任何“违禁”之物，否则被乘机扣押，后果不堪设想。

事后茅盾才知道，特务从柳州一路同行监视，是怕他们不去重庆而半路跑到延安去。由于到重庆是蒋介石的意思，所以特务不便下手。茅盾在柳州的时间只有一晚，但由于发生此事，使他一直对柳州留有深刻的印象。

竺可桢在柳州日记

竺可桢是我国著名的科学家和教育家，又是我国近代气象事业和近代地理学的奠基人之一。曾留学美国，1920年回国，先后在武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天津南开大学、浙江大学任教，又曾担任中央气象研究所所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科协副主席，是第一至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和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74年在北京病逝，享年84岁。在竺可桢任浙江大学校长期间的1938年，因日本侵略中国，战火逼近，浙大被迫迁校。先迁到广西宜山。在浙大迁校宜山这段时间里，竺可桢因处理校务，曾多次经过或留停柳州。在他的日记里，对当时柳州发生的事多有记录。其中对日机轰炸柳州的情况所记尤详。这些记载，由于是他亲历亲见，而且是当日所记，可使我们具体了解当时柳州的防空、警报情况。现将有关记录分别整理如下：

1938年

9月25日星期日。由阳朔至宜山。晴。……十二点至雒客，离柳24里许，闻柳州有警报……。

10月9日，星期日。晴，热。晨6点半起即有警报，8点解除。后知日机炸柳州机场，缘我机九架昨夜停柳州，不知如何为敌机所知，黎明五点余即去轰炸。幸我有备，于晨4点半即起飞矣……。

12月6日，星期二。晨阴。……接马宗裕、胡风初二人

自柳州来函，知昨上午10点倭机炸柳州南岸，浙大办公处所在之交通旅馆被炸。胡风初幸外出未被炸。马宗裕借柴油车到柳后，以车坏待修理，而修理厂全被炸……。

1939年

7月8日，星期六，晴。敌机炸柳州后飞宜山绕城二匝……2点正拟赴沙塘，闻警报，即乘四号车赴郊外3公里之羊角山农事试验场。暂避在家畜保育所岩洞中，2点40分闻机声，究兴见共27架，未几即闻爆炸声，知炸机场。

7月15日星期六。下午2点有警报，闻炸柳州。

7月26日，星期三。孟闻来，知本月22号炸柳州江北，烧房屋3000余间，精华尽毁，死人200余。215号房屋损失较小，惟死人更多，死伤共五六百人云……。

8月3日，星期四。下午蔡邦华来……谓前次敌机轰柳州，15号死700余人。22号死300余人。

8月14日，星期一。下午12点半警报，3点解除。29架倭机炸柳州。

8月31日，星期四。昨桂林三次警报，炸柳州之拉（堡）、凭祥、龙州、南宁、贵县，而迁江被炸3次。

12月2日，星期六。8：23警报，8：36紧急警报，下午1：40解除。炸柳州、长安三次，宾阳等地……。

12月22日，星期五。在柳州空战，击落敌机一架。

12月31日，星期日。子夜4次炸柳州……遇浙大4学生，渠等自情报部来，知昨晨在柳州空战被我击落3架，故今晨有3批乘月色来犯。

胡志明被押在柳州始末

温其洲

胡志明（1890—1969）原名阮必成，又名阮爱国，是越南人民的伟大领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中越友谊之花的辛勤培育者。胡志明于1942年曾被关押在柳州，两年后才完全恢复自由并离开柳州回国。今年5月，笔者随柳州代表团前往越南访问，5月23日在河内胡志明博物馆里看到当年胡志明在柳州的有关照片和情况介绍，并参阅胡志明《狱中日记》等资料，现整理记述如下：

1942年8月，越南人民的革命领袖胡志明为了去重庆会见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并发动和组织在中国的越侨支援越南革命，他从越南秘密来到中国。胡志明这个名字就是在这时开始使用的。当胡志明走到广西德保县足荣乡时，被国民党乡公所的乡警拘留。因为乡警看到胡志明所带的中国证件有多种并都已过期失效，认为胡志明身份复杂，有间谍嫌疑。同时被扣留的还有给胡志明带路的靖西县边民杨涛。胡志明获释放后，杨涛在柳病故。

胡志明被扣留后，几经辗转，1942年12月9日被解押到柳州。到柳州时，作了一首诗《到柳州》：“千辛万苦非无限，九日吾人到柳州。回顾百余天恶梦，醒来面尚带余愁”。这首诗反映胡志明在革命工作中受挫的忧心。

胡志明被解押到柳州后，关押在第四战区长官部附近的

一个山洞里（在今窑埠街广西卫生学校内；此洞距离地面约6米，洞口高约4.5米，宽约5米）。当时，国民党地方当局认为，胡志明既是越南人，却持有中国有关方面的多种证件，显然是一个重要的嫌疑犯。因而把他送交广西省最高军事机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桂林办公厅审查。1943年1月，军委桂林办公厅又送交柳州第四战区政治部审查。这时胡志明又写了两首诗：“空空苦了四十天，四十天苦不胜言。现在又解返柳州，真是令人闷又烦”（《？！》）。

“柳州桂林又柳州，踢来踢去像皮球，含冤踏遍广西地，不知解到几时休”（《！》）。这两首诗都是用“？”、“！”作题目，反映了当时胡志明被押的激愤和赴重庆完成革命工作任务急切心情。胡志明被押回柳州后，被关在四战区政治部军人拘留所的一间小房子内。但已不象被押解途中各监狱内所受到的那种虐待，饭已够吃，上午和下午在卫兵监视之下，各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上厕所，手脚上再也没有铁链和镣铐了，有时还能够读到报纸和书籍。这段时间，胡志明不懈地学习，思考和研究。他写了许多诗歌，还翻译了一本《三民主义》的书。

关于胡志明被送至四战区政治部的情况，当时在该政治部任中尉科员的彭德有这样的回忆：

“大约是1943年初的一个阴雨天的早晨，一个特工人员押着一位须发斑白的老人来到政治部办公室门口右侧的一棵桉树下，特工令老人蹲下，便进入办公室递交文件，又转身出来看住这位老人。其后老人被交给警卫排收押，这位老人是什么人？大家都不清楚。警卫排将老人拘禁在政治部附近一个四周是砖墙和铁丝网等障碍物的屋子里，小屋朝警卫排

那边的门口，有一排木栅栏。老人每天就靠着木栅栏静坐沉思或看书。每天早晨，卫兵打开铁锁，开门放老人出来散散步”。

胡志明被关押在柳州之时，印支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努力营救。印支共产党前段时间曾以“国际反侵略同盟会越南分会”的名义致电中国国民政府立法院院长孙科，并向驻重庆的苏联塔斯社分社发出电讯呼吁，请求援助。此外，还广泛号召在中国的越侨声援。要求中国政府释放胡志明。在重庆的中共党组织获悉胡志明被捕后，立即想方设法，向国民党方面提出交涉。周恩来同志亲自找到当时在重庆的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要求设法营救。冯玉祥找来李宗仁一同去见蒋介石，要求释放胡志明。

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在得知胡志明的真实身份后，因为胡志明是在越南国内外有影响的人物，想利用他，同时也为日后中国军队进入越南打击日军得到胡志明效力，于是在1943年9月10日便释放胡志明。但未完全恢复自由，还不能回国。

胡志明获释后，在柳州继续开展革命活动。1944年3月25日，由越南各党派、团体组成的越南革命同盟会在柳州召开代表大会，胡志明在会上作了“国际反侵略同盟会越南分会的报告”。胡志明在会上被选为领导人之一。胡志明为了便于开展活动，有段时间，他就住在今鱼峰山小学大门旁的那栋两层楼屋内（过去这栋房子叫做南洋饭店）。笔者这次在越南河内胡志明博物馆看到当年胡志明居住柳州鱼峰山小学旁那栋两层楼的南洋饭店的照片。后来胡志明同为了工作方便，就住进越南革命同盟会会址里去，（会址就在今鱼峰路

河南邮电分局处)。

胡志明获释后，同盟国战胜德日法西斯的趋势已日益显示出来。胡志明很想早日回国领导越南革命。当时他写了一首诗：“云拥重山山拥云，江心如镜静无尘。徘徊独步西峰岭，郊望南天忆故人”。后在《广西日报》登载。

1944年8月，在中共的积极推动和各方面力量的促进下，张发奎给予胡志明完全恢复自由，可以回国。于是，胡志明就迅速准备离开柳州。回国前他向张发奎提出了若干具体援助要求，张发奎给他一张长期来往护照、必要证件、部分药品和中国纸币七万六千元。笔者在越南的胡志明博物馆里看到陈列有胡志明和张发奎合影的照片。1944年9月20日，胡志明同18名越南干部一同离开柳州，经龙州、靖西回国。

有关人物史料部份目录

目 录	作 者	发 表 刊 物
李德山事略	戴 义 开	柳州文史资料第一辑
王植槐 " "	"	" "
柯汉资 " "	"	" "
李友梅 " "	"	" "
吕士宾 " "	"	" "
吴挺生 " "	"	" "
龙禹门 " "	"	" "
谭 昌 " "	"	" "
我所知道的陈炳焜	冯 浦 澄	" "
伍廷胤事迹纪要	文 史 室	" 第二辑
覃连芳生平简介	梁 镇 海	" "
柳州书画家朱芾	龙 月 卿	" 第四辑
韩彩凤生平简述	韩少武等	" 第六辑
覃连芳小传		" "
熊襄龙其人其事	罗 怡 林	" "
当年柳州名士 闾德轩	董 咸 熙	"
纪念 闾维雍将军		" 第八辑
名人刘賁其人其事	陈 显 达	鱼 峰 文 史 第三辑
元代柳州教授王国杰	刘 汉 忠	" 第六、七合刊

题 目	作 者	发 表 刊 物
清末柳州武举人张世养的传说	谢 贤 修	鱼 峰 文 史第六、 七合刊
新桂系崛起的智囊人物张任民	陈 佚 生	" 第八辑
陆亚发传后叙	覃 宝 峰	城 中 文 史第三辑
近代柳城书法家谢三聘	智 鼎 朴 生	柳 州 古 今第五期
马平县知事钟秀杰	陆 载 仁	" "
柳州知府孙寿祺事迹补正	林 治 繁	" 第六辑
《越雪集》作者叶时哲	沙 增 雪	" "
柳城人说沈鸿英	冯 光 祥	" "
陈鼓涛在六祖庵	谭 健	柳州党史资料第二期
张胆在穿山乡领导农民运动	严 兆 贵	" 第十期
	柯 阳	
忠勇为民的先锋战士侯信烈士	韦 载 常	柳州文史资料第十四 期
怀念周季康（姚晃光）	覃 泽 文	柳州党史资料第十七 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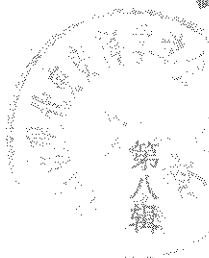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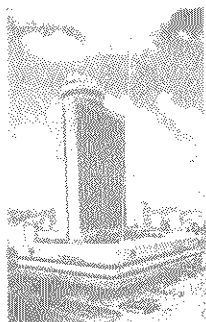
柳州文史资料

第八辑 人物专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柳州市委员会
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

1991年6月

2002



第八辑

人物专辑

柳州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广西壮族自治区
柳州市委员会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E487/50

封面题字 钟家佐

主 编 覃克光

编 辑 韦桂芳

陈佚生

于辉云

谢朴生

蔡增强

柳州文史资料第八辑

广西柳州市政协学习文史资料委员会编

柳州市科技印刷厂印刷

一九九一年六月

区准印证 NO1093